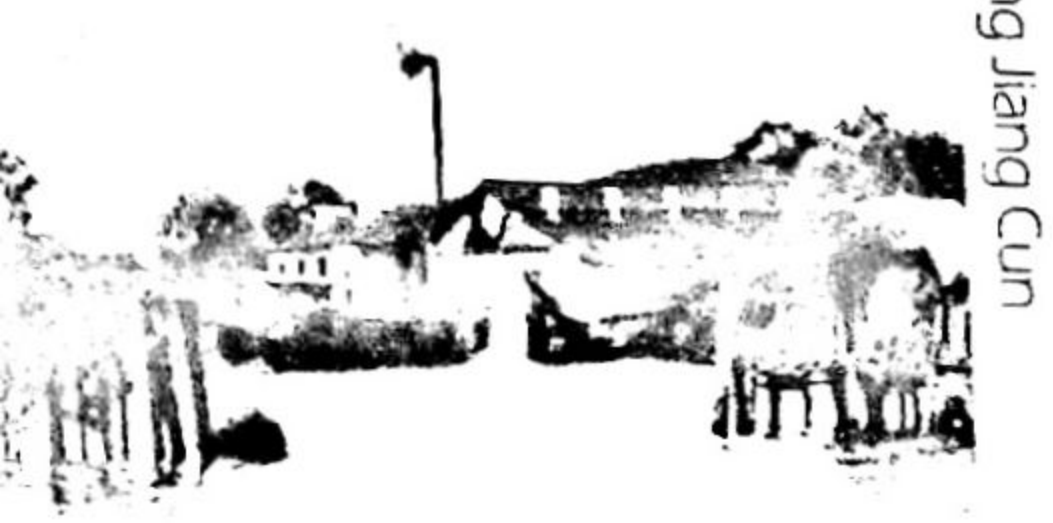
吴江历史文化丛书

周志芳　主编



Wu Jiang Jiang Cun

吴江江村

朱云云　姚富坤　编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吴江江村 / 朱云云，姚富坤编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4
（吴江历史文化丛书 / 周志芳主编）
ISBN 978-7-5399-7643-3

Ⅰ. ①吴… Ⅱ. ①朱… ②姚… Ⅲ. ①村史—苏州市 Ⅳ. ①K295.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90005 号

书　　名	吴江江村
编　　著	朱云云　姚富坤
责任编辑	赵　阳　姚　丽
文字编辑	聂　斌
责任校对	张松寿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1.13
字　　数	12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643-3
定　　价	360.00 元（全九册）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吴江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顾　问

梁一波　沈国芳

主　任

孙悦良

副主任

周志芳　吴　琦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列）

叶　勇　孙悦良　孙俊良

吴　琦　何斌华　沈卫新

周志芳　金健康　凌龙华

主　编

周志芳

副主编

何斌华

统　稿

姚海兴

编　务

高　频　庞　庆

总序

在区委宣传部的精心组织下，经过广大地方文史工作者的努力，以及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吴江历史文化丛书”终于付梓出版了。这是吴江文化建设中的一件大事，也是吴江发展进程中的一件喜事！

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潮流中，本土文化尤其是本土历史文化越来越受到重视。对于吴江而言，数千年来所积淀的本土文化，很多都可以当之无愧地用瑰宝来形容，历经岁月风霜，仍然熠熠生辉。

吴江的文明史可以追溯到6000多年前。多年来的考古发掘，在吴江境内发现了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其中有桃源广福村的马家浜文化遗址，震泽蠡泽湖、刘家浜的崧泽、良渚文化遗址，平望龙南村、袁家埭、唐家湖的马家浜、崧泽、良渚文化遗址，同里九里湖、移定毕圩、何家坟的崧泽、良渚文化遗址和松陵邓家桥的良渚文化遗址等。而今驻足静观，先民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场景如在眼前。

古往今来，吴江之所以声名远播，就在于城富秀美之貌，镇多俏丽之姿，同里、黎里、震泽、松陵、盛泽、平望，古镇金镶玉嵌，集结了吴越文化之精华；就在于天光锦绣百湖，水色星涌平原，东太湖、汾湖、莺脰湖、盛湖、蠡泽湖，湖泊星罗棋布，凝聚了江南水乡之灵气。

同样，“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得兮仰天悲”、“扁舟系岸不忍去，秋风斜日鲈鱼乡”、“好作新诗寄桑苎、垂虹秋色满东南”。游子思归、名士颂扬、盛景醉人，寥寥数笔间，吴江的魅力更是可见一斑。去年评出的吴江十大文化名片：垂虹桥、古镇同里、绸都盛泽、美丽苏州湾、沈璟与昆曲“吴江派”、柳亚子与南社、费孝通与江村经济、南怀瑾与太湖大学堂等，也充分彰显“人文吴江”脉络绵长，“水韵吴江”流连忘返。

为了全面、系统地展示吴江历史文化的精髓，挖掘、传承和保护吴江的历史文脉，去年7月，区委宣传部组织开始了“吴江历史文化丛书”的编撰工作。编著者在撰写过程中，精益求精、几易其稿，用共享和开放的心态，科学准确记载和表达吴江的历史文化，使丛书做到了雅俗共赏、通古鉴今。无论是《吴江史话》、《吴江先贤》、《吴江诗咏》、《吴江传说》，还是《吴江古镇》、《吴江风物》、《吴江南社》、《吴江江村》、《吴江丝绸》，都是展示吴江内涵和魅力的名片，也是值得收藏和阅读的吴江地情书。

水土滋养、文化浸润，造就了吴江人厚道淳朴、开放包容的品格。而今，在新的起点上，在吴江人民奋发进取、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建设美好家园，创造时代辉煌的征程中，璀璨的历史文化必将更好地启迪未来！

中共苏州市吴江区委书记 梁一波

2014年9月

序

宋林飞

“江村”是一个学名，本名是吴江开弦弓村。如今，它是一个名村。70多年前，以这个村为题材与命名出了《江村经济》一书，不久成为世界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名著。作者是费孝通教授，由于他和他的学生、朋友长期跟踪调查，使“江村”成为国内外社会学与人类学者的调查基地，反映现当代中国农村及其变迁的窗口。

我知道“江村”已经30多年了，当时我在南开大学学习社会学。费孝通教授告诉我们，1935年他在吴江开弦弓村进行了农民生活的调查，后来他去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留学，将这个村的调查资料写成了博士论文，其英文版书名为《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

1957年，费孝通教授二访“江村”，关心农民如何走出贫困；1981年，他三访“江村”，继续关心农民致富问题。1982年初，费孝通教授四访“江村”，我与北京、天津、南京、上海的一些社会学者随行。直到今天，我仍然记得当时的情景：我们乘坐一条机动水泥船，从吴江县城松陵镇出发，冷风嗖嗖。一路上，费孝通教授向我们介绍“江村”的浓浓乡音，伴和着船底下“拍嗒、拍嗒”的水声。这次江南水乡行的目的地，就是我向往的地方——“江村”。在村里调查，我大多跟随费孝通教授。村民对他很热情，有的老太太请我们喝青豆、芝麻茶，这是贵宾的待遇。

经过这次实地调查，我对开弦弓村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加深了这个村在社会学研究中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几个月以后，我根据费孝通教授的要求，又一次来到开弦弓村，进行专题调查。我在一个生产队会计的帮助下，收集整理了一年的出工情况，制作了农村劳动力季节性剩余曲线。结论是，这个村的劳动力剩余度也很高，应该加快向非农产业转移，发展乡镇企业。同时，使用问卷调查了解青年社会交往情况，制作了青年人际关系图。我还进入一些农民家庭，了

解他们的收入、消费、民俗等。这次调查的成果，是《“江村”五十年农民生活方式之变迁》一文，后来收录在费孝通教授的英文版著作中。

“江村”是江南水乡一个典型的村落。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村里还没有通公路，进出村子都要坐船。我第一次进村坐的船就停在贯穿全村的那条像拉开弦的弓的小清河旁，沿岸排列着清一色的传统民居，保留着“沿河人家、户户泊舟”的传统风貌，村子周围是葱绿的桑田和平展展的稻田，仍然保留着一些原质原味的农耕社会景象。

我第二次去“江村”，先在临近的震泽镇住了一个晚上，这个镇是历史文化名镇。费孝通教授指出，“江村”是滋润着震泽镇同时震泽镇又反哺着的一个“乡脚”。他有一个具体生动的回忆：“那时村子里有两条航船，每天早上，在航船摇出村子前，两岸农民们便招呼船老板代为办事。这家提个瓶子托买酱油；那家递上竹篮托他捎回点其他日用物品，船老板一一应接，把空瓶、竹篮等放在船上，航船便离村出发了。航船的目的地就是离村子有十二华里的震泽镇。当航船来到震泽时，守候在岸边的商店学徒们一拥而上，抢着来做各种生意。船老板自己便到茶馆落座喝茶。到下午，商店学徒们把装着物品的瓶、篮又送回船上，航船离镇返村。航船就这样每天在震泽与村子之间往返，村子里要去镇上的人都可以搭乘这条船。”

“江村”代表一种类型的农村。上世纪 30 年代末 40 年代初，中国农村有四种类型：单纯传统农业型农村、手工业发展起来的农村、商业发展起来的农村、现代工业发展起来的农村。当年，费孝通教授和他的助手张之毅先生在云南内地农村所作的调查报告，题为《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其中云南的“禄村”、“易村”、“玉村”，以及江苏有现代工业的“江村”，分别代表一种类型的中国农村村庄。

“江村”的现代工业，即使用现代机器的缫丝厂的创办，与费孝通教授的姐姐费达生有关。1923 年，费达生在开弦弓村成立了蚕业合作社，向农民推广科学养蚕技术，提高蚕茧产量、质量和蚕农的收入。1929 年，她与村民一起创办了“吴江县震泽区开弦弓村有限责任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这是全国最早的乡村工业企业之一，被誉为中国乡镇工业的发源地。

开弦弓村是一个有朝气、有精神的村落，是国内外研究中国农村的重要

样本。在中国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变迁中，开弦弓村走在探索农村工业化之路的前列。在至今的80年间，已经历了几次起落：1929年和1967年两次创办缫丝厂，改革开放初期兴起村办集体工业和九十年代中期快速发展个体私营工业。期间，留下了大量记录农村社会变迁的书籍、资料和图片。关于开弦弓村的调查次数之多、参与调查的专家之广、延续时间之长、学术成果之丰硕，在国内外都是罕见的。

《吴江江村》一书遵循费孝通教授倡导的“从实求知”、“学以致用”的学风和“志在富民”的精神，以通俗的语言、详实的资料和大量珍贵的历史图片，概要介绍了费孝通先生开创江村社会调研基地和国内外学者访问江村的情况。全书以农村工业化为主线，生动记述了开弦弓村八十年间跌宕起伏的社会变迁，平实地描述了村民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的历史进程中，真实的生活、生产情况，字里行间洋溢着浓郁的农村生活气息和村民在农民到工人、农民到商人的社会角色转换中朴实的思想感情。

本书作者朱云云和姚富坤都是土生土长的吴江人，他们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在陪同费孝通教授多次江村调查和接待国内外学者来访的过程中，耳濡目染，逐步理解和认识田野调查把农民生活观察转变成学问的奥秘和价值。他们怀着对费孝通、费达生两位家乡名人的敬仰之情，在做好接待工作的同时，认真学习两位老人家的学术思想，通过本土式的领悟，加上自己的生活体验，不由自主地投入对江村研究的记录、资料收集和村民访谈，逐渐从被观察者转向观察者。他们在出版《江村变迁》的基础上，又撰写了《吴江江村》一书，为读者、国内外学者了解和研究中国农村、开展农村调查增添了一本有益的参考书。

2014年7月

（作者为中国社会学会会长）

目录

CONTENTS

总　序 / 梁一波……1

序 / 宋林飞……3

导　语……001

第一章　技术下乡费达生改革蚕丝业

第一节　郑辟疆振兴蚕业……005

第二节　费达生技术下乡……007

第三节　陈杏荪一躬到地……009

第四节　蚕业所名播四方……010

第二章　乡镇工业开先河创建缫丝厂

第一节　费达生建缫丝厂……012

第二节　股单租契巧珍藏……014

第三节　陈杏荪著书立说……016
第四节　日军破坏如豺狼……017

第三章　无意插柳费孝通写江村经济
第一节　瑶山结下生死缘……019
第二节　江村养病作新篇……021
第三节　导师喻为里程碑……023
第四节　山河破碎奔云南……025

第四章　走进开弦弓鱼米之乡蚕桑地
第一节　沿河人家泊渔舟……027
第二节　男耕女织绿田畴……028
第三节　香火绵续添生机……030
第四节　婚俗嫁妆不同秋……032

第五章　土地改革惊天地耕者有其田
第一节　封建剥削苦难重……036
第二节　中农趋向自耕农……038

第三节　土改解放生产力……040
第四节　阶级分析添朦胧……041

第六章　合作化吃大锅饭同耕一块田
第一节　互助组相互扯皮……044
第二节　初级社入股土地……046
第三节　总路线指引方向……047
第四节　高级社积肥献礼……049

第七章　国外学者葛迪斯教授访江村
第一节　总理亲批访江村……052
第二节　充满新奇溜后门……054
第三节　走家访户争分秒……055
第四节　照片张张传与今……056

第八章　重访江村费孝通直言合作化
第一节　社会调查贵在真……058
第二节　实事求是说江村……060

第三节　家乡人民心相印……062
第四节　学院调查出奇文……063

第九章　逆势而上开弦弓重建缫丝厂
第一节　支持办厂最开心……066
第二节　八村联合同艰辛……067
第三节　村民增收靠工业……069
第四节　书记一语厂离村……070

第十章　改革春风吹江村处处气象新
第一节　“兄弟分家”都开心……072
第二节　“懒惰”反笑“勤谨”人……074
第三节　产业结构巧调整……075
第四节　江村处处气象新……077

第十一章　南希访江村四件礼物寄真情
第一节　坐船进村作访问……079
第二节　紧凑高效访江村……081

第三节　村民生活问仔细……082
第四节　四件礼物情义深……083

第十二章　三访江村费孝通重启社会学
第一节　田野喜闻织机声……085
第二节　乡土孕育小城镇……087
第三节　乡镇工业添活力……088
第四节　游子回乡倍感亲……090

第十三章　工业兴村开弦弓旧貌换新颜
第一节　南村办起丝织厂……093
第二节　北村奋发奔小康……095
第三节　两村合并共发展……096
第四节　工业兴村富家乡……098

第十四章　苏南模式露弊端工业盛转衰
第一节　资不抵债顺境过……100
第二节　集体工业问题多……102

第三节　丝厂投机厂倒闭……104
第四节　苏南模式走下坡……106

第十五章　勇往直前再探索家庭办工业
第一节　苏南模式成历史……109
第二节　再兴工业靠民资……111
第三节　依托“东方”搞织造……112
第四节　仿效横扇兴编织……114

第十六章　阻力重重周玉官狭缝求生存
第一节　初创电子元件厂……117
第二节　最早盖起别墅房……118
第三节　民营企业遭打击……120
第四节　临危受命管理忙……121

第十七章　精打细算徐国奇加工羊毛衫
第一节　齐心协力办织厂……123
第二节　姐夫连襟明算账……125

第三节　分工协作增动力……126
第四节　电脑横机进村庄……127

第十八章　以厂为家周永林夫妻搞丝织
第一节　休学学艺当厂长……129
第二节　夫妻离厂改经商……131
第三节　万商云集看“东方”……132
第四节　随机应变重办厂……133

第十九章　艰苦创业徐柏明寻觅市场路
第一节　寻找就业新行当……135
第二节　投入濮院大市场……137
第三节　跌打滚爬为致富……138
第四节　又回村里办织厂……140

第二十章　两闯上海周跃明回村建别墅
第一节　小小年纪想赚钱……142
第二节　两闯上海尝苦甜……1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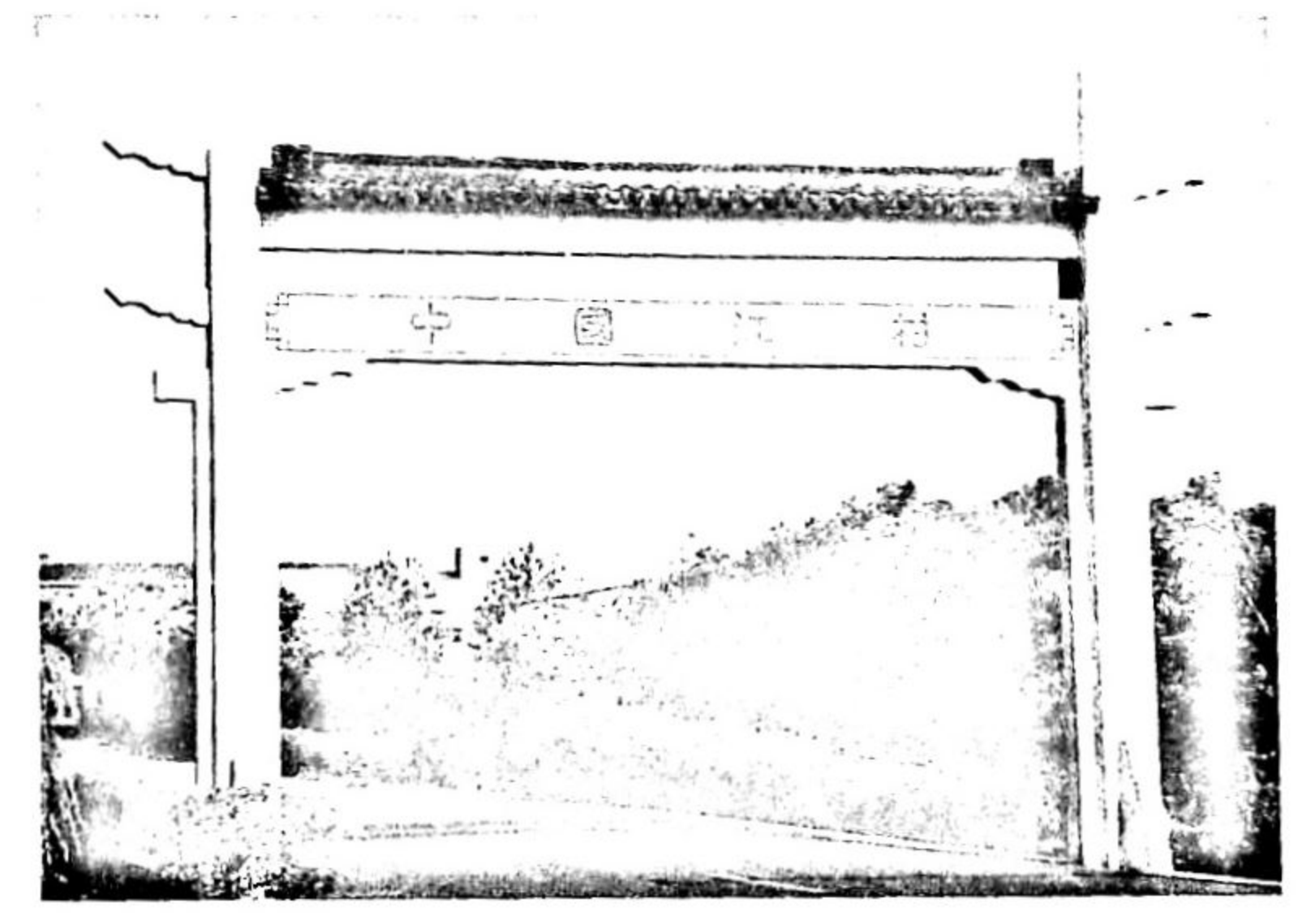
第三节　手中有钱造别墅……147
第四节　后悔未投再生产……148

第二十一章　江村文化园八十年社会变迁
第一节　光辉精神世代传……150
第二节　江村建设文化园……152
第三节　往事如昨留纪念……154
第四节　桑田沧海换人间……156

后　记……158

导 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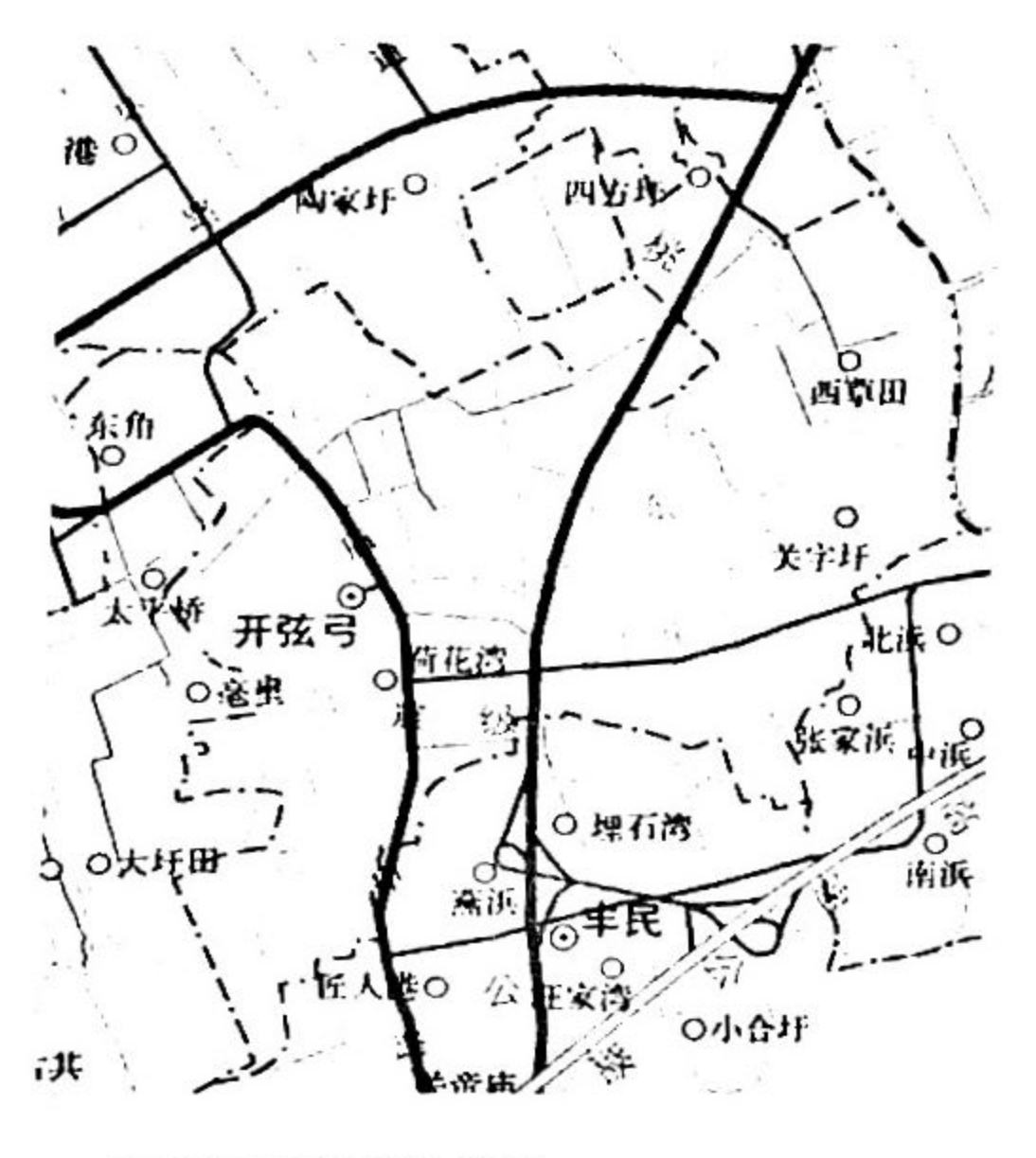
吴江江村是吴江区七都镇一个普通而传奇的村庄，这个村子因为有了费孝通与其姐姐费达生两位名人而闻名天下。村子里有一条叫小清河的弯弯小河，像一张拉开弦的弓，清澈的河水由村西向村东流淌，自古以来，这个村子就有一个美丽而响亮的名字——开弦弓，江村是费孝通先生为这个村子起的学名。



⊙ 开弦弓村入口牌楼

从村域内的出土文物考古证明，江村属太湖流域良渚文化的一部分，在4000多年前，已有先人在这块土地上生活和耕作。据明莫旦《吴江志》(1488)记载：唐末后梁开平三年（909）吴江建县，江村属吴江县震泽乡。1957年10月，江村列属庙港乡。1961年11月，江村分为开弦弓大队和荷花湾大队。1982年4月，两大队合并，大队名开弦弓。1983年8月，开弦弓大队改名为开弦弓村，原生产队改名村民小组。2001年8月，开弦弓村与西草田村合并，村名开弦弓，下设25个村民小组。2003年12月，庙港镇并入七都镇，开弦弓村列属七都镇。

1923年，刚从日本留学回国的费达生女士，投入由江苏省立女子蚕桑学校校长郑辟疆倡导的“技术下乡”活动，她在开弦弓村成立由广大蚕农



⊙ 开弦弓村村域位置图

参加的蚕业合作社，推广科学养蚕技术，组织养蚕农户实行共同消毒、共同催青、稚蚕共育、共同售茧，有效提高蚕茧的产量、质量和蚕农的收入，成为当代知识分子的楷模。1929年，费达生与开弦弓村村民共同创办中国农村第一家股份制乡村工业企业——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缫丝厂），跨出了中国农村工业化的第一步。因此，费达生被誉为“乡镇工业之母”和“当代黄道婆”，也使开弦弓村被誉为中国乡镇工业发源地。

1936年，费孝通先生作“初访江村”调查。1938年他在英国留学期间写成《江村经济》一书在英国出版，该书被导师马林诺斯基赞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1]使该书和作者费孝通在世界人类学和社会学界享有崇高声誉，也使开弦弓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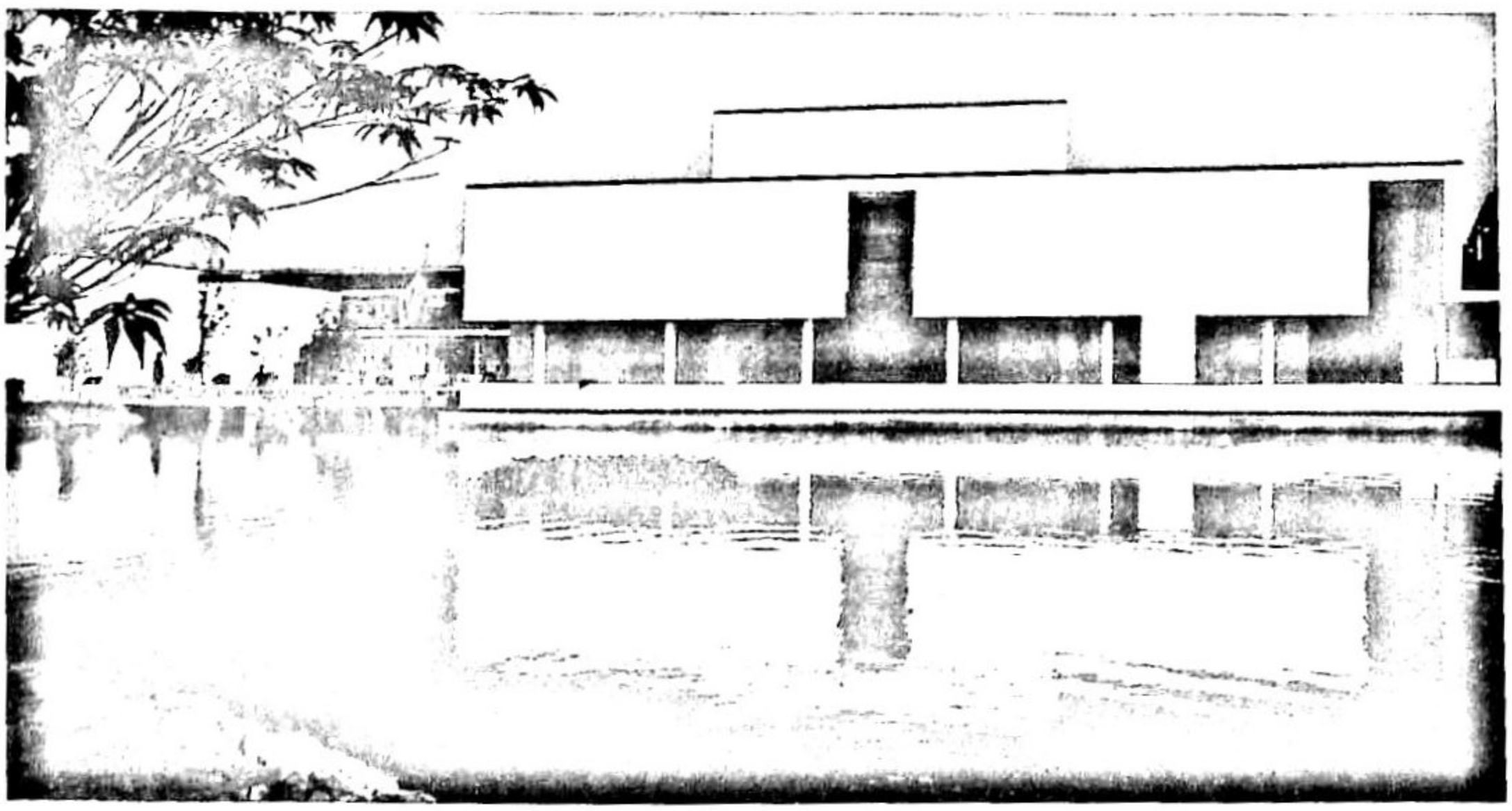
⊙ 沿河人家

① 费孝通《江村经济》序、第1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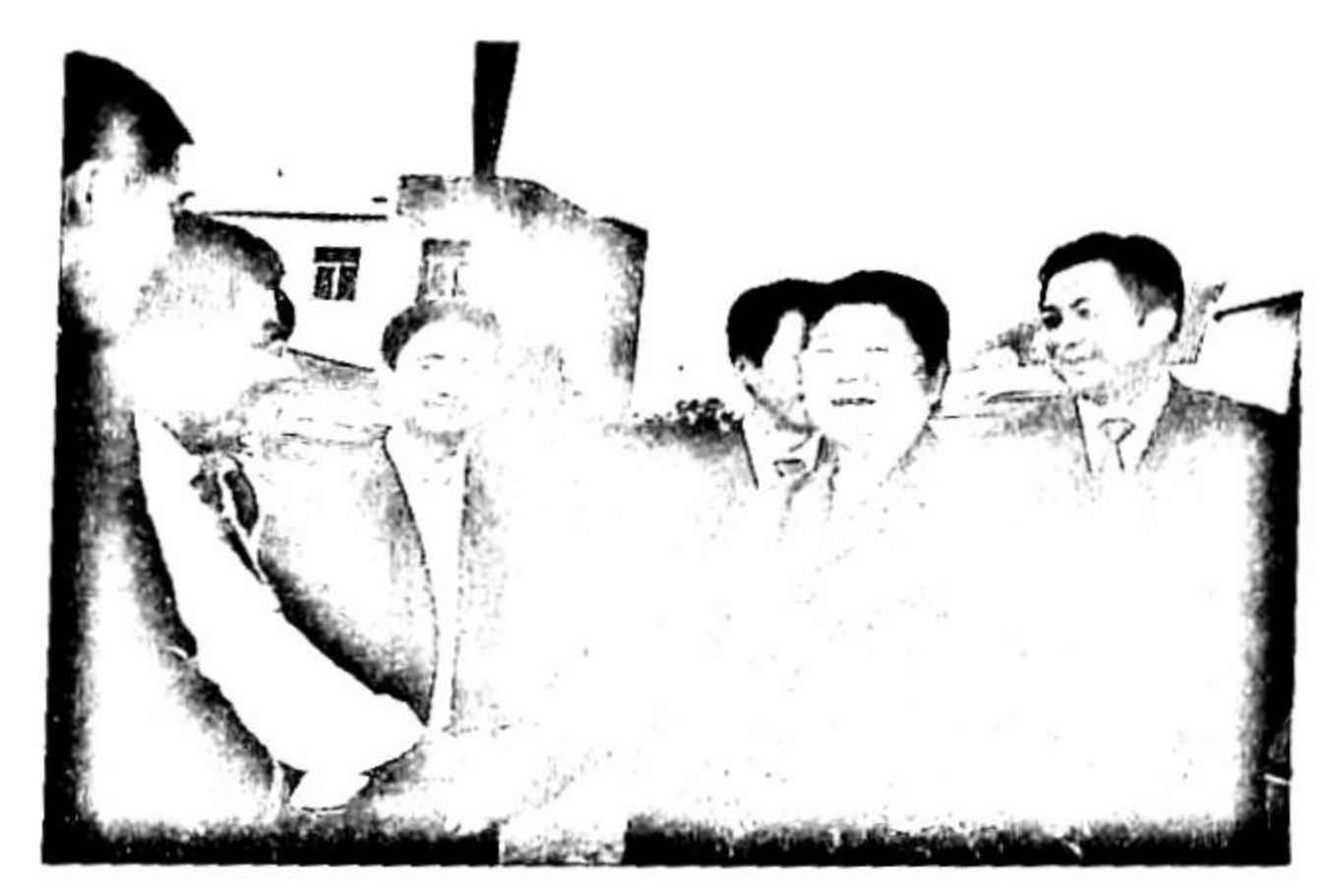
⊙ 1982 年费孝通偕姐费达生访问开弦弓村

成为世界观察中国农村的窗口。在费孝通长达 70 年跌宕起伏的学术生涯中，他怀着“志在富民”的坚定志向，先后 26 次走访江村，忠实记录农民生活，不断发现农民创造，努力寻找农民出路。留下了《江村经济》、《重访江村》、《三访江村》、《九访江村》、《江村五十年》等名著。

在费孝通江村调查的影响下，一批批国内外学者慕名来开弦弓村访问，形成大量调研文章和专著，开创了国内外最重要的社会学调研基地。同时，



⊙ 1982 年费孝通偕姐费达生访问开弦弓村



⊙ 2010年10月22日，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顾秀莲（右二）访问开弦弓村

⊙ 2010年10月22日，中央财政部原部长项怀诚（右一）访问开弦弓村

⊙ 2011年12月8日，苏州市委书记蒋宏坤（左一）访问开弦弓村

开弦弓村保存着从1955年至1983年间完整的农业合作化资料，以及各个时期的图片，被誉为研究中国农村工业化、农业合作化、农村城镇化和农村社会变迁的百科全书和活化石，使开弦弓村成为人类学和社会学工作者心中向往的地方。

2008年9月，中央电视台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专题节目《坐标·苏州·从农业到工业》里，把开弦弓村誉为“乡镇工业发源地”。2009年9月17日，中央电视台在庆祝建国六十周年的大型节目里，把开弦弓村放在新闻联播的头条里作重点介绍，定位为“国内外研究中国农村的首选样本”。

2010年，在纪念费孝通先生100周年诞辰之际，吴江市委市政府为了继承和弘扬费孝通和费达生两位伟人的事业和精神，建成并对外开放费孝通江村纪念馆。采用图文、实物、置景和多媒体等多种展览方式，介绍费孝通、费达生的生平事迹和丰富多彩的江村文化。2011年5月，费孝通江村纪念馆被命名为苏州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第一章　技术下乡费达生改革蚕丝业

相传丝绸发源于山西夏县西阴村，创始人是黄帝妃嫘祖，上下五千年，可谓源远流长。但是，在封建制度束缚下的中国农村，长期停留在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里，自身难以产生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技术和工业，缫丝和织造技术发展十分缓慢。然而，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开弦弓村，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蚕丝业技术改革，其推动力主要来自外界的现代科技力量。

为了说明这种来自外界科技力量的起源，先要介绍两位在我国现代史上创导蚕丝业改革的先驱者，他们是费孝通的姐夫郑辟疆和姐姐费达生。可以说，没有费达生就没有费孝通的江村调查。同样，没有郑辟疆也没有费达生在开弦弓村的事业。正如费孝通所说："姐姐一直走在我的前面，是我的表率。我又明白没有郑先生就不会有我姐姐这样一个人。我敬爱我的姐姐，因而崇尚郑先生的为人。"[①]

第一节　郑辟疆振兴蚕业

郑辟疆，1880年11月21日生于丝绸重镇吴江区盛泽镇，是近代著名蚕丝教育家和改革家。父亲郑雍，儒生兼行医，家境清贫。母亲张仪贞，善织绸，以织绸收入贴补家用。少年时代，郑辟疆目睹中国传统蚕丝业的衰落，勤奋学习，立志以新的科学技术来振兴祖国的蚕丝业。

1900年，郑辟疆考入杭州西湖蚕学馆。1903年，东渡日本，考察爱知、

① 费孝通《做人要做这样的人》，见《爱我家乡》第11页，群言出版社，1996年。

⊙ 郑辟疆，近代著名蚕丝教育家和改革家。

群马、长野、静冈等主要蚕区，了解到日本蚕丝业在明治维新后，应用先进科学技术，获得迅速发展，深感日本已经成为我国的竞争强手。中国必须急起直追，培养人才，推广科技，振兴实业，富民强国，改变蚕丝业落后的状态。

1905 年 至 1917 年，郑辟疆先后在山东青州蚕丝学堂、山东省立农业专门学校任教。他在教学过程中，编纂了《桑树栽培》、《蚕体生理》、《养蚕法》、《蚕体解剖》、《蚕体病理》、《制丝学》、《蚕丝概论》和《土壤肥料论》等教科书，深得各蚕校、农校的欢迎。当年重版 10 余次，是我国蚕丝教育最早的有系统理论的教科书。

1918 年，郑辟疆应史量才邀请，接任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校（简称“女蚕校”，校址苏州浒墅关）校长。他到任后向全校师生第一次演讲时，就宣传嫘祖教民育蚕的故事，提倡爱国主义。他说：“我们炎黄子孙，要把祖先开创的事业发扬光大。现在列强称霸，蚕食中国，河山破碎，百业凋敝。我们学蚕业的，要不惜一切为祖国振兴蚕丝业而献身。”时年 15 岁的费达生，是女蚕校二年级学生，她初次见到了新校长郑辟疆。

郑辟疆提倡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规定“诚、谨、勤、朴”四字校训，鼓励学生自尊、自强、自立。自己身体力行，作出表率，先后在校内创办蚕桑试验场、原蚕种部、蚕丝推广部、制丝实习厂。在校外农村、工厂建立了多处实习基地。增加学生在校内外的实验和实习活动。1921 年，郑辟疆从“土种革命”入手，创办蚕种场，用科学方法培育优质新蚕种，取代蚕农近亲繁殖的劣质土种，有效提高了蚕茧产量和质量。女蚕校设立原蚕种部，生产原种、原母种，满足新蚕种业的需要。接着进行一代杂交春蚕种和秋蚕种的试验，并在农村试养、推广。使周边各地的蚕种场如雨后春笋，得到普及，这是我国蚕业生产的一次大改革。

为提高蚕农的文化和技术素质，郑辟疆要求“女蚕校”推广部于农闲时举办妇女工读班和养蚕技术训练班。他编印的 4 种教本：《识字课本》、《养

蚕大要》、《上簇须知》和《消毒法》，创导在农村宣传科普知识，提倡科技兴农，得到蚕农的欢迎和广泛传播，成为我国早期的科普读物。

解放后，郑辟疆担任苏州丝绸工学院院长，先后当选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第三届江苏省政协常委，中国蚕学会名誉理事长，江苏省蚕学会理事长等职。1969年11月29日病逝，享年90岁。

第二节　费达生技术下乡

费达生，我国著名蚕桑教育家、改革家，被称为“当代黄道婆”、“中国乡镇工业之母”。1903年10月1日，生于吴江区同里镇，她与弟费孝通一样，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进女蚕校后，受郑辟疆校长爱国精神的熏陶和“五四”运动的影响，立志献身祖国的蚕丝事业。

1921年，费达生以优异成绩结束四年女蚕校学习生活。此时，校长郑辟疆为了提高国内制丝技术，报请省主管机关选派毕业生留日学习，省里批准二个名额，一名学蚕，一名学丝。费达生知道消息高兴极了，向郑校长提出：“我要到日本去读书。”虽然郑校长内心支持费达生，但办事不失原则，坚持按成绩挑选。在毕业班里，费达生成绩排列第五名，按顺序轮不到。但是成绩第一名的同学，家中不赞成，没有去；第二名结婚了，不想去；第三名是郑校长妹妹郑蓉镜入选了；第四名已找对象，家中不放她去；第二个名额就这样轮到了费达生。[①]

费达生考入东京高等蚕丝学校制丝科（东京农工大学前身）学习制丝，留学期间学习专心，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经常开会，多次邀请费达生参加，但她担心影响学习，都婉言拒绝了。费达生有自己的主见：她说：“学校派我来是学习日本的东西，而不是研究留学生的事。”当时，西欧流行坐缫车，日本已在推广立缫车，而这项技术对外国留学生是严格保密的。由

① 详见沈汉：《蚕丝人生：费达生女士口述》，载李小江主编：《让女人自己说话——独立的历程》，第236页，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

于费达生与日本的老师和同学相处融洽，他们让费达生穿上日本人的衣服，一起参观日本国立高等蚕丝学校等机构，看到了当时属于世界领先的立缫设备。

⊙ 费达生，著名蚕桑教育家、改革家，被称为“当代黄道婆”、“中国乡镇工业之母”。晚年关心蓖麻蚕的饲养。图中有盆栽蓖麻。

1923年夏，费达生在日本以优秀成绩拿到毕业证书，婉言谢绝老师劝她进日本丝厂工作的建议，毅然回国，在母校从事蚕桑教育工作。郑校长坚持教育与实践相结合，在校内成立蚕业技术推广部，请本校早期毕业生胡咏絮任主任、费达生任副主任。1923年冬，在郑校长带领下，费达生到吴江蚕区参加演讲，举办展览会，向蚕农宣传科学养蚕知识，并以开弦弓村为基地，开展土丝改良运动。

从此，费达生义无反顾地跟随郑辟疆，投身到培养蚕业人才和推广科学养蚕技术、振兴我国蚕丝业的共同事业中，成为郑辟疆的优秀学生、得力助手和志同道合的贴心人。两人孜孜不倦地并肩奋斗了大半个世纪，为了事业的成功，甚至牺牲个人成家的机会。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费达生和郑辟疆两人才在亲友和同事的敦促下，办理了婚姻大事，结成了为后人所敬仰的“同心茧”。正如郑辟疆的好友，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专门从北京寄来的贺诗：

真是白头偕老，同宫茧是同心。
早三十年结合，今朝已成金婚。

费达生七十余年如一日，长期深入农村，不辞辛劳，忘我工作，从事桑蚕丝绸科学技术的推广，为振兴我国蚕丝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解放后，她先后担任中国蚕丝公司技术室副主任、苏州市工业局副局长、江苏省丝绸工业局副局长、苏州丝绸工业专科学校副校长、苏州丝绸工学院副院长、苏州市妇女联合会副主任、苏州市政协副主席。2005年8月12日去世，享年103岁。

第三节　陈杏荪一躬到地

在上世纪20年代的开弦弓村，之所以成为最先接受科学养蚕技术，并创办中国农村第一家股份制缫丝厂。既是以郑辟疆和费达生为代表的爱国知识分子，开展历史性的“技术下乡”行动的结果。同时也反映了以陈杏荪为代表的开弦弓村农民对科学技术的渴望。

陈杏荪(1880—1954)，开弦弓村人。他原是开弦弓南村的一户开明地主，人称大先生。据传，陈杏荪在清末参加乡试落榜后，立志在家乡普及乡村文化教育。民国两年(1913)春，陈杏荪创办“震泽县立第八初级小学校”(开弦弓小学)，开本村现代教育之先河。他又是开弦弓村有限责任蚕丝精制运销合作社主要创办人之一。

在费达生口述材料中有一段生动的记述，她说：“开弦弓村有个陈杏荪，很起劲，是村里的小学校长，他要求我们去他们那里演讲，郑先生（郑辟疆）答应了。开完会（演讲）后，看蚕、丝模型和照片的展览。陈杏荪看到村民们看得很起劲，高兴地对郑先生说，能否请先生明年再来村里，教我们学习养蚕。演讲后，我和郑先生等人回到船里，陈杏荪校长和乡长来了（送行），对郑先生一躬到地，客气得不得了。在河滩边一躬到地，到今天我都记得。”[1]

⊙ 1936年，开弦弓村沿河民居。

陈杏荪思想进步，积

① 详见沈汉：《蚕丝人生：费达生女士口述》，载李小江主编：《让女人自己说话——独立的历程》，第239页，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

极支持费达生在开弦弓村成立蚕业指导所和向养蚕户宣传科学养蚕知识。在陈杏荪的主动要求下，郑辟疆选定开弦弓村为蚕丝改革实践基地。1924年春，女蚕校推广部费达生、胡永絮、张兆珍、许杲等四人在开弦弓村建立第一个蚕桑指导所。陈杏荪召集历年养蚕失败的蚕户20家，自己带头参加，共21家，创办蚕业合作社。在费达生等人的指导下，使用科学养蚕方法，实行蚕室蚕具消毒，共同暖种，稚蚕共育，防止蚕病、控制温度和湿度，引入蚕校培育的改良蚕种。1925年，陈杏荪以开弦乡农业合作社董事长的身份，租用开弦弓南村中心地段的土地，建造“催青室”，供本村蚕农“共同催青、稚蚕共育”。这年合作社春茧丰收，各户收入成倍增加，费达生的“技术下乡”行动得到农民的信任和欢迎，打开了农村养蚕改革的大门。

第四节　蚕业所名播四方

1925年，费达生接任女蚕校推广部主任，继续带领工作人员到开弦弓村指导养蚕，蚕业合作社扩大到120户，组成5个小组。合作社蚕茧产量和质量大大优于普通农户，蚕农纷纷要求入社。有些贫苦农民，蚕本不足，推广部为他们作保，向银行贷款，售茧后偿还本利，农民都恪守信用。同年，李权、费达生等5人，每人入股500元，在吴江合办友声蚕种场，生产五星牌蚕种，为养蚕农户提供优质蚕种。经费达生等蚕校人士宣传推广，开

◎ 1956年5月，开弦弓村民在费达生倡办的蚕共育室前的场地上打麻线。

弦弓及周围农村开始饲养秋蚕，改变过去只养一季春蚕的习惯，使桑叶得到充分利用，提高了农民收益。

解放后开弦弓乡第二任乡长姚伯生（姚富坤父亲）回忆：

“当年村里都是土法养蚕，姑娘家把蚕种（蚕卵）放在贴身孵化。有一次一位姑娘不小心压坏了蚕种，家里人很生气，小姑娘想不开就投了河。而且，养蚕户因不懂科学，蚕宝宝经常会生病，养得好全家高兴。蚕生病被迫倒掉，不但分文无收，还要欠债，甚至家破人亡。所以为求蚕事顺当，养蚕户经常求神拜佛，清规戒律很多。小蚕催青，闭门谢客，家中不许大声说话。

“费达生来开弦弓村，带来了科学养蚕技术。养蚕前，先对蚕室、蚕具消毒，稚蚕共育，科学控制温度和湿度，提高蚕种孵化率和增强幼蚕体质，彻底改变落后习惯。1925 年，我家就是当年被蚕业合作社租用土地，用于建造小蚕共育室。村民看到采用科学养蚕，提高了蚕茧产量和质量，有利可图，都想扩大蚕桑业，全村几乎家家种桑养蚕，桑地面积年年增加。”

开弦弓村蚕业合作社科学养蚕的信息，迅速传遍了太湖周围的乡镇。几年时间，女蚕校推广部在吴江县的七都、八都、严墓，吴县的光福、西山，无锡县的洛社、玉祁，武进县的横林、戚墅堰等地设立了蚕业指导所，组织蚕业合作社，实行科学养蚕。吴县光福除蚕业合作社外，还设立了机器烘茧灶，指导蚕农学习烘茧技术，干茧直接售与无锡、上海等地丝厂，减少了中间环节，农民得益更多，丝厂也大有裨益。以费达生为代表的这一批来自女蚕校的知识女性，得到广大蚕农的爱戴，赞美她们为“蚕花娘娘”。

开弦弓村的蚕丝改进也引起国外注意，周德华在《吴江丝绸志》记述：“一些日方报纸惊呼：‘中国有一批身穿学生装的女子在农村指导养蚕，促进蚕丝改革，势将为日本之劲旅。’改良取得成效，开弦弓的蚕桑生产在苏南一直处于领先地位……20 年代后期土丝改良从开弦弓区迅速向周围扩展，民国十八年（1929）全县（吴江县）设指导所 10 处，次年向北推至县城和平望两区，接受指导之乡村，震泽有 26 个，严墓有 22 个，湖滨有 18 个，平望有 4 个，城区有 2 个。”[①]

---

① 周德华：《吴江丝绸志》第 55 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年 9 月。

第二章　乡镇工业开先河创建缫丝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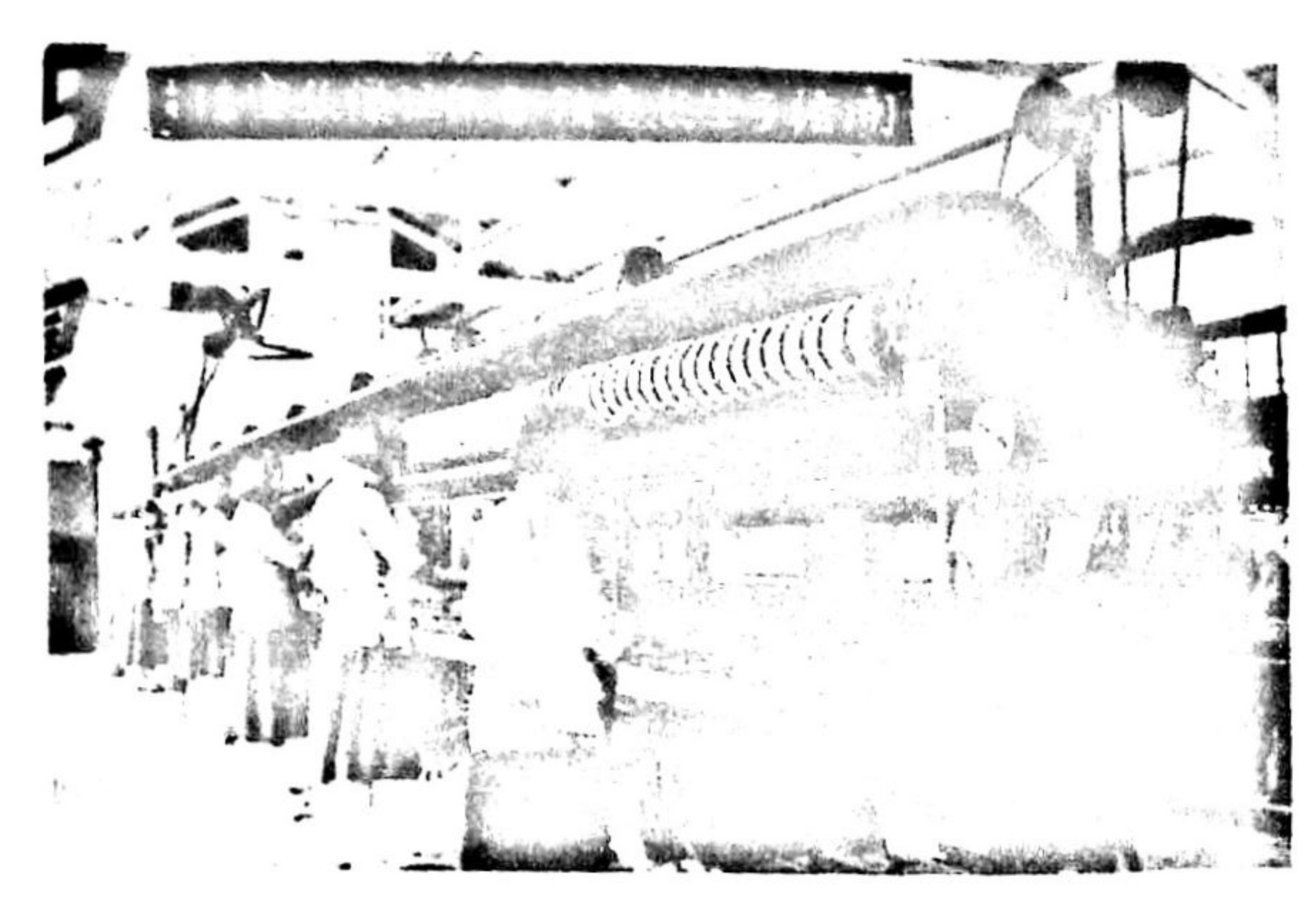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通过政府扶持，采用科学养蚕，机械缫丝，丝质大为提高。“清宣统元年（1909）日本生丝出口量已超过我国。至民国十五年（1926）华丝输出已不及日丝之三分之一。在当时世界最大生丝市场——美国，日丝占80%以上，而华丝仅占6%，且降为杂用丝。更有甚者，纽约生丝交易所不许华丝加入拍板（卖）。”[①]费达生在日本留学学的是制丝技术，回国后看到国内的丝厂设备陈旧，管理落后，生丝品质低劣，十分痛心，下决心要改革我国的制丝工业。

第一节　费达生建缫丝厂

在土丝改良获得成功的基础上，费达生为筹建机械缫丝厂作准备。1926年，女蚕校蚕业推广部改为蚕丝推广部，费达生任主任。她先在吴江县震泽镇进行土丝改良，举办制丝传习所，推广新研制的木制足踏丝车，开弦弓村派70余人接受培训。是年秋，费达生从村里选派年轻女子10余人，到女蚕校学习机械缫丝技术，经过3个月培训，回村后成为新式缫丝的骨干。

1928年底，开弦弓村经郑辟疆、费达生、陈杏荪、孙伯和、沈秩安、施文卿、杨文震等人的筹划，于次年（1929）初，成立吴江县震泽区开弦弓村有限责任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缫丝厂）。费达生负责技术设备和争取银行贷款，陈杏荪发挥自己在村里的号召力，开展宣传动员。不数日，入

① 周德华《吴江丝绸志》第52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9月。



1936 年，开弦弓村缫丝厂剿丝车间

社社员达到 430 户，占全村农户之半，共集资 753 股，每股 20 元，分 5 年入股，每年 4 元，第一年收股金 3012 元。再招收社员中善制丝者 60 余人，参加制丝技术培训。

1929 年 3 月 9 日，缫丝厂在村东小清河北破土动工，共建厂房 11 间，办公和生活用房 10 间，其中楼房 6 间，建筑面积 665.5 平方米。安装日本立缫式铁木结构缫丝机 32 台，复摇车 16 台，职工 70 余人。是年 8 月 5 日，中国农民自主创建的第一个乡村工业企业——开弦弓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缫丝厂）鸣笛投产。翌年再添置日本式 5 绪缫丝机 5 台，复摇车 5 台，另办茧灶 6 座，小锅炉 1 台。

合作社最高权力机构为社员大会，日常工作由社务委员会承担，下设监事会和理事会。社务委员会、理事会和监事会成员都由社员大会选举产生。由社务委员会选聘技术员、事务员、工作员等雇员。设工场部，由剥茧、选茧、煮茧、缫丝、复摇、生丝整理、丝检查、屑物等 8 部组成，负责各项技术工作。另设总务部，处理不属于上述各部的事务。民国十八年，有技术员 2 人，事务员 9 人，缫丝工 32 人，复摇工 2 人，生丝整理工 2 人，索绪工 2 人，缫丝预备工 2 人，剥茧工 9 人，选茧工 3 人，煮茧工 3 人，屑物整理工 2 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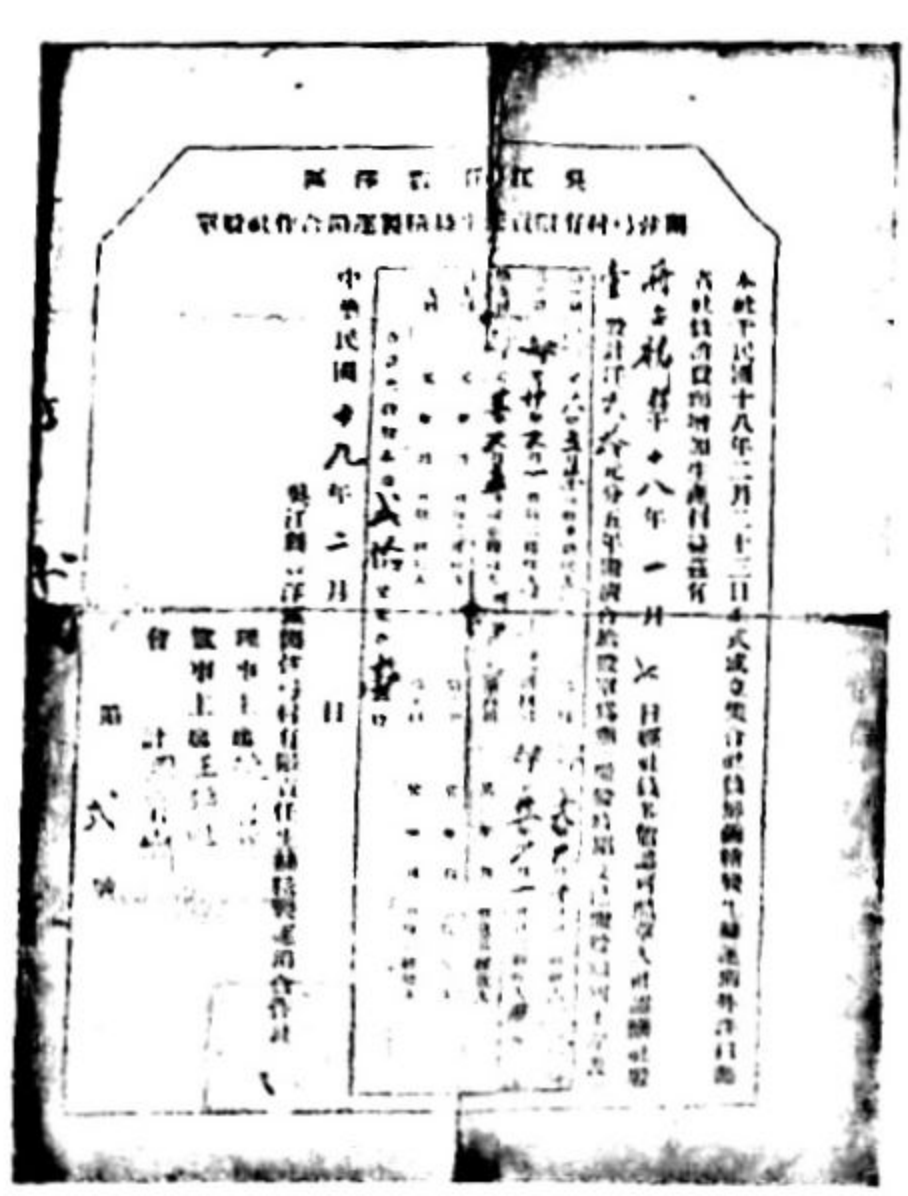
丝厂工人都是农家年轻女子，经过一段技术培训，即上岗操作。她们

平时作工，农忙时务农，增加了工资收入，提高了家庭地位。丝厂立足农村，以蚕业合作社为后盾，拥有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又得到女蚕校的技术指导和社会人士的支持，具有众多优势。所产厂丝，定名蜜蜂牌，以示勤劳团结，首批厂丝运销上海，经工商部商品检验局鉴定，清洁为96.7%，洁净为92%。蜜蜂商标又分正副牌号，每担售价分别为1100元及1000元。民国十八年末（开业第一年），产丝41.31担，获利10808元。

1930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的经济危机波及中国，丝价暴跌，国内不少丝厂纷纷停工或倒闭。开弦弓丝厂资金运转一度陷入困境，经受两年亏损的考验，以质量取胜，厂丝在上海打开销路，合作社业务转向兴旺。丝厂在诞生之初，奇迹般的在市场的大风大浪中站稳脚跟，充分显示出草根工业的顽强生命力。

第二节　股单租契巧珍藏

1999年11月，南京师范大学教授谢舜方在开弦弓村调查，在原金蜂集团公司接待室，召开由老缫丝厂做过工的蒋秀娥、蒋金娥和蒋银富等老人参加的座谈会。当谈到老缫丝厂厂名、股金等情况时，蒋金富忽然想起说："家里还藏有一张父亲蒋召麟认购的股单。"引起大家的兴趣，蒋金富应大家的要求，马上回家找出股单拿到会议室。打开一看，真是一张保存完好的"吴江县震泽区开弦弓村有限责任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股单"。引起与会者的惊奇和赞赏。与会人员一致认为：这是一件最能说清楚当年股份合作工厂情况的原始证据，是一件珍贵的历史文物。不能轻易脱手或丢失，应送国家文物档案部门收藏。



⊙ 村民蒋庆寿保存的1930年2月发行的开弦弓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股票

股单写明：

“本社于民国十八年二月二十三日正式成立，集合社员鲜茧精制生丝运销外洋以节省社员消费而增加生产利益。兹有蒋召麟君于十八年一月七日，经社员多数认可，照章入社，认购社股一股，计洋二十元，分五年交清，合给股单为凭（交股时期及已交股额列于左表）（表略），合计共交股本银二十元整，合一股。落款日期及签名：“中华民国”十九年（1930）二月，吴江县震泽区开弦弓村有限责任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理事主席陈杏荪、监事主席王锦魁、会计周宝山（印章）。”

2007 年 8 月，谢舜方带领课题组，来开弦弓村调查，在第十三村民小组，访问土地改革时期担任开弦弓乡乡长姚佰生。姚将自己珍藏历史资料的小包从二楼取下，打开后让课题组成员逐一寻找有用资料，很快被发现一张民国时期的“租契”。时间为民国十四年元月（公元 1925 年 2 月），由开弦弓村蚕丝改进合作社社董陈杏荪，出具给姚圣明（姚佰生祖父）、姚已生、姚财宝三家，租用宅基地建造“稚蚕共育室”。 这张“租契”的发现，从文史角度实证当年发生在开弦弓村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蚕业改革。到重新发现时，已相距 82 年。

“租契”写明：

“立租基地契，蚕丝改进社社董陈杏荪，为因本社乏地建筑，凭中说合，租到城角圩贰墐内，姚圣明基地叁块，租与本社建筑蚕室，北连场面行径出入，河桥水径，详细地图丈尺载明于后。每年租金洋玖元正，每年在上年冬至预交不致拖欠，言明三十年为期，期满之后，如若续租，租金或照旧或增或减，届时另议。两相情愿，各无翻悔。尤恐无凭，立此租基地契，存照。”

经谢舜方教授联系，“租契”和“股单”作为珍贵文物，已于 2007 年先后由江苏省档案馆收藏，发给姚佰生、蒋金富等保持人捐赠荣誉证书和“租契”、“股单”复制品一件，奖金各 1000 元。

⊙ 姚富坤家保存的蚕丝改进社租地的地契

第三节　陈杏荪著书立说

缫丝厂的成功创办，引起各界人士的高度关注，全国合作研究班及各级合作组织相继到开弦弓村参观考察。因为当时像开弦弓村这样像模像样办起工厂的村子，大家都没有见过，来访者见什么问什么。陈杏荪和费达生不得不在繁忙的工厂管理中，抽出时间不厌其烦地向来访者介绍情况，一次次重复回答来访者的提问。1930 年，陈杏荪为满足来访者的要求，写成《开弦弓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经过概况》一文，发表于《合作月刊》卷 2 第 9、10 期合刊上，为最早介绍开弦弓缫丝厂的调查报告。

⊙ 陈杏荪写《开弦弓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三年经过情况》一书的图片，印章为杭州图书馆。

1933 年 1 月，陈杏荪用建厂三年里积累的大量资料写成《开弦弓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三年经过情况》一书，由震泽顿塘印书局印刷出版。但是，由于年月久远，当年工厂的创办人和厂里的老工人都已先后去世，这本书早已淹没在历史的潮流中，使后人在关注和研究创建于 1929 年的开弦弓村股份制缫丝厂时，仅有一些粗略的记述资料供参考。

发现《开弦弓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三年经过情况》一书的青年，名字叫岳钦韬，浙江嘉兴人，当时在复旦大学历史系读博士。小岳读初二时，就与吴江的周德华和朱云云有过联系，就有关苏嘉铁路问题开展研讨。当时，朱云云给这位陌生的初二学生写了一封长信。除写上鼓励的话和介绍一些苏嘉铁路的情况外，主要篇幅是对小岳进行劝导："初中阶段的学习门门功课都重要，都是进一步学习和工作的基础，决不能因课余兴趣和研究而影响学习。只有先学好功课，争取考上重点高中和有相应专业的大学，使自

己的研究有一个高起点，才能为国家和社会作出大的贡献。同时，你还是未成年的初中生，你的课余研究必须征得父母亲的同意，并在父母的指导下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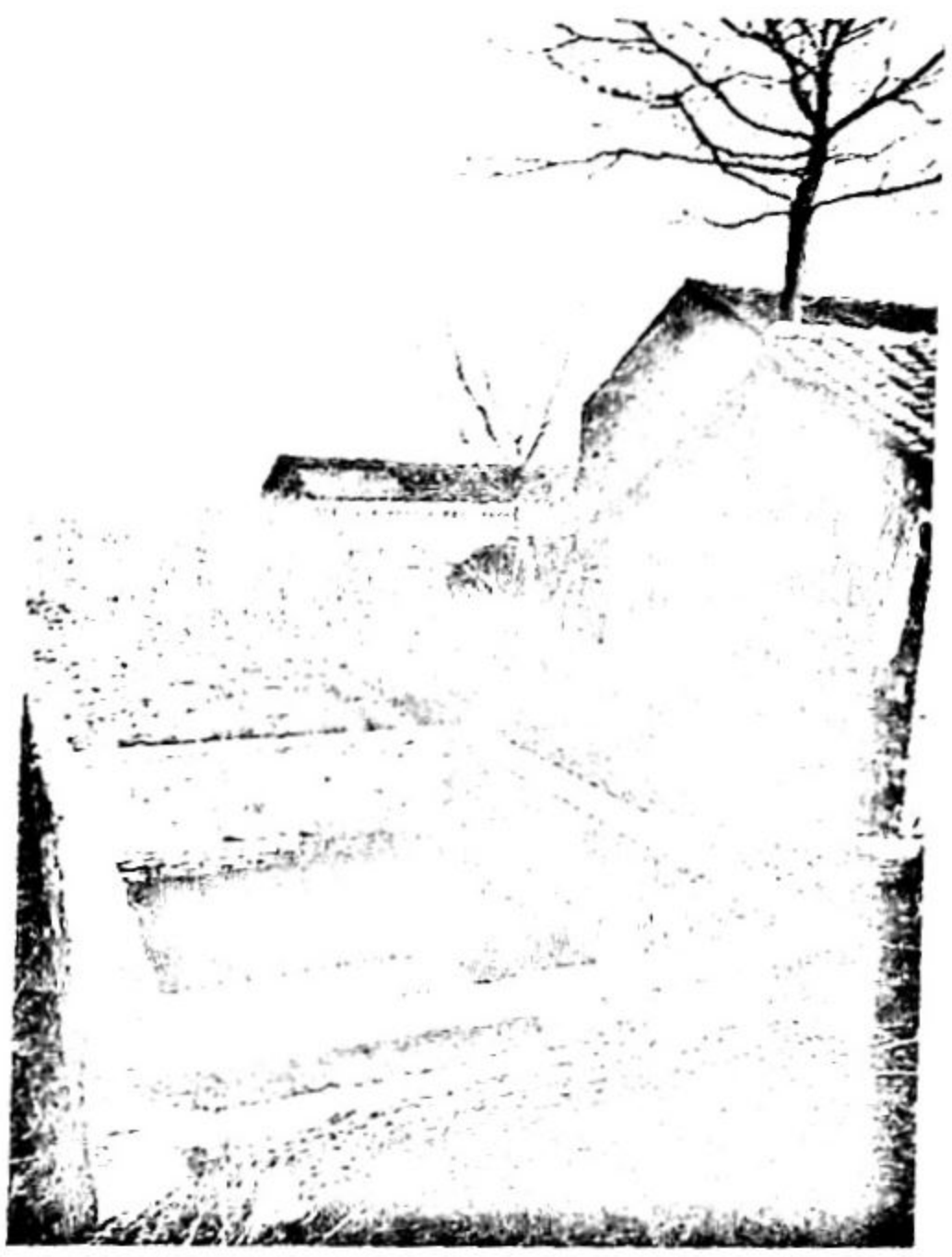
想不到的是，由一位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写的这封平实的信，使小岳摆正了学习和研究的关系。2000 年，岳钦韬以优秀的成绩考入浙江省重点中学嘉兴一中；2003 年，录取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2007 年，进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读硕士研究生；2010 年，考取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几年里多次获奖。

小岳不忘旧情，多次在假期里抽空来吴江，拜访周德华和朱云云两位忘年之交。2007 年，当他知道朱云云正与姚富坤合作撰写《江村变迁》的专著时，主动利用自己查找历史资料的优势，查找到 1957 年反右运动前后 20 多份有关费孝通先生的专著和文章，弥补了写作中的资料缺口。2011 年，小岳得知朱云云参与《开弦弓村志》的编纂工作时，又热心地从复旦大学民国时期的期刊文库中，查找到 6 份关于开弦弓村创办股份制缫丝厂的新闻报道和调查报告，发给朱云云，充实村志的编纂。

2013 年初秋，岳钦韬在杭州古籍图书馆查阅资料时，惊喜地发现《开弦弓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三年经过情况》的书名条目，经小岳努力，在杭州古籍图书馆的支持下，制作了该书的照相文本。这本由开弦弓缫丝厂创始人之一的陈杏荪撰写，详细记录中国农村创办的第一家乡村企业的已被历史尘封的权威性著作，相隔 80 多年后，终于又与世人见面，提供了建立开弦弓村股份合作制缫丝厂真实、准确的史料，弥足珍贵。

第四节　日军破坏如豺狼

在女蚕校郑辟疆、费达生等爱国志士带领下，经过艰苦的技术下乡和工业下乡，不但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家乡村股份制工业企业（缫丝厂），影响和推动了中国蚕丝业的技术进步和发展。而且推动了江浙一带蚕丝区，普遍采用科学的养蚕技术和先进的缫丝设备。新型的机械制丝厂很快代替了落后的土丝加工，产量增加，丝质提高，丝价上升，蚕农受益。使古老



⊙ 1982 年摄，在村东 1929 年创办的中国最早的乡镇工厂缫丝厂遗址，唯一能看到的当年残留的水池。1938 年，缫丝厂被日本侵略军摧毁。

的蚕丝业焕发出青春活力，提升了中国缫丝工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蚕丝业敌视已久，1937 年 7 月 7 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缫丝工业成为日本侵略者肆意破坏的重要目标。“8•13”淞沪抗战后，日军上海登陆，日机对吴江骚扰频繁。9 月上旬，吴江遭到首次空袭，目标对准平望制丝所，第一枚炸弹落在煮茧车间屋顶，幸未爆炸起火，时平望镇上居民已开始疏散，制丝所被迫遣散工人，10 月初关闭制丝所。平望陷落后，制丝所厂房被日军毁坏，机器被拆走，仅留下一座二层楼茧库，因作日本警备队驻地而幸存，成为日军侵略的历史见证。

1937 年 11 月 17 日，日军沿公路向西进犯震泽，震泽制丝所首当其冲，留守厂房之警卫被日寇枪击致死，厂房设备俱被焚毁，仅存茧库及烟囱。吴江及周围地区沦陷以后，日军大肆砍伐平望至南浔公路两侧桑园，以防游击队袭击，并频繁下乡扫荡骚扰，使乡民无心经营蚕业。另外，粮食及柴薪价格飞涨，亦使桑园减少。吴江及周边地区蚕丝业遭到毁灭性破坏。

1938 年冬天，日本兵从震泽坐船到太湖边扫荡，进入开弦弓村，有一队日本兵驻扎在缫丝厂，女职工得知消息，急忙逃跑和躲藏。日本兵进驻开弦弓村后，在小清河北岸缫丝厂旁建造 1 座炮楼，瞭望和监视全村及河道进出口。日本兵撤走时，把缫丝厂设备上的铜、铁器从机器上敲下来带走，锅炉也被拖到震泽。日本兵一走，村里人都去向厂里负责人央求拆厂，因为机器都被破坏得不能用了，空留着厂房担心日本兵还会来住。于是在第二年春，入股社员一起动手，在一个晚上拆完了厂房……缫丝厂就这样被夷为平地。开弦弓村村民的第一次工业化希望被扑灭。

第三章　无意插柳费孝通写江村经济

费孝通自1936年首访开弦弓村以来，先后26次对该村作社会学调查，世称“江村访问”。他牢牢扎根在最基层、最朴实的中国农民生活之中，真实记录开弦弓村这个普通的江南农村社区长达七十年的变迁。开创了国内持续时间最长、取得学术成果最丰富和在国内外影响最大的社会学调研基地，不但为致富农民和推动农村工业化作出不可估量的贡献，而且在学术研究上成为从实求真、学以致用的典范。每年吸引着一批批国内外学者的来访，使开弦弓村成为世界观察中国农村的窗口和国内外学者研究中国农村的首选样本。

第一节　瑶山结下生死缘

费孝通，1910年11月1日生于江苏省吴江区松陵镇，2005年4月2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1930年，费孝通由苏州东吴大学转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后又考入清华大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系。1936年，费孝通取得公费留学资格，赴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师从布·马林诺斯基，获博士学位。

费孝通在出国留学前，接受导师史禄国教授的建议，先到国内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一次实地调查。适逢广西省教育厅正有普及国民教育、调查特种民族情况的要求，费孝通偕新婚妻子王同惠赴广西大瑶山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特种民族的调查，这是一段具有拉开序幕和破题意义的传奇式的重要经历。这时在他们的调查计划中，还没有出现开弦弓村的名字。

1935年秋，费孝通和王同惠从北平（今北京）出发，辗转来到广西省

首府南宁。10 月 8 日晨，在广西省教育厅的协助下，在微雨中搭乘长途汽车，行驶在两侧峰峦林立、山回路转、高低不平的公路上，颠簸来到与南宁相距 350 公里的柳州。10 月 12 日，再坐小火轮，顺着水道曲折、水流颇急的柳江南下，在月色千里的半夜，来到瑶族主要聚居地之一的象县。他们的调查从象县县城抽样测量当地人的体格开始，以推知当地土著人与外来移民的结构情况。

瑶山调查在重重困难中推进。村与村之间山陡路险，荒无人烟，他们日餐淡饭，夜卧土屋，费孝通重点对瑶民进行人体测量，王同惠调查社会生活情况。晚上，他们讨论当天搜集到的资料和第二天的调查内容，除去直接的调查，还同瑶民一同聊天、做活，为瑶民治病，受到瑶民的信任与喜爱。他们以花蓝瑶一个聚居地六巷为基地，前后住了 25 天，调查六巷及周围的大橙、古浦等地的花蓝瑶社区情况，接着又调查了坳瑶聚居的古陈等地。

1935 年 12 月 16 日，费孝通和王同惠完成对坳瑶的调查，离开象县古陈，向茶山瑶调查基地平南县的罗运乡转移。途中行至潭清地名的岔路口时，因向导先行不候，误入一片竹林之中，林中阴暗，见前方一门似设备，以为到了近村。费孝通探身察看，不料那是古陈村瑶民设的虎阱，踩到机关，木石齐下，腰足俱伤。危急中，王同惠奋不顾身，把压在费孝通身上的石块逐一移开，艰难地将费孝通拉到安全地带，然后奔出林中呼救。

⊙ 费孝通偕新婚妻子王同惠赴广西大瑶山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特种民族的调查。图为出发前在北京的合影。

费孝通在荒林里痛苦地熬过寒夜，破晓后忍痛往外爬行，几经周折，才遇村民解救，背回古陈。但王同惠失踪未回，古陈民众一连寻找 6 天，未见踪影。第七天，有村民在一山壁处发现有野藤折断的痕迹，遂在附近山涧急流中，找到

了王同惠的遗体。古陈村民各户捐东毫2毫，按照瑶族风俗，为王同惠女士举行隆重的悼念仪式。悲痛已极的费孝通，由村民背负到王同惠遗体前，向王同惠告别。在地方人士和友人的资助下，王同惠遗体安葬在广西梧州市西山公园，费孝通被送往广州市柔济医院医治。

王同惠的不幸离世，使费孝通陷入极大的痛苦之中，无可选择地结下了生死姻缘。随着伤情逐渐好转，费孝通怀着对王同惠的纪念和师友们的期望，在广州市柔济医院，开始整理他和王同惠在瑶山调查中搜寻的资料，以王同惠的名字写成《花蓝瑶社会组织》一书，完整地展现出花蓝瑶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从走向瑶山那一天开始，费孝通踏上了日后为中国建立和发展自己的人类学、社会学，“行行重行行”的坎坷的人生征程。

第二节　江村养病作新篇

翌年暑期（1936年6月），费孝通回家乡吴江，一方面继续养伤，同时为出国留学作准备。在此期间，他接受姐姐费达生的建议，来到开弦弓村，住在姐姐与村民一起创办的缫丝厂内，使他亲眼目睹和记录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乡村工业企业。费孝通从小在县城长大，接触农村的机会较少，虽然吴江是他的家乡，但当他坐船进入开弦弓村时，宁静的环境、纯朴的民风和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深深吸引了刚从痛苦中恢复平静的费孝通。

⊙ 1936年，费孝通“一访江村”与小村民合影。

费孝通抓住了一个转瞬即逝的认识中国传统农民生活的历史机遇，调查的激情油然而生。他决心把村子里的情况记录下来。在社会学发展史上，一次在国内外都具有深远影响力的“江村调查”，就这样在

无意中萌动了。他在姐姐的引导下，得到村民们的配合和村长的帮助，使“无意插柳”的江村调查，进行得十分顺利。

据开弦弓村多名见到和接待过费老“一访江村”的老人回忆，当年年轻的费孝通，戴着眼镜，穿着长衫，为人真诚，待人和气，有知识分子的气质，无知识分子的架子。他热心为村民服务，多次为村民的竹编器具上题写堂名，与村民相处亲密无间。因为村民们尊称费达生为“费先生”，所以热情地称费孝通为“小先生”。费孝通随便走到哪家，村民都把他当成自家人看待，都愿意把自己的甜酸苦辣，毫无保留地讲给他听。

他在村里串门走户，与村民交朋友、聊家常，有关劳动生活、生老病死、风俗习惯，都要问得很详细，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摸清了开弦弓村农民在生产、消费、家庭、婚姻、土地占有等各个方面的关系和制度。他敏感地从姐姐费达生“技术下乡”的行动中，以及在她的指导下，与村民们一起创办合作丝厂的事实，看到了中国农村进步和发展的希望——农村工业化。

费孝通在《江村经济》第二章中，专门分析了“选择开弦弓村这个调查区域的理由”[①]：

1、开弦弓村是中国国内蚕丝业的重要中心之一。在过去的十年中，进行了蚕丝业改革和创办工业企业的实践，可以把这个村子作为在中国工业变迁过程中有代表性的例子，主要变化是工业代替家庭手工业，并从而产生的社会问题。

2、开弦弓一带，自然资源极佳，农业发展到很高水平。有关土地占有制度在这里也有特殊的细节，开弦弓将为研究中国土地问题提供一个很好的实地调查的场地。

3、这个地区广泛使用水上交通，有着网状分布的水路，因而城乡之间有着特殊的关系，这与华北的情况截然不同，能够通过典型来研究依靠水上运输的集镇系统。

4、开弦弓村属于吴江县，自己是吴江人，首先在语言上有一定的有利条件。自己的调查必须在两个月之内完成，作为本地人，就不必再花费时

① 费孝通《江村经济》第18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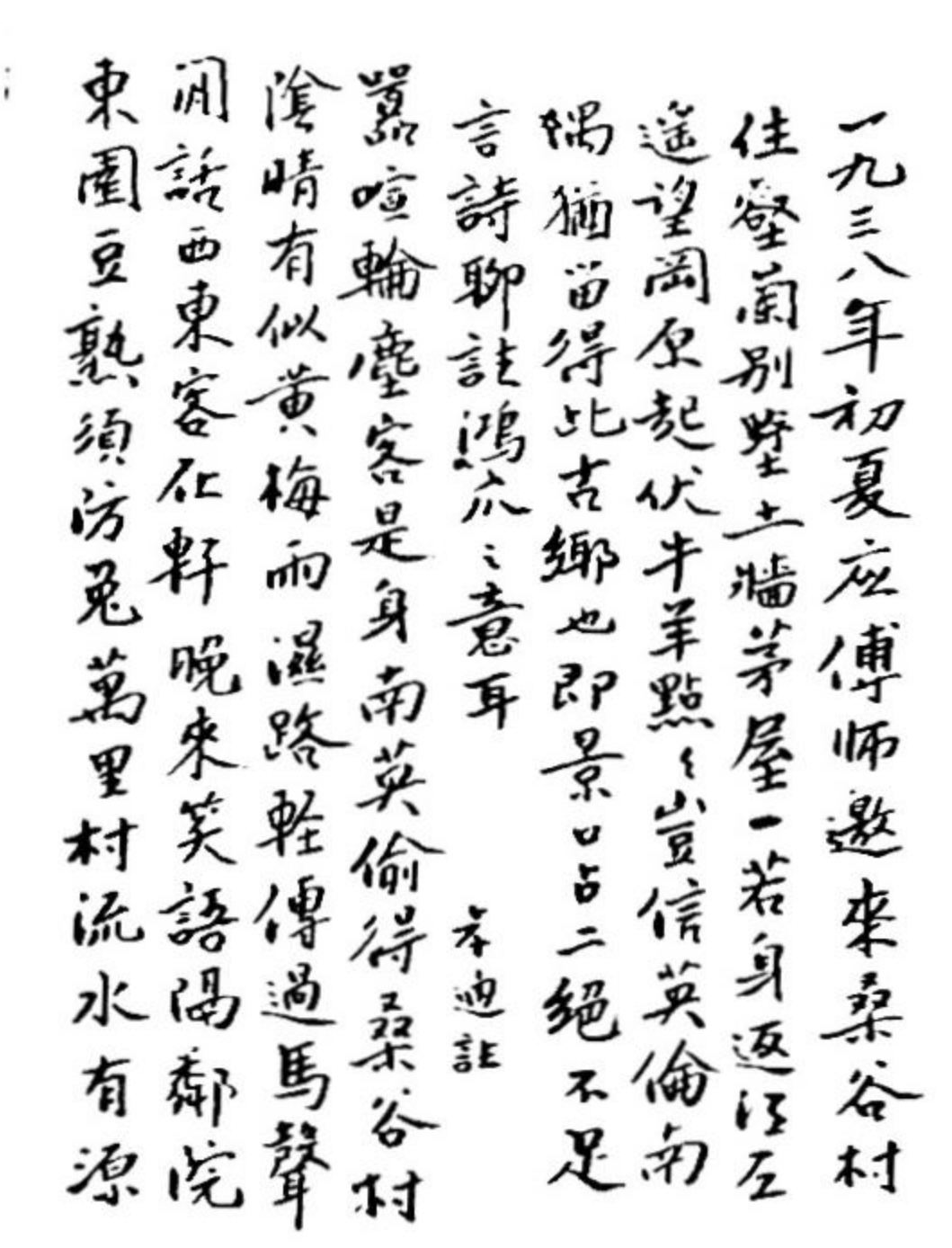
间去学习当地方言。而且有同乡的感情，容易深入到人们的生活中去。

5、姐姐在村里负责蚕丝业的改革，村里的人都很信任她。自己在以前多次访问过该村，姐姐已提供很多该村的情况。到该村调查容易得到全村居民的通力合作，特别是村长们的帮助。

第三节　导师喻为里程碑

1936年9月，费孝通离开家乡，带着广西瑶山和江苏开弦弓村两份调查材料，由上海坐船，漂洋过海，踏上赴英国留学的新征途。他回忆说："我去英国，乘坐一艘意大利邮轮'白公爵'，从上海到威尼斯航程地两个多星期。我在船上无事，趁我记忆犹新，把开弦弓调查的资料整理成篇，并为该村题了个学名叫'江村'。"①

费孝通到了英国，进入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人类学系，师从马林诺斯基。在导师指导下，研究文化变迁问题，并由导师选定用开弦弓村调查资料撰写博士论文。主要的学习方式是参加"席明纳"(Seminar)，类似于中文中的讨论会。马林诺斯基不喜欢登台讲课，在课堂上他从不作大段的发言，总是先安排一两个主要发言人，宣读事先准备的文章，有的是调查报告，有的是对某一社会问题提出的意见。他随时插话，启发思路，引导大家开展讨论和辩论。费孝通十分喜爱


一九三八年初夏应傅师邀来桑谷村
住壁崗别墅土牆茅屋一若身返江左
遥望岡原起伏牛羊點点豈信英倫南
隅猶留得此古鄉也即景口占二絕不足
言詩聊詩鴻爪之意耳　方迪註
囂喧輪廓客是身南英倫得桑谷村
陰晴有似黃梅雨濕路輕傳過馬聲
閒話西東客在軒晚來笑語隔鄰院
東園豆熟須防兎萬里村流水有源

⊙ 1938年初夏，费孝通留下的最早的墨迹，记录了美好的留英生活。

① 费孝通《江村经济》著者前言第1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

这样的学习方式，从中学到新的知识和理念。

费孝通一边学习理论知识，一边撰写论文。1938年春季，费孝通申请的论文答辩获得通过，由伦敦大学授予博士学位。博士证明书上标明的论文题目："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即后来在英国出版的《江村经济》一书。当年，导师马林诺斯基在为该书写的序言中，赞誉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①]。他对这一赞誉的内在意义，还在序言中作了十分生动和权威的评述：

"此书有一些杰出的优点，每一点都标志着一个新的发展。本书让我们注意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作者并不是一个外来人，在异国的土地上猎奇而写作的。本书的内容包含着一个公民对自己的人民进行观察的结果，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人在本乡人民中间工作的结果。如果说人贵有自知之明的话，那么，一个民族研究自己民族的人类学当然是最艰巨的，同样，这也是一个实地调查工作者的最珍贵的成就。"[②]

1987年，《红旗》杂志第5期，载文《读费孝通同志的名著〈江村经济〉》，作者高怀，文中介绍："全书共16章，涉及土地所有制、农村生产、发展乡村工业和副业、普及文化教育、推广先进的科学技术、医疗卫生、环境住宅、人口生育、家庭婚姻等，直至维系家属、家庭成员的精神支柱——封建伦理道德观念问题，都作了较为详细的描述和分析。脚踏实地、深入细致地调查了解，忠于事实、客观冷静地分析研究，是这本书得以享誉海外的基础。全书文笔流畅，通俗易懂，详实地向读者展现出一幅幅中国传统农村的画面，生动反映了当时农村的经济、社会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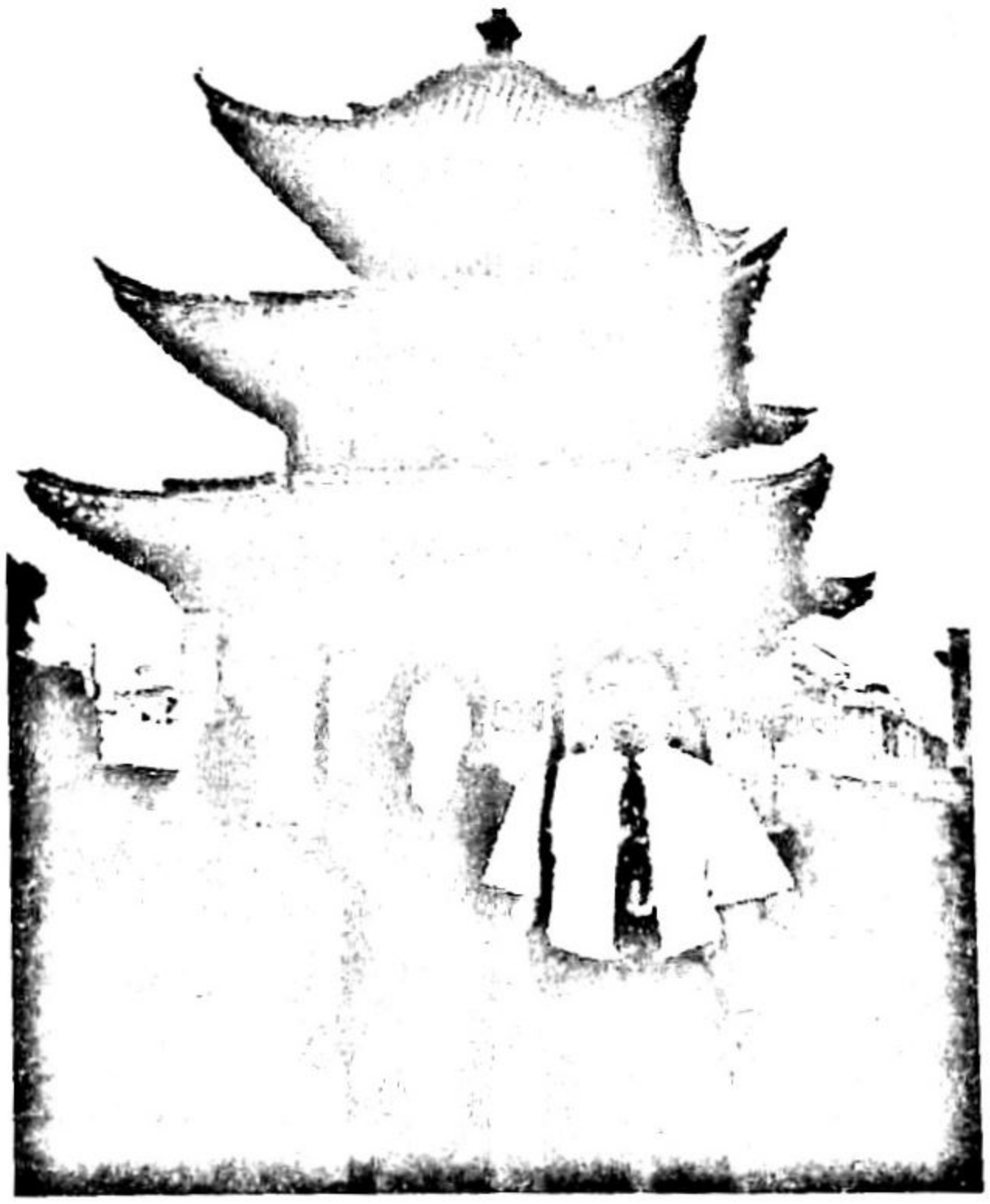
在西方许多大学的人类学课程中，《江村经济》被列为必读参考书。在半个世纪中，该书被翻译成十一国文字，在国外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鉴于费孝通对人类学研究所作的杰出贡献，1981年英国皇家人类学会特授予他赫胥黎奖章，同时又重印了这本书。1986年10月，由中国科学院戴可景将《江村经济》的英文原著译成中文，第一次在国内出版和发行。

---

① 费孝通《江村经济》序，第1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一版。
② 费孝通《江村经济》序，第1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一版。

第四节　山河破碎奔云南

1938年秋，费孝通获博士学位后，离英回国。当时抗战烽火已烧遍半个中国，他在轮船上得到广州沦陷的信息，临时决定在西贡登陆，转途直奔祖国的云南昆明。1939年，出于老师吴文藻先生的擘划，燕京大学与云南大学合作成立社会学研究室，由费孝通以云大教授的名义主持研究室的工作。参加人员有燕京大学、云南大学社会学系的毕业生、研究生和教授十几人。1940年昆明遭到日本大轰炸，社会学研究室不得不疏散到昆明附近呈贡县的农村，租得一座古庙中三层楼的魁星阁，作为工作基地，因此这个研究室也就从此被称为“魁阁”，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才回到昆明。



⊙ 2000年8月北京大学潘乃谷、王铭铭教授在云南访问“魁阁”

迁入魁星阁不久，费孝通和他的学生张之毅投入云南三村（分属云南省禄丰、易门、玉溪三个县）的内地农村调查。这次调查从1938年11月15日起至12月13日止。翌年在教学期间，费孝通将调查材料整理成文，并乘着暑假第二次调查禄村，充实素材，写成《禄村农田》，于1940年出版，成为继《江村经济》后的早期力作和中国现代社会学的名著。张之毅在费孝通的指导下先后撰写了《易村手工业》和《玉村农业与商业》。为了油印《易村手工业》，费孝通曾一字一句地亲手刻写蜡板；为了出版《玉村农业和商

业》，又一字一句地亲自校阅文稿，这三本书就是社会学界著名的《云南三村》。

费孝通在《禄村农田》中这样说："这本《禄村农田》可以说是我那本《江村经济》的续篇。在理论上我将根据《江村经济》的结论，用我在禄村所见的事实，加以修正和发挥。"[①] 他把云南三村调查看做是江村调查的继续和深化，并从这些调查中取得的素材上升为理论，编写"乡村社会学"教材进行讲课。再在教材基础上，编印出版《乡土中国》、《皇权与绅权》、《乡土重建》、《生育制度》、《中国乡村工业》等社会学理论著作，进入费孝通先生学术生涯中的第一个学术丰收期。

在"魁阁"的6年里，费孝通聚合志同道合的青年一直在这个研究室工作。1935年，美国大使馆文化关系专员费正清夫人访问魁星阁时看到："顶层有木佛，一个助理研究员在那里办公。二层有佛像，有三张桌子，当中一张饭桌上摆着茶壶，三个书架装满书籍和文稿。这里是研究人员办公的地方，有时站长在这里召集会议，研究工作进展情况。一层是厨房和通道。物质条件很差，但艰苦的工作精神和青年人明确的工作目标，给人以深刻印象。"[②]

50年后，费孝通回忆时动情地写道："这一段时间的生活，在我这一生里是值得留恋的。时隔愈久，愈觉得可贵的是当时和几位年轻的朋友一起工作时不计困苦、追求理想的那一片真情。以客观形势来说，那正是强敌压境、家乡沦陷之时，战时内地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是够严酷的了。但是谁也没有叫过苦，叫过穷，总觉得自己在做着有意义的事。吃得了苦，耐得了穷，才值得骄傲和自负。我们对自己的国家有信心，对自己的事业有抱负。那种一往情深，何等可爱。这段生活在我心中一直是鲜红的，不会忘记的。"[③]

---

① 《禄村农田》载《费孝通文集》第二卷，第221页，群言出版社，1999年10月。
② [美]戴维·阿古什《费孝通传》78页，时事出版社，1985年11月。
③ 费孝通《云南三村·序》载《费孝通文集》第十一卷，第134页，群言出版社，1999年10月。

第四章　走进开弦弓鱼米之乡蚕桑地

开弦弓村地处长江三角洲地区富饶秀美的太湖东南岸，距上海120公里，苏州50公里，杭州100公里。村区域总面积4.5平方公里，土地平坦肥沃，是著名的鱼米之乡和蚕丝产地。周围河港纵横，湖荡密布，属典型的江南水网地区。直到1980年代初，还保留着沿河人家、户户泊舟的水乡风貌。

第一节　沿河人家泊渔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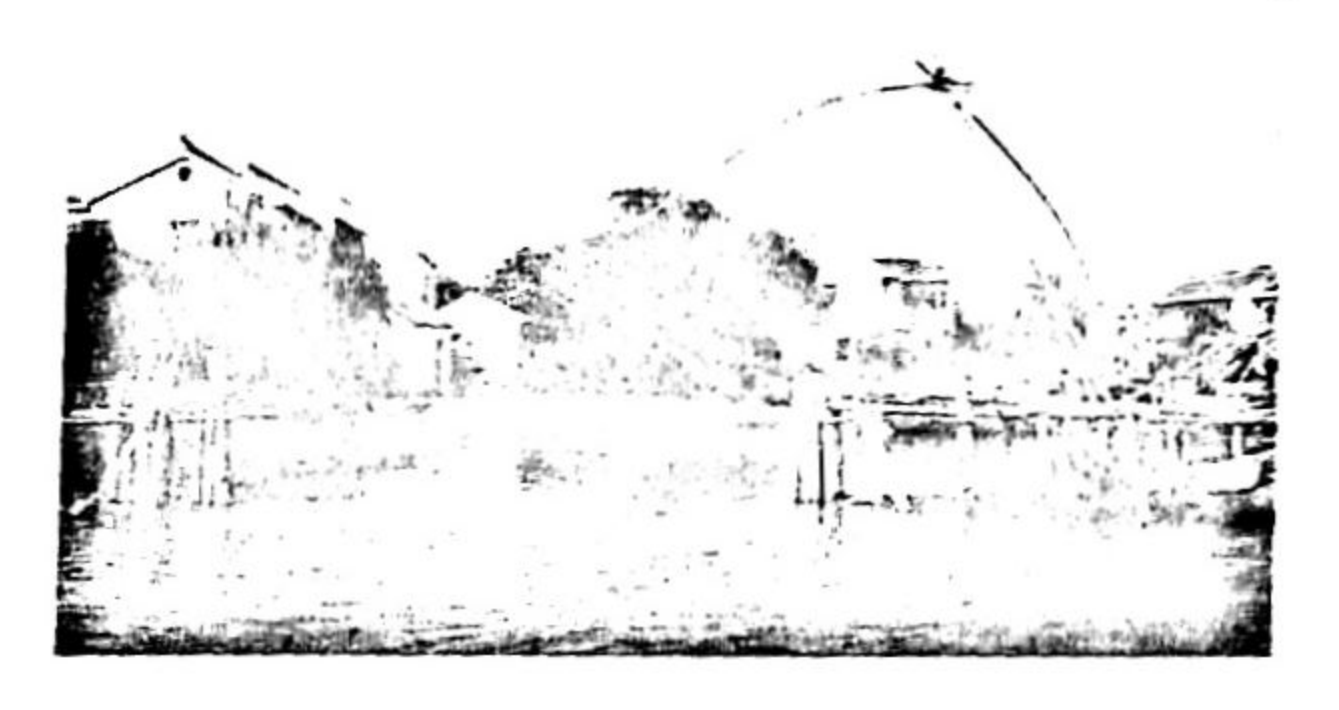
费孝通1936年一访江村、1957年重访江村、1981年三访江村、1982年四访江村，都是从震泽镇坐船进开弦弓村的。他在书中介绍说："开弦弓是一个农村的名称。这个村子是在苏州南边，吴江县境内，靠太湖不远，可说是在水乡深处，从附近的震泽镇摇船进去，还要二个小时。"[①]

村南不远处是以水面积9000多亩的长漾为中心的湖荡区，散布着大小湖荡20多只，其中东藏荡和西藏荡分布在村子的两侧[②]。农业经济时期，全村由开弦弓、荷花湾、西草田、天字圩、四方圩5个自然村和15只圩组成。村子里的农田都分布在水域环绕的圩上，村民进镇或到田里干活，都要坐船。

去村西北3公里是我国第三大淡水湖——太湖。太湖盛产白鱼、银鱼和白虾，素称太湖"三白"，当地民间常以"日出一斗金，夜出一斗银"赞誉太湖周边地区的富裕。历史上，沿湖村民的生活依赖于太湖。近村镇处都有联通太湖的小型河道，统称"七十二漾港"，洪涝时为太湖泄洪，干旱

---

① 费孝通《重访江村》，见《爱我家乡》第1页，群言出版社，1996年。
② 东藏荡水面积1102亩，西藏荡水面积501亩，见《庙港镇志》第63页。



⊙ 开弦弓村地处江南水网地区。直到1980年代初，还保留着沿河人家、户户泊舟的水乡风貌。

时引太湖水灌溉。养鱼农户摇船进太湖，捞水草或螺蛳养鱼，割蒿草喂牛。而渔民常在河口附近的湖面上，插上长长的簖，捕捉顺流进出太湖的蟹、鳗等回游水产。

清澈的太湖水通过众多漾港，流入下游河网，成为城乡居民生活饮用和农田灌溉的主要水源。其中大庙港、乌鹊港、沈家港等多条通湖漾港，都能与东藏荡、西藏荡和小清河等组成的村域内的水系相联通。由于水域宽阔，水质清澈，渔业历来是开弦弓村重要的副业项目。

历史上，村里有专业鱼鹰户和捕虾户，鱼鹰是一种捕鱼水禽，经过驯养，成为专职渔民的捕鱼工具，一直延续至今。1936年，村里有3户渔民从事鱼鹰捕捞，有鱼鹰70只。1950年，村里有鱼鹰捕鱼户5户，鱼鹰50只，年捕捞量30吨。以后由于围养面积扩大，捕捞水面逐年缩小，至2010年仅有鱼鹰船1条，鱼鹰3只。

多数村民用丝网、耥网、赶网、拱网、甩网、驼网、滚钩、竿钓、牵钓、鳝鱼钓、罩、罾、鱼叉、鱼簖、虾笼、地笼等传统捕鱼工具，业余捕捉野生鱼类，改善生活，以自食为主，成为食品的来源之一。80年代初期，开弦弓村在东藏荡港口筑簖，集体围养野生鱼类。并放养鱼种，派人管理，开始外荡养殖业。90年代中期，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里，村民把稻田桑地租给养殖户，开挖鱼池，养殖虾、蟹、鳜鱼、鲫鱼等，取得几倍于种粮的经济效益。

第二节　男耕女织绿田畴

费孝通在《九访江村》中，分析了开弦弓村世代相传的农业经济结构，他说："在历史上，苏南农民另辟蹊径，他们很巧妙地把畜牧业、种植业和

手工业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最典型的便是栽桑、养蚕和缫丝，这便是所谓的家庭副业。其实副业并不副，如果按照我在30年代的调查结果，农民的生活是吃用各半的话，那么副业满足了农民除吃粮之外的另一半生活需求。吃靠土地，用靠副业，男耕女织，农副相辅，这种家庭经济结构，充分显示了苏南农民为谋求生活所激发的特有的创造性和主动性。这种结构作为历史传统一直流传下来，成为当时最理想的经济结构，苏南这块地方也成了人们向往的‘天堂’。他们的命根子被掰成两半，一半是土地，另一半就是包括手工业在内的家庭副业。”[①]

⊙ 2005年，开弦弓村农宅傍的桑地。

⊙ 2008年，开弦弓村的稻田，远处为村部办公室和工厂。

开弦弓村水田多，旱地少，人均土地少，属人多地少地区。1952年全村有耕地5776亩，669户，人口2469人，人均耕地2.34亩。2005年，全村水稻田1230亩，桑地650亩，还可看到男耕女织的传统农业经济结构的模样。2010年，全村25个村民小组，747户，人口2888人，耕地面积2975亩，人均耕地1.03亩，大部分改鱼塘养鱼，全村仅有水稻田99.8亩，桑旱地255.2亩，养蚕业逐渐被淘汰。

费孝通所说的“男耕女织”中的“男耕”，就是耕田，种粮食。开弦弓村主要种植水稻、小麦、蚕豆和油菜，解决人类生存最基本的问题——吃饭。农田耕作以两熟为主，水田秋熟作物全部种植水稻，春播秋收，种植面积广，产量高，称为大熟。三麦、油菜和蚕豆，是越冬作物，秋播种，第二

① 费孝通《九访江村》，见《爱我家乡》第113—114页，群言出版社，1996年。

年的夏初收获，种植面积仅占耕地的38%左右，产量比水稻低得多，所以称为小熟，又名“春花”。“春花”巧妙地利用冬季的农时，与大熟交替轮作，成为农民生活中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粮食和家庭开支不可缺少的补充。耕作中，挑担、罱泥，挡犁、踏耙都是气力活，主要由男劳动力承担，所以称为“男耕”。

“女织”，就是织布，解决人类生存的另一个重要问题——穿衣。在开弦弓村，就是发展蚕桑业，利用旱地种桑养蚕，冬季套种蔬菜。蚕以桑叶为食，经4眠（即蜕4次皮），吐丝结茧。一亩成林桑树，可养春蚕3张，加上夏秋两季，一年能养蚕5—6张。1936年，全村80%的农户养蚕，“每张蚕可以增加12至16元收入。”[①]每户平均养蚕4.5张，为家庭增加收入54元至72元，折算成大米约300至400公斤，在家庭收入中居副业的首位。村民把蚕茧缫制土丝，大部分出售盛泽丝绸市场，供绸户织绸和外贸出口，小部分土丝由养蚕户农闲时家中自织。蚕桑业的主要农艺有：种桑、养蚕、缫丝、织绸等，相对粮食种植劳动强度要轻得多，而且比较细致，主要有妇女承担，所以称为“女织”。

第三节　香火绵续添生机

走进开弦弓村，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座错落有致的民居，居住着一个个家庭，其成员主要由夫妻及其父母和未婚子女所组成，一家人共同生活、生产、消费和共同占有财产，被喻为社会的细胞。人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体，每一个正常生活的村民都要经过出生、抚育、求学、工作、恋爱、结婚、生育、衰老、直至死亡的生命过程，也就是说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由婚姻为纽带组成的家庭，通过生儿育女，世代相传，实现社会和文化的绵延。

1936年，费孝通初访江村，上年（1935年）村里作过一次人口普查，全村总人口为1483人（包括寄居村里的外来户25人），组成360个家庭（户），

① 刘豪兴：《农工之间》，载《社区研究与社会发展》第432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

⊙ 1957 年，联合丝厂筹建人周梅生（左）一家在用晚餐，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村民家庭要计算着吃饭和用度，维护温饱。

每户平均人口数为 4 人。孩子从小在家庭中受到教育，六七岁时，一部分孩子进学校[①]，学习文化。十三四岁时，开始做些辅助性的家务和小生活，如割羊草，喂鸡鸭。按照当地风俗，孩子 16 岁踏进成人行列，家里办酒席，亲戚朋友前来贺喜，并送贺礼。男孩开始跟着父亲在田里学做主要农活，女孩向母亲学养蚕、缫丝和针线活，接受父母经验性的生产和生活知识。十八岁起，恋爱结婚，称为成家立业。

同时，父母的生产、生活经验，连同“勤俭持家”、“知足常乐”、“种田万万年”等爷爷奶奶传下来的观念，毫无保留地传给自己的子女。子女又把经验传给下一代，实现文化的世代相传。在科学技术进步十分缓慢的农业社会里，这种发生在各个家庭里的代际循环，几乎在同一水平上周而复始。所以村民间有“儿子看父，女儿看母”的说法。意思是儿子是父亲的复制品，女儿是母亲的复制品，看一家小孩长大了有多少作为，只要看看他们的父母就知道了。

总人口分析　1937 年至 1956 年，开弦弓村人口下降。其中：1937 年 2068 人，1956 年 1882 人（不含西草田村），减少 186 人。主要原因，一是解放前战争不断，村民缺少安定的生活环境和生活保障；二是医疗条件差，人口平均寿命短，婴儿死亡率高；三是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差，因开弦弓村地处低洼的湖荡区，又近太湖，常遭受洪涝灾害。1961 年，处于“三年困难时期”，饥饿造成死亡率增加和出生率的降低，使总人口减少，出现全村人口低谷，全村总人口 2360 人，其中：开弦大队 868 人、红卫大队 891

① 1929 年，由费达生与陈杏荪等村民共同创办的合作丝厂出资创办开弦弓小学，陈杏荪任校长，第一年有学生 30 人。

人、庆祝大队601人。1962—1981年，人口逐年增长，1962年2404人，1981年3150人。原因是村民生活由饥饿转向温饱，人口上升；进入“文革”后，过分强调人的作用，生育失控，人口膨胀。1991年，全村人口3209人，出现人口峰值，以后人口逐年回落，主要原因是国家实行计划生育的政策，有效遏止了人口盲目增长的势头。

人口老龄化分析　1935年至1956年间，全村老龄人口的比例稳定在较低的水平上，还不存在老龄化问题，其中：1935年，60岁以上人口97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为6.65%，1956年为6.46%。1981年60岁以上老龄人口占11.3%，超过了10%的警戒线，步入老龄化社会。1990年起，老龄化加速，2000年60岁以上人口575人，占21.5%；2010年，老龄人口700人，占24.25%。主要原因是：改革开放后，农村经济快速发展，村民生活条件、社会保障和医疗条件逐年改善，人口总体体质增强，老年人生活安定，长寿老人逐年增多。二是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婴儿出生率降低，新增人口减少，使老龄人口的相对比重上升，加大了人口老龄化趋势。

第四节　婚俗嫁妆不同秋

从纵向看，开弦弓村的每个家庭，都是三代人实行三种差别悬殊的婚俗，成为一个个真实生动的婚俗变迁的典型。爷爷奶奶结婚时，采用的还是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中描绘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式婚俗，新娘按古装戏中的花旦打扮，坐花轿或接亲船。但家庭用品很简单，新房里仅有床、衣柜等几件必备家具。但兴办婚宴和举行婚礼的场面却很大，常在大门前场上搭棚，从邻居家借来八仙桌，请专业厨师，开上十几桌，吃上两三天，招待新亲老亲和四方宾客。

到了父亲母亲结婚时，新中国成立了，颁布了《婚姻法》，提倡自由恋爱的新式婚姻。结婚男女，双双到政府民政部门依法办理登记手续，领取结婚证书，这是社会的一大进步。婚礼基本沿用传统婚俗。到了“文革”期间，花轿、花衣都作为封建“四旧”受到批判，婚姻的礼仪也简化了，甚至对婚宴都作了限制。新娘和新郎仅穿新一点的衣裳，并无特殊打扮。

到了七十年代，结婚用品比老式婚俗多了，村民爱以“脚”的多少和桶的多少为标准，来描述结婚豪华的程度。塑料用具面世之前，结婚都用木制家具，桌、凳类称方木，桶类称圆木。有的凑满 36 只脚，或 48 只脚（这些脚指：床脚、桌子脚、凳脚等的总和）。桶有：浴桶、脚桶、米桶、饭桶、洗碗桶、水桶、担桶、马桶等。

⊙ 2010 年，开弦弓村道上娶亲的车队。改革开放后，全村农民人均年收入年年提高，已从 1978 年的 114 元，提高到 2013 年 22980 元，年平均增长 17%。

而现在的年轻一代，出生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文化水平普遍提高，家庭经济实力普遍增强，选择对象的标准改变了，选择对象的范围广了，举办婚礼的内容也变了，可称现代婚姻。多数家庭都为子女建了单独的新房，有的是别墅式的小洋房，装修都是豪华式。新娘穿新式婚纱，新郎穿西装打领带，新娘的嫁妆以整套电器为主。被褥都用真丝绸提花面料，举办婚礼坐轿车、常常是六至八辆组成的豪华车队。不但要拍成套的结婚照，而且摄制婚礼录像。办婚宴很少在家里操劳，多数在镇上大饭店包上二三十桌，既省力，又气派。

不管在哪个时期，婚俗中都有不变的地方，可称为万变不离其宗。如三代人都把婚姻称作终身大事，在子女很小的时候，父母已在省吃俭用，开始为子女长大结婚作准备，盼望下一代过上好日子。但是，家庭经济的增长，除了勤俭持家外，还受到社会环境和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制约。所以，婚俗的变化、结婚费用的高低，不仅仅是反映了男女青年双方父母的愿望和努力的程度，而且最直观地综合反映出各个时期的社会生产力水平。

周全奎是开弦弓村小学的老师，他详细记录了 1985 年自己结婚时的彩礼和 2004 年侄子周建红结婚时的彩礼的清单，虽然两代人的嫁妆都在改革开放时期，但前后相隔 20 年，嫁妆的内容（物件）和价值已发生很大的变化，可代表开弦弓村村民的平均水平。

1985 年 2 月，周全奎结婚。男方端到女家去的彩礼总共为 500 元。他

爱人家送过来的嫁妆，总价值为 976 元。物件名称、数量和价格如下表：

物件名称与数量	价格（元）	物件名称与数量	价格（元）
上海牌收录机 1 台	312	痰盂桶 2 只	12
被子 8 条	200	面盆 4 只	15
五斗镜台 1 只	50	暖水瓶 4 只	24
被子柜 1 只	40	保温桶 2 只	10
箱垫 1 只	40	铜脚锣 2 只	30
箱子 4 只	100	藤椅 2 只	24
大小粉桶 2 只	20	木靠椅 2 只	14
大小脚桶 3 只	25	大小钢精锅子 4 只	20
马桶 3 只	30	其他	20
总计金额		976	

2004 年 5 月，周全奎的侄子周建红（开弦弓村 11 组）结婚，男方送到女家的彩礼是 2 万元，女方送来的嫁妆的总价值为 34170 元，物件名称、数量和价格如下表：

物件名称与数量	价格（元）	物件名称与数量	价格（元）
新飞空调 1 台	2050	长凳 4 条	200
康佳彩电（29 寸）1 台	1800	玻璃小圆台 1 只	300
康佳彩电（25 寸）1 台	1600	小圆台休闲椅 2 只	160
功放音响 1 套	800	被子 20 条	3800
DVD1 台	400	皮箱 2 只	300

电脑 1 台	5500	煤气灶煤气瓶	500
太阳能热水器（女方一半）	1000	高压锅 1 只	80
小天鹅冰箱 1 台	1400	铜脚炉 1 只	50
小天鹅洗衣机 1 台	1100	蜡扦 2 只	50
电饭煲 1 只	120	马桶 1 只	50
电暖锅 1 只	100	洋娃娃 1 个	50
摩托车 1 辆	8000	结婚戒指	1000
缝纫机 1 台	200	大米 200 斤	300
皮沙发 1 套	2000	饮水器	100
八仙桌 1 只	680	其他	500
总金额		34170	

对于村里成功创办企业的业主来说，他们为子女操办婚礼的费用则还要高得多。如 2013 年，村里有一业主女儿结婚，作为嫁妆，买一辆车 105 万，礼服 4 套共 6000 元，别墅装修 40 万，给男方两大包钱。男方办酒席 40 万，买别墅加装修 300 万（三代人同住），给女方一块金砖。婚俗费用已超出组建新家庭和生活的基本需要，从中还透露出继承父母财富的数量规模。（人民大学博士生王莎莎调查）

第五章　土地改革惊天地耕者有其田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于1950年6月颁布《土地改革法》，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是年10月，开弦弓村开展土地改革，没收外埠和本村地主的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彻底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民族理想。村民分到了土地，成为土地的主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翻了身，调动了村民的生产积极性。

第一节　封建剥削苦难重

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一书中，对20世纪30年代开弦弓村原有的封建土地制度进行了分析：

土地被划分为“田面”和“田底”两层。不在地主[1]占有田底，持有土地所有权，有政府登记，支付土地税。但他可能不占有田面，无权直接使用土地。完全所有者既占有田底又占有田面，支付土地税，自己耕作土地。佃户仅占有田面，不占有田底，耕作土地，向不在地主交租。

民国年间，开弦弓村常见的几种土地所有者：

1. 自耕户。

同时拥有田底和田面的农户，土地由自己耕种。即《江村经济》中所称的土地“完全所有者”。实际上很难找到纯粹的自耕户，村里常见的情况是，

① “不在地主”：指居住在城镇、村中有土地的地主。

一个家可能拥有家里一部分土地的全部权利，可能承租或出租土地的另一部分，也可能还有一部分土地属于不在地主。

2. 雇工。

自己没有土地，或只有少量土地，主要靠出卖劳动力。1936 年这个村里有 17 名雇工，在这个村子的经济生活中，雇工制度不起重要作用。

3. 佃户。

佃户拥有田面，不占有田底，自己耕种土地，每年交给不在地主地租。

4、不在地主。

居住在附近城镇，拥有田底，自己不耕种土地，以出租田面收取租米为生。该村约有三分之二的田底被不在地主占有，余下三分之一在村民手中。

把土地分成田底与田面，实际上是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置。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耕社会里，对绝大多数农民来说，土地是他们的“命根子”。由于一个劳动力耕种的土地量是有限的，一般在 10 亩左右；不在地主经营土地的出租量，却是无限的，仅受自有资金量和组织资金量的限制。农民（佃户）常因遇到婚、丧、病、灾，及青黄不接急需时的困难，被迫用土地作抵押，向不在地主或银行借高利贷，终因无钱还债，造成土地权

⊙ 1957 年，开弦弓村旁粮桑相间的农地。

的丧失，加速土地向不在地主集中。正如费孝通所说：“饥饿迫使他们出卖唯一赖以生存的土地，完全跌入封建剥削的陷阱。土地权大量集中到地主手里，进一步加剧了农村经济的崩溃。”

在封建土地制度的基础上，产生以下几种主要的剥削形式：

1. 地租。

一类是“大租”田。居住在市镇上的地主，以收“大租”为主，租额每亩三斗到五斗，由账房（聘用的专职人员）收租。“大租”田都是佃户早前借高利贷还不出卖掉的。另一类是“小租”田。农村地主和少量搬到市镇不久的地主，他们与农村仍保持着较密切的联系，对土地情况熟悉，自己下乡收租，称为“小租”。“小租”的租额比“大租”高，每亩一般是一石至一石二斗。

2. 高利贷。

市镇地主发放高利贷剥削农民，十分普遍。多数因灾荒和婚丧疾病等原因，农民被迫向地主借钱，战前（指抗日战争前）通常是年利二分，将田单抵押，等到本利累到和田价相当时（大约三年），就将田地买绝。

3. 放生米，

米行在青黄不接时，贷放生米，借一石还二石。

4. 抵押贷款。

银行从事农村抵押贷款，以土地、米和丝等作为抵押品。

第二节　中农趋向自耕农

在1936年至1950年（土改前）的14年间，开弦弓村的土地所有权大量由市镇地主手中流回农村，买进土地的主要是中农，使中农趋向自耕化。1936年，地主在开弦弓村占有的土地数量，没有文字资料可查，据老年村民回忆，地主在开弦弓村占有的土地数量，约占全村土地的50%左右，实际数在1500多亩，绝大部分是市镇地主占有。

但是，按1950年土改时的统计，在全村耕地3025.36亩中，地主仅占有土地400亩左右，所占比例从50%下降到13.2%，减少数量超过千亩。如

吴江大地主吴耐安，1936年在开弦弓村占有土地400亩，1950年只剩下14亩。而中农土改前占有的耕地从不到30%增加到48%，基本上耕种自有土地，成为自耕农。

⊙ 1936年，村民用水车集体排水。

主要原因不是农村经济本身的发展，而是政治影响的结果。自抗战以来，市镇地主有办法的逃往上海、苏州等地。他们不再买田，而是普遍的卖出土地，甚至大量卖出，使土地持续出现分散趋势。据1950年统计，开弦弓南村主要市镇地主占有田亩数：吴耐安14亩，江丰银行7亩，邱辅卿24亩，徐朴成96亩（荡田），总计仅131亩。说明地主分子了解到共产党领导解放区开展“打土豪、分土地”的情况，预料共产党迟早要解放全中国，为了减少损失，提前将土地低价卖出。

同时在时局影响下，纸币贬值（战前押田是按纸币计算的），田价大幅下降，农民聚集资金买进田地不像以前那样困难了，造成农民买田的有利条件。抗战前一亩田要卖十几石米，抗战时多只要五石米就可以买到了。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田价更进一步的降低，好田顶多只要四石米就可以买到一亩田，坏田只要几斗米，一般的田也只要一二石米一亩。田价既然这样低落，多年种田受剥削之苦的农民，一旦有了买田的机会，千辛万苦也要设法筹出一笔钱来买田。大批抵押的田单被赎回了，例如震泽江丰农工银行，赎出战前抵押的土地七百多亩。

但是，中农对土地的态度是不种租田，把田买到够自己劳动力耕种和维持一家口粮需要就够了，一般自耕十一二亩田最为经济。总体上讲，中农对买田放租或雇工扩大耕种面积的要求不强烈，买田放租的也不多，因为在这期间苛捐杂税是按田亩摊派的，负担很重，经济利益上不合算。

第三节　土改解放生产力

1949年4月30日吴江解放，10月1日新中国成立，1950年10月开弦弓村开始土地改革。按照《土地改革法》第三章第十条规定："所有没收或征收得来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除本法规定收归国家所有者外，均统一地、公平合理地分配给无地少地及缺乏其他生产资料的贫苦农民所有。对地主亦分给同样的一份，使地主也能依靠自己的劳动维持生活并在劳动中改造自己。"从根本上废除流传几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目标，建立集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于一体的农民土地所有制。

时任开弦弓乡乡长、农会主席姚佰生谈及当年土改经历，他说：

土改前，县里先召开乡干部、农会干部会议，逐级贯彻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土地改革法》，宣传开展土地改革运动的精神。那时工作条件艰苦，到县里去开会，都是自带被子、粮食、咸菜，打地铺睡觉。搞土改主要根据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采取先自报，再经农会小组、村农民协会、乡农民协会三级审议，按照自有耕地的多少，逐户划定阶级成分。评定的成分有：雇农、贫农、中农、小土地出租者、富农、地主等。

在阶级成分的实际评定时，地方上有便于执行的通俗规定：有土地自己不劳动，雇工种田的，评为地主；有土地，自己劳动，同时雇工的，评为富农；有少量土地，自己不劳动，雇工的，评为小土地出租；自有土地很少，种一部分租田，向地主交租的，评为贫农或中农；完全没有自有土地，靠租种土地或做长工的，评为雇农。

其中评定地主、富农成份的要逐级上报，由县里统一审定。最后，按政策确定没收、征收和分配土地及其他财产。地主阶级的土地被没收，小土地出租者、富农等阶层多余的土地被征收，广大无地和少地的贫雇农分到了土地。为了便于操作，分土地既有上级精神，还有群众容易接受，贴近实际的分配方法叫"分进一亩七，分出二亩一"。原有土地超过人均2.1亩的家庭，超过部分分出。原有土地低于人均1.7亩的家庭，不足部分分入。而在人均土地1.7亩至2.1亩之间的家庭，基本不动。

⊙ 香港凤凰台著名主持人曾子墨在开弦弓村访谈老乡长姚佰生（姚富坤父亲）

1951年，开弦弓村完成土地改革任务，94%的农户分得土地，平均每人分得土地2亩（也就是当时开弦乡的水平），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在短短数月内，开弦弓村农民彻底摧毁封建剥削制度，建立农民个体土地私有制。

第四节　阶级分析添朦胧

土地改革后，村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激发出巨大的劳动热情，促进了解放初期中国农村经济的快速恢复和发展。同时由于村民家庭人口和劳动力变化，以及少数家庭因天灾人祸造成的生活困难，使土地及生产生活资料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劳动力强、经济比较宽厚的家庭希望买入土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另一方面缺少劳动力和生活困难的家庭，愿意卖出部分土地和生产生活资料，从而出现了村民之间自发的生产、生活资料买卖和劳动力雇佣等情况。

1957年7月，费孝通被划成右派，他的工作单位中央民族学院为了开

⊙ 1957 年，村民徐尔康全家在自家住房前合影。

展对他的批判，组织调查组从是年 9 月 5 日至 28 日对开弦弓村进行 23 天的再调查。关于这次调查的目的，调查报告里有一段自白："为了彻底的揭露和批判右派分子费孝通在农村问题上对党的攻击，反映农村的真面目，我院党委决定派人前往开弦弓村进行一次全面的调查。"

调查组留在吴江一份包含三个独立打印材料的原始调查报告，今存吴江区档案馆。其中《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土改前后的经济情况：土地占有和阶级关系变化的情况》是对开弦弓村第二生产大队土改后的情况的调查。摘要如下：

"开弦弓南村第二大队共有农户 132 户，其中贫农 83 户、中农 46 户，富农 3 户。土地改革后，村民间出现了土地买卖、土地租佃、房屋和农具的买卖、雇用劳动力和高利贷等方面的情况，反映出土地改革后农村出现的新的阶级分化迹象。

"土地买卖情况。开弦弓南村第二大队，土改以来共发生卖地 10 次，出卖土地的 10 家有 6 家是由于生活困难。买地行为共发生 5 次，买地的 5 家有 4 家是经济条件好，土地不够种而买的。

"土地租赁情况。全大队租出土地 6 户，5 户是缺少劳动力，其中有 3 户经济困难，另有 1 户是田不好怕负担公粮。全队租进土地共 5 户，都是经济条件较好，劳动力较强的户。因此当时也被认为这种土地租佃关系，是促使农民阶级分化的因素之一。

"房屋和农具买卖情况。该大队自土改以来出卖房屋 11 户，其中除 1 户中农外，其余都是贫农。出卖原因都是由于家底薄，生活困难。贫农生活下降比中农大。购买房屋 11 户，其中 8 户贫农、3 户中农。这些户大多是经济条件较好，有些户买房屋是为了扩大养蚕生产之用。

“土改以来全队出卖农具13户，其中1户中农，其他为贫农。出卖的农具船5只，水车1部，乔千17把，菱桶1只。出卖原因大都是贫穷，其中有2户是为了修房子卖船，有1户是与别人共有1只船，别人要卖，他只好卖。土改以来全队购买农具的有3户。都是中农，共购入农船2只，这3户的经济条件都较好。

“劳动力雇用情况。土改以后，开弦弓村还继续存在过雇佣劳动力的情况。雇工来源有二，一是苏北人，二是本村和邻村人。苏北人帮助罱河泥和砻谷，每工工资6升米，全村有一半以上人家雇佣苏北人，不仅中农雇，贫农也雇。这在解放前就这样，解放和土改后，农村经济力量增长了，雇人罱河泥的也就更多了。雇本村人和邻村人的主要是上中农和一些经营手工业的农民，出雇人是原来的贫雇农。”[①]

这些情况本应属于村民之间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自我调节，也不是拉开贫富差距的根本原因。但在这份调查资料中，把这些情况都归结于阶级分化的表现，看做是新的剥削，是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甚至认为，土改后一部分富裕起来的贫雇农，也已成为带有剥削行为的新的富裕中农和富农阶级。这些观点客观上限制和打击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助长了当时社会上“以贫为荣”的风气。充分说明，在农业合作化的初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已开始形成，中国农村的发展方向问题及农民问题，仍然严峻地摆在人们的面前。

① 1958年1月，中央民族学院政治理论教研室印：《江苏吴江开弦弓村调查报告（初稿）》第2页。

第六章　合作化吃大锅饭同耕一块田

1951 年 12 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提出了农业生产开展互助合作的问题。1953 年 2 月，正式通过并公布《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在全国农村全面展开。毛泽东主席在 1953 年 10 月 15 日谈话中，进一步提出："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作。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使农业合作化运动一开始就含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很快成为一场全国性的自上而下的势不可当的政治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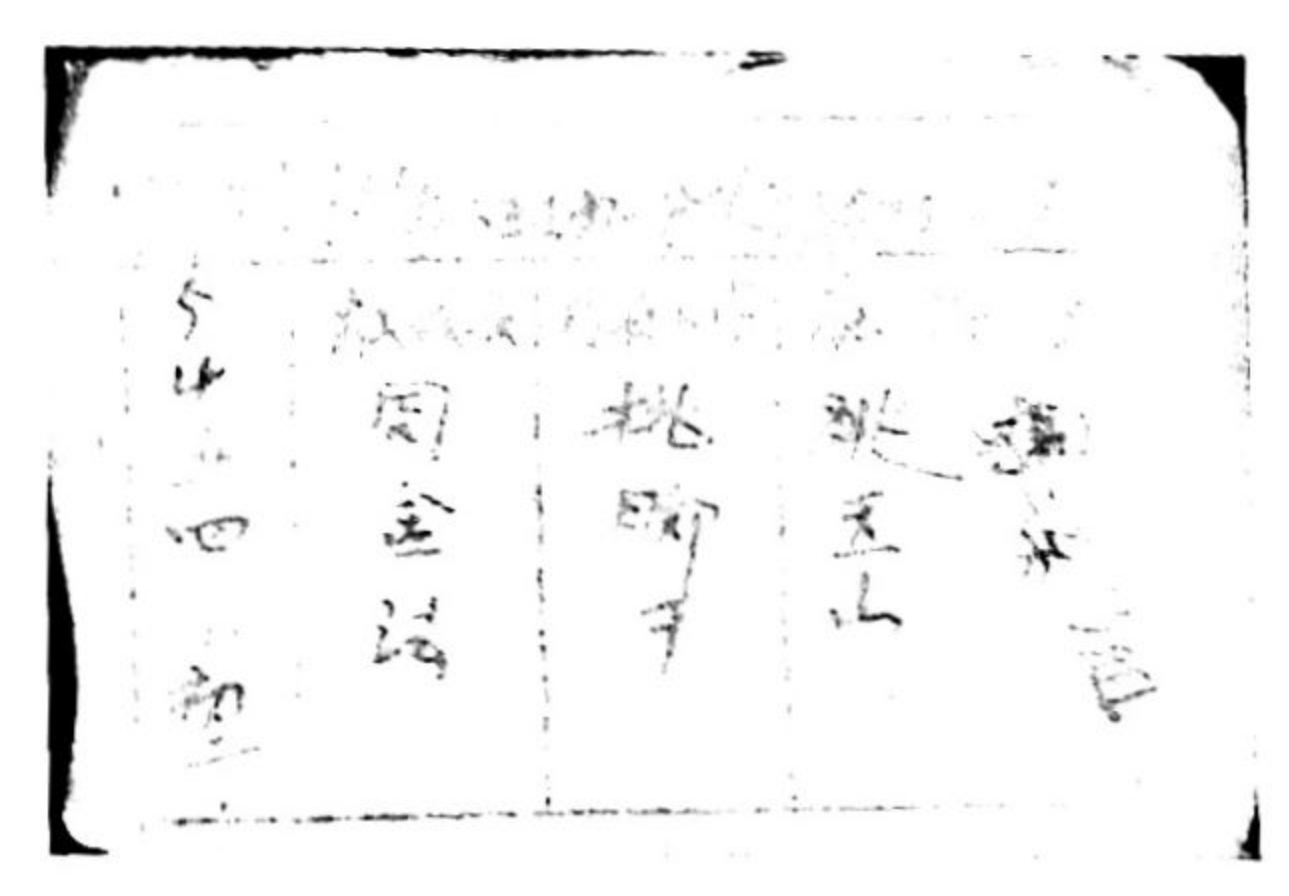
第一节　互助组相互扯皮

1957 年 9 月，中央民族学院调查资料《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情况》[①]，记录了当年开弦弓村第二大队开展互助合作的情况：

"1952 年春季，开弦弓村第二生产大队组织 5 个互助组，47 户。1953 年发展为 8 个互助组，入组农户约占总农户的 80% 左右。这个村的其他各队当时互助组较少，估计 1953 年开弦弓南北两村参加互助组的农户约占 40%。主要特点：户数多，过去一般 2 至 3 户，现在一个互助组大都在 7 至 8 户以上，南村蒋绍南互助组已超过 10 户。组织互助组的方法有了改进。过去互助是以工换工，现在实行了评工记分。有的建立工票制度，做活人

① 吴江市档案馆资料，全宗号 2001，目录号 14，案卷号 71。

先领工票，在互助活动中，谁给自己做工，就付给谁工票。”



⊙ 1954 年，开弦弓南村互助组工票

调查认为：土地改革后，尚有部分农民特别是贫农缺乏农船、水车等生产工具。互助合作后，统一使用农具，使问题得到解决。开展互助合作，解决了部分中农劳动力不足的困难和某些农户肥料不足的困难。调查还认为：互助组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在开弦弓村农民中流行着“春组织、夏垮台、要组织明年重来”的说法。主要是集体劳动和分散经营的矛盾，造成许多农户闹退组。互助组里的问题主要有：

农忙季节时间性很要紧，大家都想先耕先种，难以满足大家的要求，只能原则上规定，大水先种低田，天旱先种高田。这样有些迟种户对互助组有意见。1954 年大水，很多组员只顾自己抢收小麦和插秧，结果使互助组垮了台。在农活的安排上，互助组里忙季争别人给自己做工，闲季抢别人活干。闲季农活较少，各户一般都能自给，互助多了就会影响自己的收入，而不互助又不像互助组了，有多余和勉强之感。在收入和支出上，由于忙季和闲季都要互助，使得原来不雇工的农户，也要额外支付工资，因此很有意见。农副业生产上，互助组内虽然也有人搞农业和副业，但由于经营的收入不一样，在分配上发生矛盾，统一分配不利于收入多的，不统一分配不利于收入少的。

建立互助组后，农户的土地是私有的，田块上的产出归各户所有，各户有各户的私利和打算。由于农户拥有的生产要素，不是一成不变的，每年农户之间，在自愿的基础上，必然会产生新的组合，客观上造成互助组的不稳定性。因此，经政府各级层层宣传发动，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组织起来的互助组，既有村民自愿的一面，又有迫于社会舆论压力的一面，实际成效是利小弊大，用得着村里的一句俗语，叫做“按着牛头吃草”，半推半就矛盾多。

第二节　初级社入股土地

对于互助组出现的种种矛盾，经过逐级宣传教育，已形成这样的主流思想：互助组不稳定，是因为不能战胜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什么是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呢？中央民族学院的调查[①]认为：

“互助组内工资支出部分，在某种程度上还带有剥削性质。有些人少地多的上中农，原来是雇工，现在名义上不雇工了，但支付的工资反映剥削关系，是原有剥削关系的继续。特别是加入互助组以后，田交给别人做，自己去搞贩运，更体现了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因组织互助组，资本主义的贩运曾一度受到限制，而在农闲季节又泛滥起来了，某些组因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占优势，使互助组涣散，趋向垮台。”

面对“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泛滥”，怎么办呢？当时的结论是唯一的，或者说其他意见已无法抬头，那就是：为彻底战胜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解决集体劳动与个体经营的矛盾，必须进一步实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由互助组过渡到农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农业合作社，社员土地入股，不分你我，共同耕作，出工记工分，年终统一分红。

1953 年秋天，开弦弓村成立首家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南村永新社。入社农户 22 户（原报名 24 户，有 2 户成分不好没有批准）。其次是幸星社，入社农户 24 户。这两个社都于 1954 年 1 月被上级政府正式批准。此后该村连续出现了不少自发社：北村有北星社（23 户），南村有新登社（14 户），斗星社（15 户），长兴社（17 户），乐荣社（21 户）。这 5 个合作社至 1955 年 7 至 9 月才被批准。另外南村有 4 个自发社（56 户）直到 1955 年冬季才被批准。如果算入这些自发社，1955 年开弦弓村共有农业社 11 个，入社农户约占总农户的 70%。

毛泽东主席在发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决心要消灭资本主义和小生产，

① 吴江市档案馆，全宗号 2001，目录号 14，案卷号 71。

⊙ 1957年5月，开弦弓村（联三社）第二大队全体村民合影。

"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1]土改后农民分到了土地，在和平的环境里，没有在理论上和政策上，加强人民群众的团结，将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而是用阶级斗争的理论人为树敌，用政治手段代替经济手段，用行政命令的方式管理经济，农村经济长期停滞不前，使国家失去一次来之不易的发展机遇。

农业合作化运动迅速发展为"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时代洪流，谁提不同意见，谁倒霉。1957年，费孝通写《重访江村》，尽管已避开对农业合作化本身的评论，诚恳地要求领导上能注意合作化中存在的问题，苦口婆心地提出发展副业和农村工业的建议。他的建议不但没有被接受，反而遭到被批判的厄运，费孝通重访江村回到北京后，是年七月被划成右派，中断学术研究23年。

第三节　总路线指引方向

从1954年春季开始，在全国农村开展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教育活动，统一广大干群，特别是贫下中农的思想认识。什么是过渡时期？什么是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呢？毛泽东主席在1953年12月撰写的《革命的转变和党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98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

⊙ 1957年5月，开弦弓村女社员拔秧的集体劳动场景，前立者为村民金丫头（小名）。

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一文中，作了最完整、最权威的表述：[①]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了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1954年4月，吴江县委、县政府召开的农村工作会议贯彻中央精神，报告[②]提出农村贯彻总路线的基本任务：一是努力发展农业生产，实行粮食和其他重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以适应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的需要。二是积极发展互助合作运动，克服农民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逐步实现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三是搞好三种合作：发展互助合作运动，把个体经济变成合作经济，避免农村中的阶级分化。发展供销社，使农民不受私商剥削，也不使自己变成剥削别人的私商。发展信用合作社，消灭高利贷。这些都是限制富农发展的有效办法。

无法否定的事实是，从宣传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开始，中国农村进入了长达30年的合作化时期，农民失去了生产劳动自主权，每天听生产队长吹哨子上工。国家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农村的商业活动都由政府直接掌控的供销社包办，把村民自发的传统贩运等商业活动，以及其他传统的副业和手工业，都作为资本主义被限制或取消，农民失去了农副产品生产和

①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316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
② 吴江市档案馆案卷，全宗号1001，目录号4，案卷号50。

经营的自主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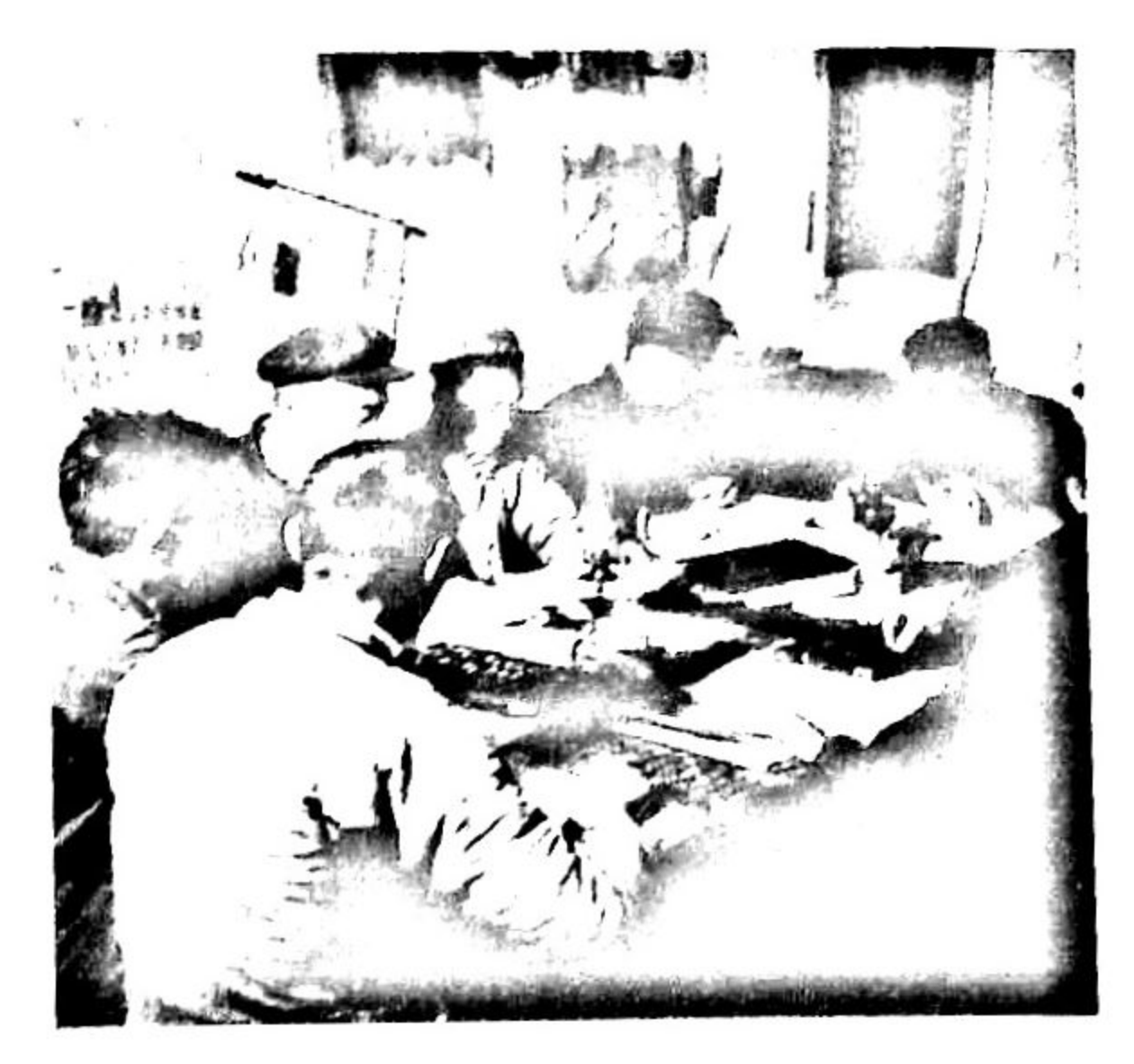
加强户籍管理，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和市镇流动，限制了农民除农业生产以外的其他就业门路。村民人均年收入长期停留在几十元至100元上下，每个人工（全劳力每天记10分工）到年底分红，只有四角、五角。一个农户能分到上百元，已是不错了，生产队里还有很多农户是超支户。

从整个国家来看，完成了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全面进入计划经济时期。国家以行政手段取代市场功能，国民经济出现了长期缓慢发展，甚至停滞和倒退的状态。市场上物资奇缺，基本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供不应求，而且都要凭票供应。农村里看不到新房子，不仅仅是因为缺钱，造不起房子，而且即使积了一点钱，也很难买到木材、石灰、砖等建筑材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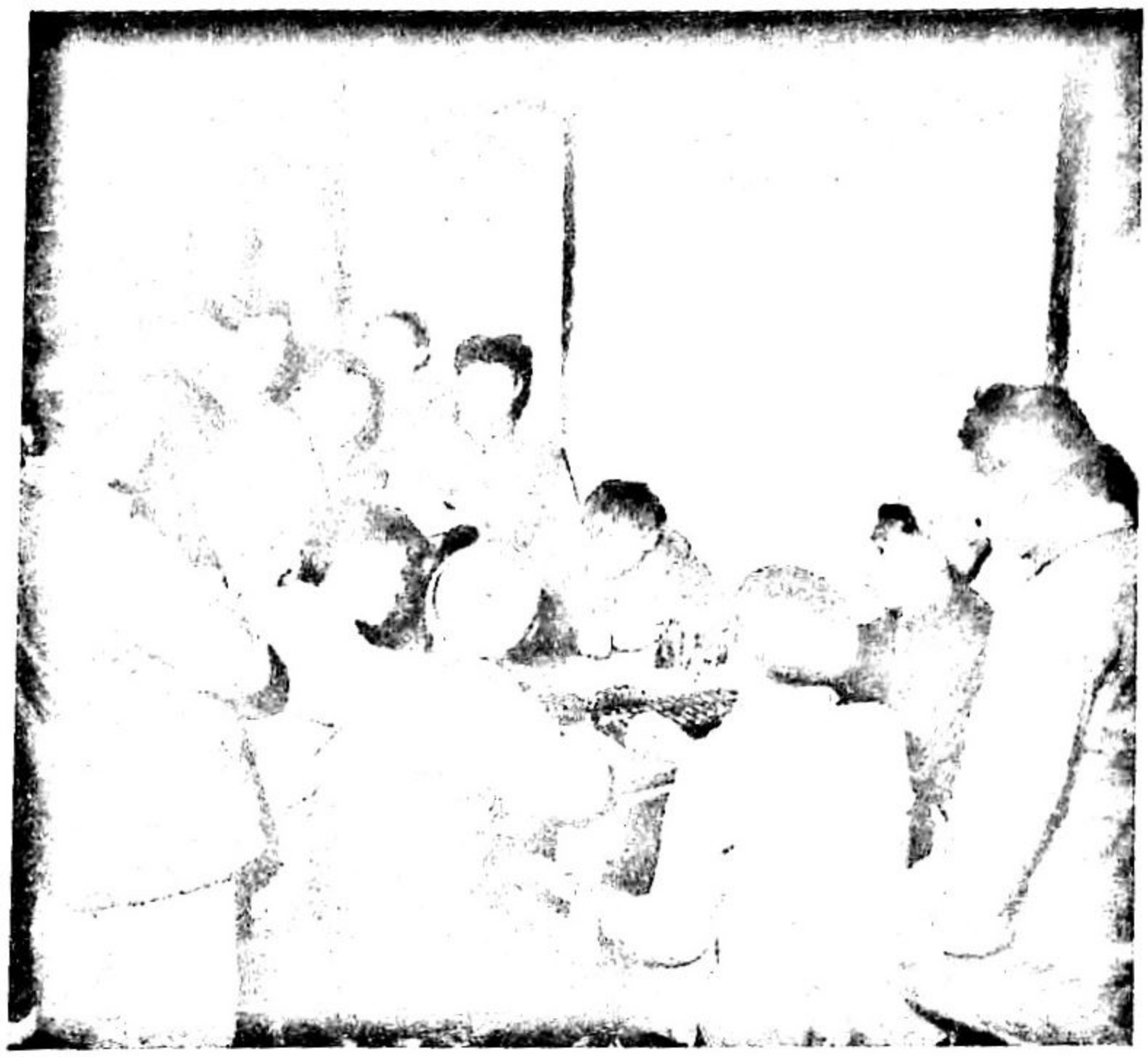
第四节　高级社积肥献礼

1956年，吴江县按照中央《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的精神，试办了3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作为全县的样板社。开弦弓村是其中之一，它的全称是："吴江县第三高级联合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联合三社"）。在中央民族学院的调查资料中，记录了"联合三社"组成的详细情况：

"联合三社是由原来开弦弓村八个初级社，一个互助组和邻村荷花湾村、埋石湾村的荷花、荷荣、欢勇、建荣四个初级社联合组成的。开始只有554户，后发展到605户。其中贫农332户，中农235户，地主9户，富农18户，外地迁来渔民11户。所有地主富农都参加了合作



⊙ 1957年5月，联三社各大队会计在夜间整理账务。



⊙ 联三社第二大队第七生产队社员在夜间评工分

社，分别作为社员、候补社员或管制生产。”

“据统计，新成立的联合三社，人口2332人，其中男1268人，女1064人。共有劳动力1230个，其中男劳动力766个，女劳动力464个。耕地面积稻田4339亩，旱地62亩，桑地479亩，鱼池12亩，平均每个劳动力负担5.1亩。耕地分布在22只圩内。农具设备：农船220只，水车240部，戽水车4架（其中租赁一架）。新式农具：双轮双铧犁2部，压缩喷雾器6架，手持喷雾器1架，轧稻机24部，其中弹子轧稻机16部。”

曾任联合三社副主任的周明芝回忆了成立时的情景，他说：“1956年秋收秋种后，把全开弦弓村的初级社联合起来，统一成立联三高级合作社。召开成立大会时，在江村桥南搭了台，周围插满了红旗，县里、乡里都有领导来讲话表示祝贺。县京剧团专门来村做了三天戏，全村里男女老少、附近农村的人都涌来看戏、看热闹。整天敲锣打鼓放鞭炮，跳秧鼓舞，唱革命歌曲，开弦弓村从来没有这样热闹过。”

村民们出于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信任，在合作化运动中，只要是毛主席讲的话，他们都听。从组织互助组开始，到建立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的过程中，他们总是敲锣打鼓地欢呼更高层次的范围更大的合作社的成立，他们企盼着彻底改变贫穷落后的旧生活，相互传颂着“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耕地用铁牛（拖拉机）”等希望话语，对未来的新生活充满着美好的向往。

费孝通在《重访江村》一文中，对合作化轰轰烈烈的场面作过生动的描述："当合作化高潮卷到这个村子里的时候，热烈的场面真是动人。高级社成立前几天，号召大家积肥献礼，每只船都出动了。罱得满船的河泥，把几条河都挤住了。几村的人都穿上节日的衣服，一队队向会场里集中，一路上放爆竹，生产积极性的奔放，使每个人都感受到万象更新。"[①]

在从上到下对合作化一片赞扬声中，费孝通敏感地发现，合作化虽然粮食增产了，但农民的收入却减少了，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出在副业上"。[②]如农业社建立之后，贩运活动全部停止了，村民又少了一笔收入。禁止农民贩运，不但断了农民的一大生财之路，而且制约了整个城乡经济的发展。从农民收入这个角度看去，这些可以利用的船只闲空下来，并不很妙。搞社会主义应当把这些生产资料利用得更好，但是事实却不是这样。费孝通提出的问题切中了时弊，并为后来农村发生的一系列事实所证明这是一言千金的诤言。

---

① 费孝通《重访江村》，见《爱我家乡》第23页，群言出版社，1996年。
② 费孝通《重访江村》，见《爱我家乡》第6页，群言出版社，1996年。

第七章　国外学者葛迪斯教授访江村

1956年春，开弦弓村迎来了第一位国外学者——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人类学系威廉·葛迪斯（W•R•Geddes）教授[①]。这次访问对于江村社会学调研基地的建立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威廉·葛迪斯是费孝通就读的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的校友，毕业后在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教人类学，教学中一直使用费孝通的《江村经济》这本书。葛迪斯向往书中描述的开弦弓村，期望有机会站在开弦弓村的土地上，进行实地调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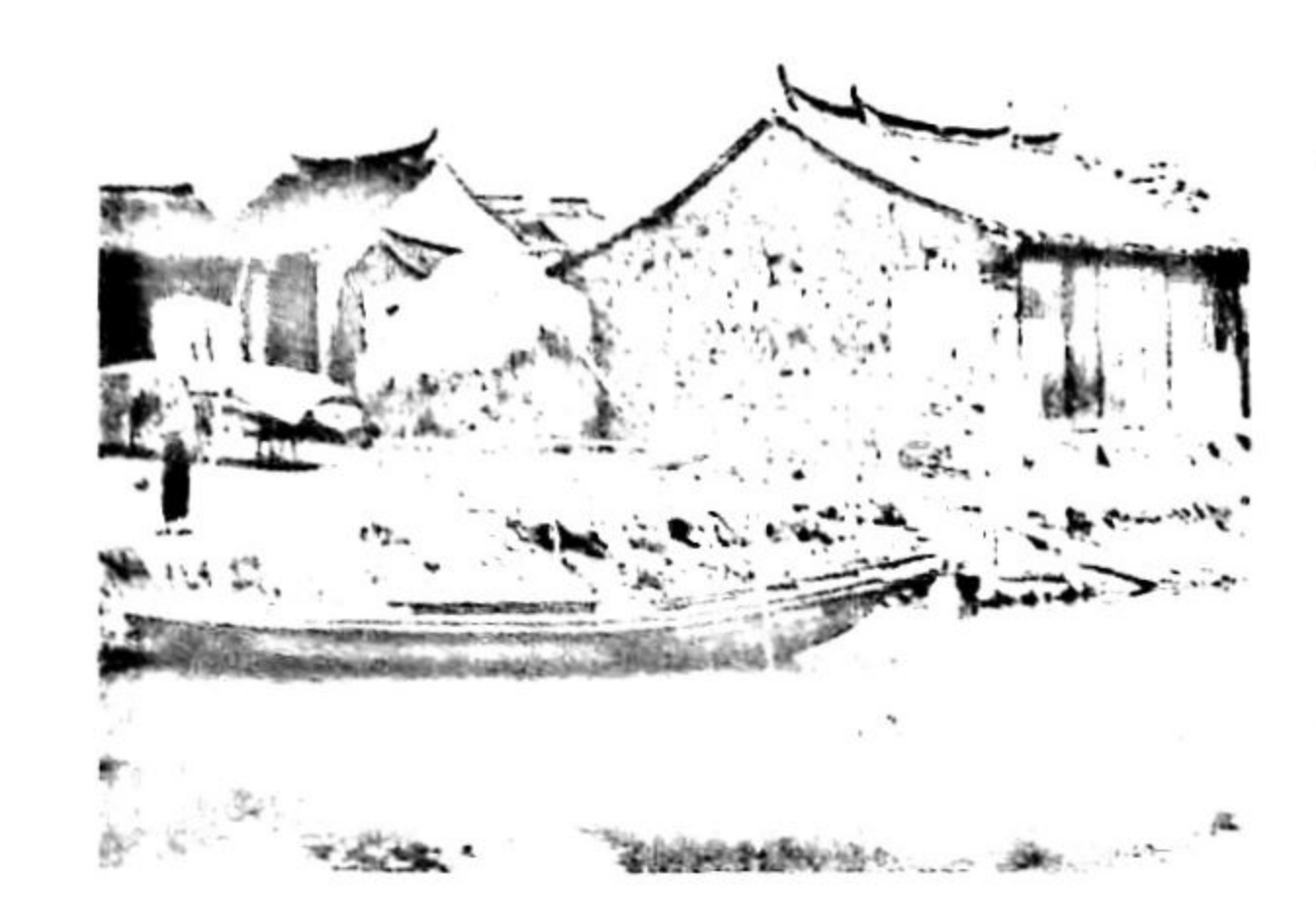
第一节　总理亲批访江村

1956年，应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的邀请，威廉·葛迪斯得到了求之不得的机会，随新西兰文化代表团访问中国。4月28日，代表团到达北京后，周恩来总理接见了代表团成员，葛迪斯抓住这一对他来说是历史性的珍贵机遇，向周总理说明自己是费孝通的老朋友，提出访问开弦弓村的希望。周恩来当即表示赞同。

在今天看来，访问开弦弓村只是一件十分平常的事，但在当年中国国内政治空气沉闷、对外学术交流几乎完全中断的年代里，一位西方学者想要深入中国农村做社会调查几乎是不可能的。威廉·葛迪斯的访问经过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批准和安排后才实现。

---

① 威廉·葛迪斯（W•R•Geddes），1916年生于新西兰，1946年至1948年在伦敦大学读博、任教，参与了马来西亚沙捞越殖民社会研究等，1957年任奥克兰大学副教授，1959年任悉尼大学社会人类系主任，1981年退休，1989年在澳大利亚去世。（据墨尔本大学出版社《澳大利亚传记辞典》）



⊙ 1956年5月，葛迪斯教授拍摄的“沿河的民居”，墙上用石灰水刷的标语：“学习文化，建设社会主义”。

威廉·葛迪斯在闵拓云（音译）翻译的陪同下，开始对开弦弓村访问的行程。一路上充满新奇和误会，当威廉·葛迪斯到南京时，他说要到苏州，到苏州后，再提出要到开弦弓村。由于他没有具体说明访问的目的，所以一开始就引起江苏省委和苏州地委接待人员的高度警惕。

在苏州，由时任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尹楚升，以苏州文联主席的名义出面接待，地区公安处处长浦太福负责葛迪斯此行的全部事项，并安排张彬（地委农村工作部秘书）、王韵苏（地区妇联干部）“打前站”，先到开弦弓村察看情况，以防有“落后的阴暗面”出现在来访者的视线中。[①]

确实，张彬和王韵苏坐船数小时，一路往开弦弓村驶去的时候，途中河道不时有被弃的死婴漂浮着，他们要求当地派人清理。来到开弦弓村后，张彬和王韵苏装扮成村里人的模样。他们在正值放假的小学堂里，为葛迪斯安排住处。也就是在一间教室内撤去课桌，搭起床铺。还从地委交际处找了一名做西餐的厨师，为葛迪斯做饭。

5月12日下午，威廉·葛迪斯和国内陪同人员一行4人，从苏州坐汽车到吴江县震泽镇，然后乘坐早在那里等候他们的小汽艇，走水路前往开弦弓村。葛迪斯在船上注视着两岸陌生而新奇的环境：船后掀起两道人字形的浪花，拍打着两侧的堤岸，船桅刚刚能通过驼峰般的桥洞，船底又时常碰到河里的泥沙。

人们聚集在岸上观看，孩子们更沿岸随船奔跑，直至船转入岔道行驶，才被迫停步。因为五十年代，很少能见到汽艇，外国人则更少见到了。大

① 口述资料：《葛迪斯访问江村的前后》载《苏州史志资料选辑》总第三十六辑，第345页。

约一小时以后，于下午五时二十分，小汽艇到达开弦弓村，轰动了村里男女老少百余人，站立在两岸和桥上观看。葛迪斯在船上惊喜地向群众招手示意，并摄影。

第二节　充满新奇溜后门

这次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的访问，始终充满神秘色彩，可用8个字来概括："内紧外松、兴师动众。"张彬和王韵苏主要在幕后工作，负责后勤和保卫，在葛迪斯吃饭的时候尹楚升召集他们开会，随时商量"布控"办法。一次尹楚升说："葛迪斯对开弦弓村的情况熟悉得令人惊讶，包括哪里有座桥，哪里有教堂，哪里有……都知道。"他们想弄清缘由，于是就在葛迪斯外出参观的时候，检查了他的行李和随身物品，查到了英文版的《中国农民的生活》（即《江村经济》）。

⊙ 1956年，葛迪斯拍摄的"踩水车的农民"，照片上英文的意思是"房子上写着标语，学习文化，建设社会主义"，应是上一张照片的注释。

当时张彬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本书，他懂些英文，于是将目录抄了下来，还抄下部分章节，在晚间与翻译一起详细讨论。他说在书中看到村庄的附图，大家才明白葛迪斯熟知开弦弓村的由来，也推想出此行的意图和目的。原来葛迪斯是为了了解费孝通这本书中所述与现状的变化。最后尹楚升作结论，认为葛迪斯属于"态度基本友好"，所以在后来的接待中，对他的要求尽量配合。[①]

① 口述资料：《葛迪斯访问江村的前后》载《苏州史志资料选辑》总第三十六辑，第345—346页。

在村里的这段时期，葛迪斯成了村民关注的中心。因为全村人都是第一次看到从西方来的外国人，在学校上课前后以及傍晚院子里总是挤满了人，都在好奇地观察这位外国教授的一举一动。一天晚上，葛迪斯在村民家中访问。临走时，这家男主人担心他的房子被跟来的大批人群挤坏，要求他从后门悄悄地溜走。

令葛迪斯感到高兴的是，他发现开弦弓村没有遭到战争的破坏。新中国成立后，丝厂经过重新修建已用作茧站，学校也办得很兴旺，还有一个小型图书馆。傍晚，村乐队开始奏乐，青年男女不论是未婚和已婚的，都系着鲜红色的腰带，兴致勃勃、熟练地打起了腰鼓。年轻的母亲们抱着婴儿，站在门廊下，交头接耳，孩子们一个个都穿着鲜艳夺目的毛线衣，母亲们一边抚摸着孩子、一边炫耀着。在一排排房屋的灰砖墙上，用石灰水刷着醒目的标语："努力学习，尽快扫除文盲"；"努力学习，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努力学习，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

第三节　走家访户争分秒

威廉·葛迪斯在村子里调查，虽然只有4天，但他全部白天和晚间，一刻不停地做调查，并对该村的户口进行了一次普查，工作效率十分惊人。

12日晚饭后，葛迪斯听取乡长王大宝介绍全村情况后，重点询问了民主选举的情况。如选举委员会怎样产生，哪些人组成，选民资格如何规定，有多少选民，人民代表怎样选举等。

13日上午，葛迪斯参观了养蚕共育室，访问了沈子兴家。了解家庭人口、家庭成员、称谓、经济状况和风俗习惯。下午两点，开始对村干部的访谈，了解全村土改前后的生产关系和

⊙ 1956年，葛迪斯在开弦弓村拍摄用耕牛耙田的情景。开弦弓村人多地少，历来用铁鎝翻土，耕牛用得很少，使这张照片显得更加珍贵。

合作化的过程，历年粮食和蚕丝的产量，以及农业社经营管理的方法。

傍晚去港北（北村）访问村民姚阿福。葛迪斯一进门看到灶头上没有灶君老爷，就奇怪地问："为什么没有灶君老爷？"当他知道该户是基督教徒时，他认真了解了村民信教的情况。晚上9时20分，葛迪斯走访了村中心小学，对学校的教师人数、教员的籍贯与待遇、教育规划等情况提出了很多问题，教员一一作答。

14日上午，葛迪斯由乡干部陪同参观了北庙，庙内的房子和菩萨都没有被破坏。下午参观中心小学少年先锋队的活动。晚上访问新婚农民周伯顺的家，重点了解婚姻问题，即婚姻是否自由、结婚仪式、吃喜酒的亲戚关系等等。还询问了村民平时的生活、劳动和经济收入情况。

15日，葛迪斯重点调查开弦弓村的蚕桑业和丝织业情况。上午，他邀请蚕桑指导所干部陶琳仙座谈，着重了解养蚕的全过程、蚕丝生产成本、蚕农与国家的关系等等。晚上，访问了农业合作社副主任姚云才家，对乡村干部和村民在他调查期间给予的热情款待和帮助表示感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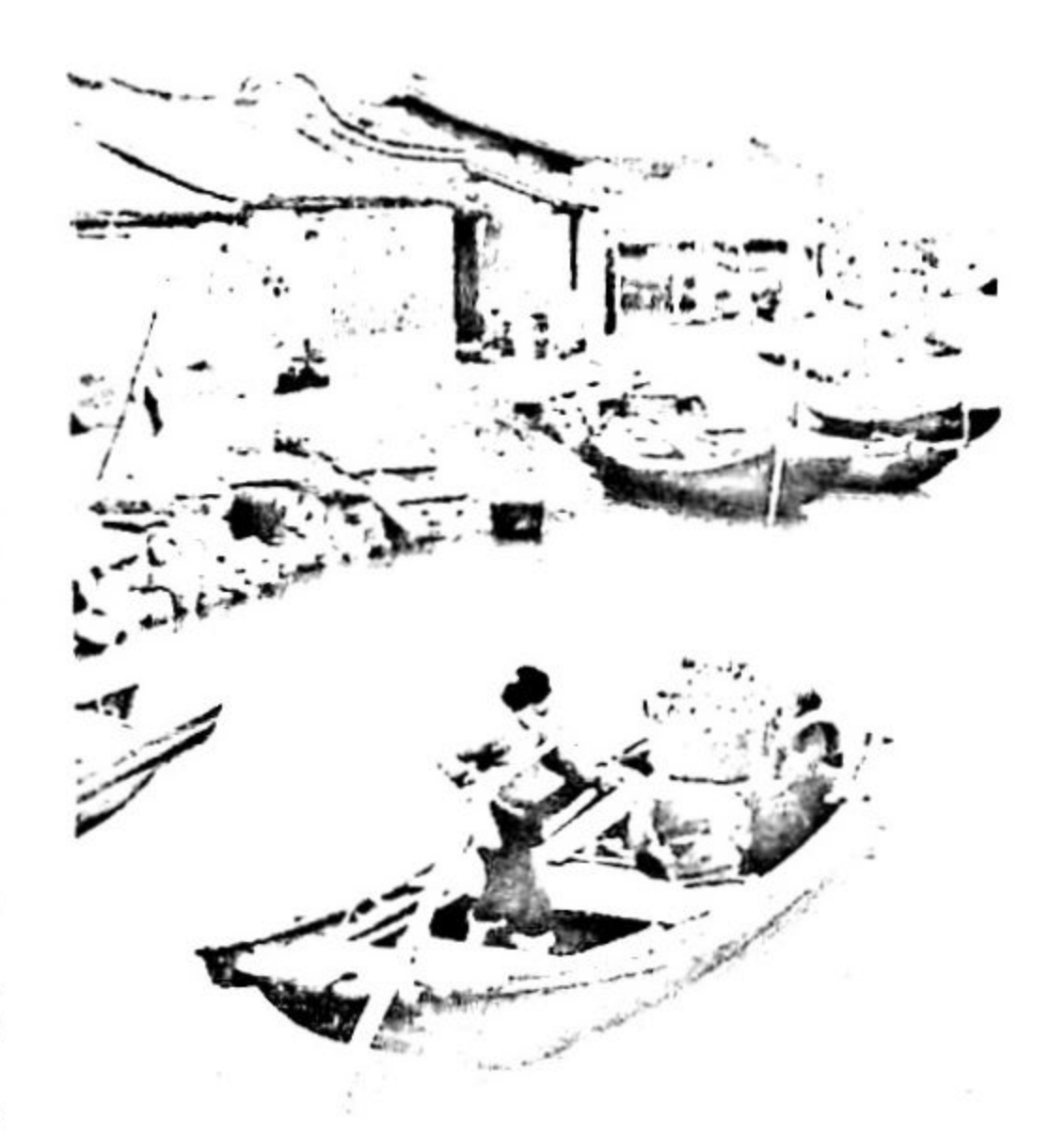
16日，早晨7时30分，葛迪斯乘船离开开弦弓村，村里干部群众自发来到河边，鼓掌欢送。

第四节　照片张张传与今

葛迪斯在开弦弓村利用中午和傍晚休息时间，单独绕村步行，并走进村子周围的田野。那时正值春天，地里种着麦子、蚕豆，还有桑树。他情不自禁地举起相机，对准明媚春光、郁郁葱葱的绿色田野和美丽的村庄拍摄照片。其中有：在地里采蚕豆的老大娘（沈琴法的母亲），在麦田里割草的五位姑娘，摇船回家的妇女，踩水车的农民，歇工回家的男子，架在小清河上的木桥，供销合作社全景，沿河的民居等。

他对村干部说："我这次来开弦弓村访问，得到的帮助很大，充实了我们的教育内容。回去后一定以我个人的职位、身份，大力向新西兰人民宣传，宣传的形式有两种，一是写文章，一是广播。"并说："我在此地拍的全部照片，保证回去后在一个月内，将整套寄给你们。"

原以为这些照片都已遗失，或者没有寄到，然而时隔半个世纪后的一天，朱云云在吴江市档案馆的案卷里，竟然找到了当年葛迪斯拍摄的照片。这一组照片共6张，其中有：开弦弓村村民打腰鼓、沿河的民居、踩水车的农民、在施肥的合作社社员、耕牛耙田、摇船回家的妇女。



⊙ 1956年，葛迪斯拍摄采了桑叶摇船回来的开弦弓村妇女。

威廉·葛迪斯访问开弦弓村的成果，主要反映在他回国6年后出版的《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农民生活》一书中。这本书以一位西方学者的特殊身份和视角，系统和简明地描述了开弦弓村的人口家庭、传统经济、土地制度、行政体制等情况，向西方各界客观和理性地介绍了开弦弓村在合作化时期的农民生活。

葛迪斯欣喜地看到费孝通书中所描述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形式正在向自由恋爱的方式转变，男女结婚年龄在提高，夫妻之间年龄差别在缩小，新婚夫妻关系比较平等、友善，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在提高。同时，葛迪斯还看到通过土改和合作社运动，农村经济体制发生的变化，农村经济得到了恢复。

但是，他认为，合作化对劳动的直接个人收益缺乏鼓励，蚕丝业的产量反而降低了。共产党人应该担忧的是单调、呆板和千篇一律的问题。农民的生活没有什么色彩，村干部都穿着深蓝色的制服，就是在新政权下千篇一律的象征。

书中很多富有哲理和洞察力的话，被以后发生的史实所证实。该书的出版，在当时中国十分封闭的政治环境中，继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后，再次成功地打开了开弦弓村——这一扇世界了解中国农村的窗口，在西方社会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和震动。

第八章　重访江村费孝通直言合作化

开弦弓村在农业合作化初期，先后迎来了三批有身份的客人。按时间顺序排列，他们是：1956 年 5 月 12 日至 16 日，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威廉·葛迪斯对开弦弓村的访问（见本书第七章）。1957 年 4 月 26 日至 5 月 16 日，全国人大代表、时任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费孝通重访开弦弓村。1957 年 9 月 5 日至 28 日，中央民族学院、中国科学院、江苏省委、吴江县委组成调查组，对开弦弓村进行再调查。

这三次调查虽然目的各不相同，但是调查工作都做得十分认真，都为后人留下了翔实的调查资料，具体反映了农业合作化时期，开弦弓村的经济社会情况，并从中折射出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特殊的政治、社会关系。这在全国取消社会学、停止学术活动的 1950 年代里，是绝无仅有的农村社会调查，对后人研究农业合作化这段历史，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和地位。

第一节　社会调查贵在真

费孝通重访江村的时间，正处在反右运动的前夕，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一个十分敏感的时期。我们在吴江区档案馆，查寻到 1957 年 5 月 21 日，吴江县人民委员会呈送江苏省人民委员会和苏州专员公署《关于全国人大费孝通先生代表来我县开弦乡进行农村经济调查工作情况的报告》[1]。这份长达 7 页的打印材料，详细记录了费孝通重访江村的情况。虽然我们已很

① 吴江市档案馆案卷，全宗号 2001，目录号 14，案卷号 71。

难推断撰写这份报告的原因和动机，但在客观上，为后人了解费孝通重访江村的实情，提供了最详细、最正确的记录。摘录如下：

⊙ 1957 年 5 月，费孝通（前排中）与社会调查组成员在开弦弓村合影。

报告开头概要介绍了这次调查的全过程：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费孝通代表及其带领的科学研究所农村经济调查组李孚同、周淑莲、张福乾三同志，新观察杂志记者一人（先是女的，后换男的张祖道同志），于 4 月 24 日到我县震泽区开弦乡开弦弓村联合三社进行农村经济调查工作。我们派有熟悉该村情况的李海江同志和搞保卫工作的毕玉明同志参加一起工作。至 5 月上旬已摸出大体轮廓，费代表即于 15 日由乡至县转返苏州，同返者有新观察杂志张同志。”

“在县约停留 4 小时，除谈了些调查工作大体情况、提出一些问题和改进工作的意见外，并访问了他的故居和小学读书时的学校教室等。这次费代表在我县共住 21 天。在县告别时说，准备在今年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再来我县进行一次复查工作。尚有研究所的同志还在该村进一步调查，整理资料，约在 6 月 20 日左右可全部结束。”

接着，报告中汇报了这次调查的有关事项：

调查目的：费代表这次来调查的目的，据他自己说，主要是为了给科学经济所写一些关系南方农村经济变化的书籍，因他在 1936 年曾在开弦弓村作过一次调查，写过一本英文版书籍，在欧洲的朋友颇感兴趣，故这次仍到那里进行调查，看一下 20 多年来的农村经济变化情况，准备向国际上出版书籍。他曾不止一次地对王副县长 说：“你们对开弦弓乡工作要很好注意，将来书出版后，国际友人来访问是不会少的。”

调查内容：费代表调查内容大体可分三方面，一、20 多年来农村历史变化情况，重点在土地的占有关系变化，对人口变化亦作了仔细调查。二、农业生产发展情况及农民收入的变化。三、副业生产发展情况及对增加农

民收入的影响，着重在养蚕、饲养、水产、运输等方面。调查力量的组织，由费代表领导，组织三个研究所同志，吸收我县李海江、毕玉明和联合三社副主任周富林等参加，共6人，分三组进行工作。

调查方法：费代表在调查方法上，主要采取：一、自上而下层层听取干部汇报，了解情况。费代表来的那天，我县杨振东副县长曾汇报了约两个小时的工作情况，震泽区孙定安区长和联合三社主任亦汇报了开弦乡和社的情况。二、召开干群小型座谈会（社干部较多），具体了解情况。三、与社干（小队长等）专题研究。四、个别访问。五、实地观察，拍摄照片，共拍有80多张。六、向有关部门索取材料，如解放前地主用怎样的手段压迫和剥削农民，土改前后土地占有和使用变迁情况，互助合作发展情况，政府怎样领导农业生产和副业生产等。

工作强度：费代表调查非常细致，有的都是他亲自进行，如调查20年来人口变化情况，是逐户逐年摸底排队：有多少母亲，生了多少小孩，男的还是女的，死亡率怎样，溺婴情况怎样，娶了多少媳妇和入赘为婿，出嫁多少女儿等，并帮助农业社建立历史资料档案。费代表的劳动强度很高，报据毕玉明同志汇报，他几乎每天晚上要工作到12时后睡觉。

第二节　实事求是说江村

在吴江县人民委员会呈送江苏省人民委员会和苏州专员公署的报告中，记录了费孝通在调查期间讲过的大量原话，充分反映了费孝通关心农民生活和志在富民的崇高精神，读来倍感亲切：

农业生产方面。费孝通说：

“农业增产很显著，从稻谷产量来看，20年前（1936年）每亩350斤，这几年增加很大，已提高到500斤以上。大概到600多斤还可能，再上去吃力了，到700斤以上不是直线上升了。”

农民收入方面。费孝通说：

“1936年农副业收入除去成本，每人收入为稻谷819斤，1956年为858斤，有所增加，但不显著。主要原因在于副业生产停顿，甚至下降。”

桑蚕方面。费孝通说：

“单产是增加的，总产是下降的。然而从吴江地区看，有技术、有劳力、有工具、有要求，为啥下降？20年前，是由区域分工来种桑养蚕的，即吴江地区桑地少，养蚕却多，向东山、浙江地区买桑叶补充不足。”

农船运输方面。费孝通说：

“摇船，这是潜力。以前农民不使船空，一空做生意，卖萝卜啦，青菜啦，解放后还在发展资本主义，合作化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停了。究竟多少船做生意？多少船做运输？摸不清。但一停下来就困难了，怎样利用这一批船，不是开弦弓一个地方的问题。”

养殖方面。费孝通说：

“开弦弓过去基本上不养猪，现在有所增加，数量偏低。羊比以前少了，养兔数量倒不少，同羊争草料，是否会排挤羊？总的这三方面收入不大。困难在饲料，草越割越远，小孩书不读，割羊草，总的是不值得的。大量水面潜力很大，可种水浮莲等饲料，养猪养羊。水底罱河泥，水中养鱼，这样村子可富一二倍。”

捕捉方面。费孝通说：

“主要是捉鱼捉虾。捉虾赚钱不多，困难：1、队与队之间有矛盾，不能全面发展。2、地区问题，浙江竹子价格涨得很厉害，捕虾笼1953年每百只35元，1956年为95元，目前150元，这要省与省解决。吴江等几个县要研究水乡发展的特点。”

⊙ 1957年5月，费孝通（前左）到开弦弓村月字圩访问庄阿秀（前右），她是费孝通1936年访问过的缫丝厂女工。闻讯赶来的乡亲挤满了屋子。

劳力利用问题。费孝通说：

“怎样利用中年妇女劳动力？有两个方面：一是发展养蚕，二是摇船。社员搞家庭副业与社有矛盾，社要积极支持社员的家庭副业，社员有资金要支持社的生产，这样矛盾就统一了。现在算算账，群众会通，但干部不敢放手。”

家计收入问题。费孝通说：

“我们挑了三四户，一项项用多少钱算一下，人均年收入社里分给为82元，加上家庭副业，100元以上有把握。那不低了，但产生大家叫苦，原因呢？养许多猪到年底全杀来吃了，穿的也不坏，没有俭朴的打算，积累不起来。我同他们讲，不积累，社会主义搞不起来。”

教育问题。费孝通说：

“教员流动性很大，4个教员平均工作没有两年以上，有的是代课教师，不能安心教书，这是人之常情。今天代课，明天又要找生活，对教育儿童根本不会有责任感。学生每年减少，老师不敢见群众面，一学期只有三次，第一次开学，第二次要学费，第三次学生不来要去找。学生家里要他们割羊草，有组织每天只要花两个小时，但学生主要借此出去白相（玩），很开心，对读书没有兴趣。”

干部的文化素质问题。费孝通说：

“现在有不识字光荣的空气，从小学生到大人公开地说。民校也停了，合作化后干部也忙，民校教师无人当了。这村子出现了文化低潮。（说到这里，费孝通停了一下，感慨地继续说）没有文化是不行的，周富林（社干）很好，就是没有文化。‘勤俭办社’连报纸都不订了。这不是办法，这将连世面也看不到了，斩根子！我看干部要带头念书。”

第三节　家乡人民心相印

在这篇报告材料的最后，吴江县人民委员会坦诚地谈到接待费孝通重访江村的认识和意见：

“我们感到费代表这次来我县进行农村调查工作，对我们改进工作帮助很大，他反映的情况，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提出的问题也确实存在的，许多建议都很好。我们将组织有关部门认真进行一次研究，逐步把问题解决。以上当否？请指正。”

我们读到最后这一段话时，真是感慨良多。这是吴江县人民政府（当时称人民委员会）对费孝通“重访江村”发自内心的客观评价，对费孝通

⊙ 1957年5月，费孝通（右）重访江村时，与村民沈宝法（中）等在一起看《江村经济》扉页插图。

的访问从内心表示欢迎，对他提出的中肯意见表示虚心接受。充分说明当年吴江县地方政府及其各级干部的工作，是实事求是和积极负责的。同时，也说明在历史的严峻时刻，家乡人民与费孝通依然心心相印。

费孝通重访江村最可贵之处是讲真话。他通过自己辛勤的调查工作，凭借自己的学识，把农业合作化时期真实的江村记录下来，把发现的问题提出来，并反映上去，这就是实事求是。无论吴江县人民委员会这篇汇报材料是应命之作，还是主动之作，已成为费孝通重访江村重要的历史见证。

第四节　学院调查出奇文

1957年7月，费孝通回到北京，却因言致祸，被打成“右派”。因为农业合作化自始至终是一场自上而下脱离农村实际的政治运动。而且箭已离弓，只能说对，不能说错，只能赞扬，不能批评，对是非的评判，只有政治标准，不讲实践成效。

是年9月，中央民族学院（费孝通时任该院副院长）为开展对费孝通的批判，抽调力量到开弦弓村进行反调查。关于这次调查的目的和概况，在他们的调查报告里有一段自白：

“为了彻底揭露和批判右派分子费孝通在农村问题上对党的攻击，反映农村的真面目，我院党委决定派人前往开弦弓村进行一次全面调查。”[①]

① 1958年1月，中央民族学院政治理论教研室印：《江苏吴江开弦弓村调查报告（初稿）》第2页。

这次调查从9月5日开始至28日结束，历时23天。参加人员有：中央民族学院政治理论教研室黄万纶、余希，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张思骞（同年5月，随同费孝通重访江村的人员之一），中共江苏省委邓克、张玉祥、李保萍、是慧琴等四人，中共吴江县委李海江（也曾随同费孝通重访江村），共计八人。调查组由黄万纶担任组长，邓克担任副组长。

这次调查先后形成三份材料，依次介绍如下：

第一份材料是调查组在吴江形成的原始资料，至今存放在吴江区档案馆。原始资料包括三个独立的打印材料，即：《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土改前后的经济情况：土地占有和阶级关系变化的情况》、《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情况》、《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农副业生产变化情况》。封面上标注的成文日期是“1957年9月24日”，即调查组离开吴江的前4天。从原始资料的总体看，调查组在村子里的调查活动是认真的，虽说调查目的不同，但数据翔实，所写情况基本符合开弦弓村土改前后和合作化时期的实际。所以在本书第五、第六章引用了其中的部分

⊙ 1957年5月，开弦弓村小学，女教师徐佩芬在上语文课。课桌有高有低，学生缺课较多。

素材。

第二份材料是该调查组回到北京后，在原始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写成的调查报告。它的全称是：《江苏吴江开弦弓村调查报告（初稿）》，落款“中央民族学院政治理论教研室印”，署名黄万纶、余希，时间是1958年1月。这篇调查报告在原始资料基础上，插进了大量反映当时政治环境的政治化语言和阶级分析的文字，把费孝通重访江村的学术研究活动，武断地放在彻底否定和批判的位置上，运用所谓阶级分析的方法，打“棍子”、扣“帽子”，上纲上线，颠倒是非。

报告一开头就定下了火药味十足的调子：“费孝通为了效忠于帝国主义，也是为了达到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目的，于1957年5月又至开弦弓村进行了20天的调查，写了‘重访江村’一文。在这篇文章里尽力歪曲农村的新面貌，否认党在农村工作中的成绩，挑拨党和农民的关系，否认合作化的优越性，反对党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报告把费孝通姐姐费达生在开弦弓村与村民一起创办的合作丝厂，说成是“侵犯”农民利益，是“地主阶级更狡诈地压榨和剥削农民的工具”。

第三份材料是在第二份调查报告的基础上，由调查组组长黄万纶经过进一步上纲上线，增加批判力度，写成《费孝通“农村调查”的反动本质》一书，并于1958年11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当年反右派运动中的重点出版物之一。在该书作者前记中，作了这样的自我介绍：

“这篇稿子是参照我和余希同志共同执笔的‘江苏吴江开弦弓村调查报告’中的部分材料写成的。曾经在《哲学研究》1958年第二期上，以‘费孝通在重访江村中干了些什么’为题发表过。这次出书时，又作了部分修改和补充。同时为了使题目更切合文章的内容起见，改题为‘费孝通农村调查的反动本质’。”全书分为5个部分，共58页，表明字数34000，印数4000册。

第九章　逆势而上开弦弓重建缫丝厂

如果把开弦弓村在1929年创办的股份制合作丝厂，看做是中国农村工业化的萌芽，那么在随后七十多年的社会变迁中，开弦弓村在实现农村工业化的道路上，一直在顽强地探索和迈进。因为这些不起眼的农村小工厂，始终与农民的切身利益紧紧地连接在一起，牢牢地扎根在农民的心田中。它像“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小草，一有条件就会发芽，就蓬蓬勃勃地生长，被费孝通誉为“草根工业”。

第一节　支持办厂最开心

“文革”期间，城市里工厂停工，工资照发。而农村，农民不干活，田里不长粮，就无法生活。开弦弓村的村民，一面无奈地维持着生产队长吹哨子上工的集体劳动，一面悄悄地酝酿重办缫丝厂。俗话说物极必反，城市里越乱，对农村的限制反而松。正是在“文化大革命”最乱、“左倾”思潮泛滥最严重的时候，发展的机遇悄悄地降落到开弦弓村村民的面前。在开弦弓村的大地上，重新透出农村工业化的希望之光。

原红卫六队队长倪进兴回忆：“农民要增加收入，必须在副业上动脑筋。我们先想到做土丝，这是一项传统的家庭手工业，合作化前家家都有土丝车，土丝车结构简单，使用方便，是民间的传统创造。村里妇女都会做土丝，合作化后土丝不允许做了，多数农户把闲置在家的土丝车，劈了当柴烧，只有少数农户因舍不得劈，还保存着”。

倪进兴在社员家里一家一家地寻找，不到半天工夫，找到两部木制土丝车。请木匠仿造了7部，安排年纪大的妇女（半劳力）试做。她们在年

轻时都做过土丝，还没有完全忘记。结果这项传统手工业很快恢复起来了，做出的土丝都由外贸部门收购，半年赚了760元。这笔收入在当时是很大的了，要抵几十亩田的收入。大队看到后，认为这条路子好，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就讨论推广。

⊙ 1982年，缫丝厂女工们在车间午餐。

费达生到村里看见红卫六队仿制土丝车，做土丝，专门到村里对村干部讲："手工做土丝效率低、质量差、售价低，机械缫丝效率高、质量好、售价高。现在蚕丝出口行情好，开弦弓村应该把缫丝厂恢复起来。"费达生的意见引起大家的重视，村里商量要把缫丝厂重新办起来，大家都有信心，都很高兴。但是最高兴的还是费达生，因为她一听说大队同意办缫丝厂最起劲，情绪很激动，恨不得马上把缫丝厂办起来。

像老丝厂的创办一样，新丝厂能顺利地恢复起来，同样离不开费达生的支持。在新丝厂创办过程中，费达生帮助厂里解决了很多设备和技术上的问题。在以后一二十年里，她始终关心缫丝厂的生产和经营，有一次到厂里来，听说厂丝质量下降，她急得像小孩一样当众哭了起来，使在场的干部和职工深受感动。

第二节　八村联合同艰辛

开弦弓村要办缫丝厂，在农村普遍办工业的今天看来，只是一件极其平常的事情。但在"文革"期间，"极左"思潮泛滥，农村只能搞农业，办工业就会挨上搞"资本主义复辟"的棍子，或扣上"自发资本主义倾向"

的帽子，随时有坐牢的危险。而且农村要办一个工厂谈何容易，政策上的限制如何突破？集体经济相当薄弱，资金哪里来？技术怎么解决？设备哪里买？土地怎么征用？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一大堆。

当年，在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下，农村很穷。集体和个人平时看不到钱，大队自身没有钱，只有生产队有一点用于添置农具和农业再生产的“公积金”。在这样薄弱的经济家底上，红卫大队单靠自己力量，创办缫丝厂困难重重，想出的办法是和邻近几个大队联合搞。

⊙ 2007年，姚富坤（左3）访谈联合丝厂筹备人周梅生（右2）。

1967年8月7日，红卫大队与立新、合群、繁荣、七一、富强、庆祝、轮穗等周边8个大队达成协议，以股份制形式，联合筹办吴江县庙港人民公社联合缫丝厂（简称联合丝厂）。各大队自愿认股：红卫7股、立新3股、合群2股、繁荣1股、七一3.5股、富强2股、庆祝1.5股、轮穗1股，共21股，每股1300元，筹得股金27300元。股金全部来自37个生产队的公积金。

按照协议由股份最多的红卫大队任命大队民兵营长周梅生为厂长，配会计和保管员各1人，负责筹建工作，并成为后来的企业干部和管理员。根据商定的原则，职工50人由各大队选派，特聘1962年下放回乡的老丝厂工人12人，由她们当师傅，负责缫丝和复摇工作，并带徒弟教技术。8名男职工中，烧煤工2人，保全工2人，电工1人，管理人员3人。女职工57人，主要在缫丝复摇等工种。

是年9月，在红卫大队西清河桥南堍，先后征用土地6.7亩。20日联合丝厂破土动工，刚组合起来的职工人人动手，参加工厂建设，建起5间厂房，用毛竹、芦苇搭建茅草棚做办公室和生活用房。所需的立缫机、复摇机、煮茧机等主要设备，经费达生帮助联系，前往无锡市国营缫丝厂购买淘汰下来的老设备。由于钢铁等原材料供应紧张，有的设备缺少铁架子，

就想土办法解决，安装时砌砖墩做基础。没有锅炉，用铁皮敲一只大圆桶，代替锅炉烧水。所有大小容器，都有红卫5队圆木师傅方荣虎带徒制作。

1968年5月，机器调试，7月中旬正式开工生产。工厂白手起家，从小到大，逐年扩大，第一年一组缫丝车，有6台缫丝机，120绪。第二年增加到两组车，12台缫丝机，240绪。8个大队股东一致同意，先夯实联合丝厂的经济基础以求发展，起初两年未按股分红，把利润投入再生产。联合丝厂成为独立运转的股份制队办工业企业。因由8个大队联办，村民亲切地称它为“八联厂”。

第三节　村民增收靠工业

村民对村里办工业是相当有感情的，因为38年前，费达生技术下乡，在村里与村民共同创办缫丝厂的情景一直牢记在村民的心中。工厂办在村里，机器搬到村里，农民从工厂里得到股金也好，年轻妇女从工厂里得到酬金也好，大家都增加了收入，得到了实惠。

至于为什么在“文革”期间要重办缫丝厂？道理很简单，就是大家寻点钱，归生产队分红，改善社员生活。开始时，受“以粮为纲”政策的限制，厂里工人的工资只能转到所在生产队记工分，年底由生产队分红、发工分粮。后来感到，转来转去太麻烦，而且影响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就直接由厂里发工资。月工资平均只有十多元，后来增加到二十多元，厂长每月拿工资30多元，其他补贴都没有。

⊙ 在西庄漾湖面上远眺开弦弓村，竖立的水塔和烟囱处为联合丝厂。

1968年5月，开弦弓村缫丝厂正式开工生产。

逐年把赚到的利润投入再生产，经过五年的艰苦创业，已成为能独立运转的工业企业。缫丝厂办起来后，村里经济上了一个台阶，工作上活络多了，有了厂就像通了天一样。当时，茧子控制很紧，外贸部门把国家统购的茧子分出来，供给村里缫丝厂缫丝。村里缺少什么物资，以缫丝厂的名义申请，就容易给指标。办了厂，经常有人来参观，上级部门的关系多了，到县里办点事很方便。

回头想想，村里办了厂，田照样种好，工业收入是净多的。当地人多田少，大家都靠有限的土地生活，人越多越苦。办厂初期，开弦弓村进厂就有30多人，后来超过了100人。村民穷与富，就是靠厂，没有厂，这100多人都在田里做，这笔不小的工资收入就没有了。所以，办工业确实是农村必走的一条出路。

在开弦弓村的干部和群众面前，困难和问题奇迹般地一个个被解决，新丝厂很快在开弦弓村的大地上重新建立起来。这一历史性创举，如一枝傲霜斗雪的梅花，在“文革”风雨中，昂首萌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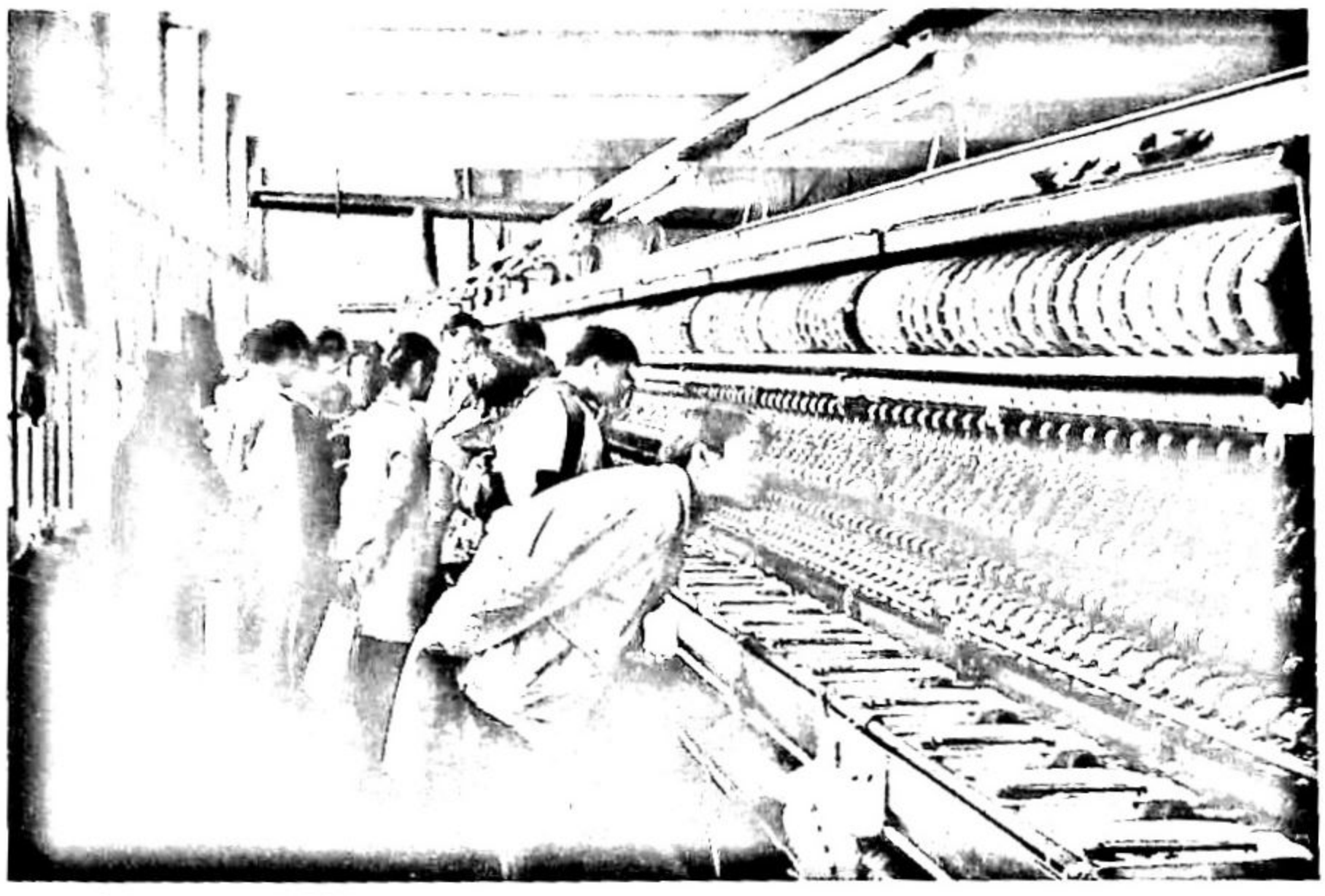
第四节　书记一语厂离村

但是，1972年，新丝厂被公社看中并接管，名义上升为公社办厂。公社派来一名干部担任书记，负责行政管理和掌握审批权，厂门口换上了“庙港公社缫丝厂”的牌子，使工厂由村办厂转为公社办厂，开弦弓村又成为单一的农业村。

缫丝厂被公社接管后，以资金紧张为由，一直把各大队的股金宕在账上，十年后才在村民的要求下归回，既不付利息，更没有分到一分钱红利。所以社员认为，这是1958年“一大二公”后的又一次平调。这样一家由开弦弓村等8个村自发联合创办起来的股份制缫丝厂，历经千辛万苦，克服重重困难，总算初有模样，使村民看到了新的出路和活路，仅凭公社书记的一句话，就从村民手中夺去了。

原红卫大队书记周明芝回忆：

“当时，庙港公社经济薄弱，不少开支都到厂里来报销。后来，公社书



⊙ 1990 年代，学者在缫丝厂自动缫车间参观。

记向我们提出，要把缫丝厂转为公社办厂，要我们从全局出发，因为上升为社办厂后，更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开始时，大家都想不通，但也知道既然公社书记已经开口，挡也挡不住了。‘文革’期间，样样都讲‘政治挂帅’，想不通也要办。唯一能提出的条件，就是希望把股金归回给各个大队，因为这是各生产队的公积金。

“公社也像一个人一样，也讲究面子，场面上想要大气点，口袋里要有钱。把村办缫丝厂收归公社，成为公社里的骨干企业，公社自己没有本事，就用平调村办厂的办法来充胖子。缫丝厂收归公社后，公社书记要求厂里建立厂长基金。开始每月 200 元，主要用于报销公社干部的招待费。市里、县里来检查工作或参观交流，吃顿饭应该报销，喝点酒、抽支烟应该报销。但是大家都来报销，200 元 5 天就报完了，下一年加了个零，变成 2000 元，还是不够用。过几年再加个零，就是 20000 元了。说得难听点，缫丝厂已变成了公社的皮夹子和饭店。”

第十章　改革春风吹江村处处气象新

以1976年粉碎“四人帮”为标志，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国家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代替“以阶级斗争为纲”，各行各业的工作开始走上正轨，全国上下出现复兴的新气象。开弦弓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传统副业得到恢复，村办工业兴起，村民的就业门路扩大，全村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村民生活水平逐年提高。

第一节　“兄弟分家”都开心

开弦弓村生产制度改革分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个阶段，1975年至1978年，大政策仍然是“以粮为纲”、“农业学大寨”、“越大越公”，越做越穷。村里干部、群众实在看不过去了，冒着风险，自发对生产制度进行改革，把原生产队分成几个小组，开展季节性的生产承包责任制。具体的做法是，对“夏收夏种”、“秋收秋种”等大忙季节的农活，实行“定工分、定田亩、定质量”的承包制。实践下来效果很好，既减少了浪工，又使成熟的粮食得到及时收割和入库，并提前完成播种任务，使农忙时间比往年缩短了四至五天。农忙结束后，小组就解散，完全处于半公开状态。

第二阶段，1979年至1982年，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党对农村的政策逐步放宽。七都公社吴溇大队第十生产队率先实行分组联产责任制，村里开船去参观学习，队长、组长都参加。回来后，先在开弦弓7队和12队搞试点。农田、农具都分到组，以产量定工分，然后在全村推开。大多数生产

队分成3个组，人数少的生产队分成2个组。脱粒机，船只等集体大型农具，以及仓库、工场、蚕具都平分到组。仍以原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年终仍在一本账上分红，但组与组之间有了竞争性，工效、产量、分配水平都得到提高。

第三阶段，1983年，农村公开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田按人头划分，原则是土地归集体所有，由农户承包经营。承包经营实行“三田制”，即：口粮田，按家庭人口划分，每人半亩；责任田，按劳动力划分，每劳动力一亩左右；饲料田，按农户平均养猪数来划分，1头猪约0.1亩。同时，调整了社员家前屋后的自留地。

产品分配实行大包干，农户在完成规定交纳的国家征购任务（农业税）、集体的“两金一费”（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后，自主支配收获的农副产品，自主安排家庭经济收益。原生产队所有的农具、农船和农业生产资料，全部分到农户。

⊙村民在自己建造的新屋场地上，自由自在地晒谷。实行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后，村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

大型农具最难分，比如船只，每个生产队平均拥有6到7只，但农户数平均约30多户，不够分。当时采取的办法是，队里补贴一点，社员自己出一点，平均每个生产队新买船只10只以上，平均2至3户分到一只船。小农具、蚕具也都分到户，分不够再添。拖拉机、水泵等，一家一户难解决的，仍有集体指定专门人员管理。

如果说，土地改革还带有“革命”的严肃性，那么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则始终洋溢着喜庆的气氛。全村就像弟兄分家一样，在很短的时间里，在热热闹闹中有条不紊地把原生产队所有的全部集体资产分到农户，在全村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农业合作化和“农业学大寨”运动，画上了一个彻底结束的句号。

“分家”时，村民之间也有计较，为了分得公平，难免会吵吵闹闹。但

是，“分家”的结果是，“老大”高兴，“老二”也开心。因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村民有了耕作土地的自主权，可以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美好的生活。

第二节　“懒惰”反笑“勤谨”人

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田里收多收少都是自己的，生产做好做坏处处在留心。不光要提高产量，增加收入，而且要降低成本，省力省工。因为省下来的精力和时间，可以搞其他经营，增加家庭收入，免耕法应运而生。

姚富坤回忆：

“免耕法指晚稻收割后，不经耕翻，直接播种小麦，或直接种入油菜，这样可省去很大的劳动量。当年先有公社农科站在少量田块里搞试验，用免耕法种麦、种菜。我作为村农技员一起参加了试验，弄清了其中的科学道理后，也在自己家里的田里使用免耕法。所以，我是村里第一家搞免耕法的农户。

⊙1982年1月，村民们在修筑穿过开弦弓村的公路路基。

“开始时，大家不相信，说这是懒人想出的懒办法。把用免耕法种的麦子和油菜，称作‘懒汉麦’、‘懒汉菜’。因为农民世世代代种田，都是先耕翻土地，再播种，称为精耕细作。合作化后，更是强调深耕密植，从来没有听说种田不耕田的。最后结果呢，每亩耕翻田小麦只能收600斤，而每亩免耕田小麦可收750斤，亩产增加100多斤。油菜也明显增产，免耕田的产量远远超过了耕翻田的产量。在事实面前，不相信也得相信，大家服帖了。第二年，全村农户纷纷使用免耕法，大家一齐赞美科学种田好，没有人再说免耕法是懒人种田了。”

使用免耕法省工又增产，有其科学的道理：

俗话说："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江南农村传统的种植制度，普遍使用"稻-麦"两熟制，水稻收割后，先要耕翻土地，再把土块耙细，做成土垄（埝），才能播种小麦，费时费工，劳动强度大。使用免耕法，稻子一收，直接播种麦子，既省时、省工，而且播种时间比传统耕翻法提前一星期左右，抢到了农时。可以使小麦在寒冬到来之前，幼苗得到充分的生长和发棵分蘖，使麦苗粗壮，有利于开春后拔节、抽穗和灌浆，提高了产量。

而且水稻收割后，使用免耕法播种小麦，土地不用耕翻，土壤原有的毛细管系统不受破坏，地下水分容易送达地表，利于小麦发芽和生根。其次土壤组织紧密，容易保持水分和减少肥料流失，并使麦苗扎根牢固，增强抗寒能力。对油菜的生长来说，"免耕菜"相对传统种法，与免耕小麦一样，也具有抢季节、利生长的优点外，特别有利于提高油菜的抗寒能力。因为耕翻地土壤间隙大，扎根松，遇到零度以下的寒冷天气，由地面土壤中的水分形成"霜吊冰"，把菜根拔起。按免耕法种的油菜，风吹不到根部，就不会受"霜吊冰"等冻害。

第三节　产业结构巧调整

随着市场经济机制逐步形成，原来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要花大气力做的事，常常显得轻而易举。以前政府要农民搞产业结构调整，先要层层开会，动员发动，还要出台优惠政策和奖励措施，农民还是有的肯调，有的不肯调。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结构调整以市场信息为导向，以赚钱多少为依据，依靠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有效组合社会各方面的生产要素，形成新的生产能力，满足社会不同的需求。不费政府举步之劳，实现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

开弦弓村近在太湖边，清澈的太湖水通过河道流入村区内的东庄荡、西庄荡和周围河网，由于开弦弓村水域的水质好，养殖的虾、蟹、鱼类等水产，

味道鲜美，可与野生相媲美，发展淡水养殖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八十年代中期，人工培育蟹苗成功，池塘养蟹业应运而生。至九十年代中期，粮食征购任务继续减轻，粮食购销完全进入市场，为“粮改渔”创造了宽松的环境。

开弦弓村先有少数村民掌握了池塘养蟹技术，并摸索出虾蟹混养、鱼蟹套养的经验，取得可观的经济收益。村民纷纷效仿，开池养蟹的面积逐年增加。从1996年开始，到2010年，全村有2462亩粮田桑地开挖成鱼塘，从事鱼蟹养殖，水稻田和桑地分别比2001年减少94%和71%。有8个生产队变成无稻田队，其余生产队也只有少量零星稻田。2010年，全村土地租金收入209万元，超过原来的种植收入。

⊙1998年，联合收割机在村里收割水稻。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联合收割机一叫就来。

⊙2007年，养蟹农户在新开挖的池塘里喂饲料。

讲到粮改渔，姚富坤用翔实的数据道出了增收的奥秘：

“为什么村民会这样积极地去开挖池塘呢？说穿了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开鱼池收益高，一次开挖，长期受益。种粮食收益低，而且人辛苦。可以这样算本账：1亩田种稻，收稻谷1100斤，每斤稻谷以1元计算，产值1100元，扣去成本：人工10工，400元；化肥140元；农药60元；种子15元；机耕、脱粒、管水120元，共计成本735元，得利润365元。如开挖鱼塘，1亩田池租金900元左右，超过种稻收入535元。在两种经营方式面前，村民都愿意选择开挖鱼池，坐收比种粮多得多的土地租金。”

而且，土地租金在逐年提高，1996年，每亩池租金平均280元，2000年上升到380元，2005年达到600至650元，2006年又上升到800至850元，2010年上升到900至1000元。为什么池租金会逐年提高呢？原因是养殖户

都采用虾蟹混养和鱼蟹套养的养殖技术，池塘养殖的收益在提高。

2010年，全村建成蟹池2462亩，还剩水稻田100亩、桑地255亩、果园15亩。不少学者看到这一情况，十分吃惊，认为再开鱼池要没有饭吃了。实际上，“粮改渔”是农业内部的结构调整，生产的仍然是食品。如果种粮的收益超过养鱼、养蟹，农民又会主动地“渔改粮”了，所以这与城市建设用地占用耕地是两回事。

第四节　江村处处气象新

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似乎是突如其来的农村生产制度的改革，当时学术界争论很大，有人认为“辛辛苦苦三十年，一步退到解放前”。确实，回过头来想想，从1954年，开弦弓村建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算起，至1983年重新分田到户，算来正好30年。但是，实践已充分证明，这不是历史的倒退，而是社会的进步。

讲起改革开放前后的变化，开弦弓村23组组长徐雪荣语重心长地说：

“我24岁当队长，当了32年生产队长，要说改革开放前后的变化，真是比也不能比，不知好了几十倍。当年除了大风大雨，作为队长，不但要天天出勤，而且还要隔夜里安排好生产队第二天的生产。一早出来吹哨子上工。合作化这30年，村民在一本簿子上记工分，在一根秤上分粮食。天不亮开早工，天黑了‘挑灯夜战’开夜工，大年初一也在大搞积肥。但是，做煞还是苦煞，连肚皮也

⊙ 1982年1月，村里的老人家在冬日的太阳里相聚饮茶。解决温饱后，老人的心情也轻松了。

吃不饱。

“不说三年困难时期饿肚皮，平常年景每日三餐以粥为主，但是粮食越紧张，饭越吃得下，一个人一顿吃一斤米饭，还讲没有吃饱。现在一个人吃二两、三两饭，却说吃不下。道理很简单，过去滑落落（单一）吃点饭，小菜连青菜萝卜都很少。改革开放后，农副产品种得多了，家禽家畜养得多了，市场供应充足了，而且价格便宜，想吃什么有什么，肚皮里油水多了，饭就吃得少了。

“过去村民穿土织布衣服，穿破了补一补。我年轻时穿过一条毛料裤子，已经晴煞（极高兴）了。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队里就很难看到穿补丁衣服了，年轻人不但讲款式，还要讲品牌。过去农民家里连自行车都没有，现在仅我们东片4个队（西草田）就有汽车30辆，其中轿车20辆，小卡车10辆。

“过去，家庭手工业被取消，我父亲手里做过土丝，后来（合作化）就不允许做了。现在全队20户人家，有一半多在办家庭工业，主要是做电脑横机，经营羊毛衫。其余有开饭店1户，跑运输2户，养殖3户，进厂1户。我家儿子、媳妇就是搞羊毛衫编织，添置了7台电脑横机，已经做了五六年，市场形势好，小夫妻全年可赚10万元。

“合作化时期，村里几乎看不到新房子，多数人家几代人挤在老房子里，要造房子不敢想。子女结婚，多数是在老房子里隔一隔，就算新房了。村民省吃俭用，手中积了点钱，却买不到建筑材料。就算千方百计买到了建筑材料，要请匠人（建筑师傅）也请不到，不是没有人做匠人，而是年轻人想学个手艺，如木匠、泥水匠、裁缝，都要大队和公社批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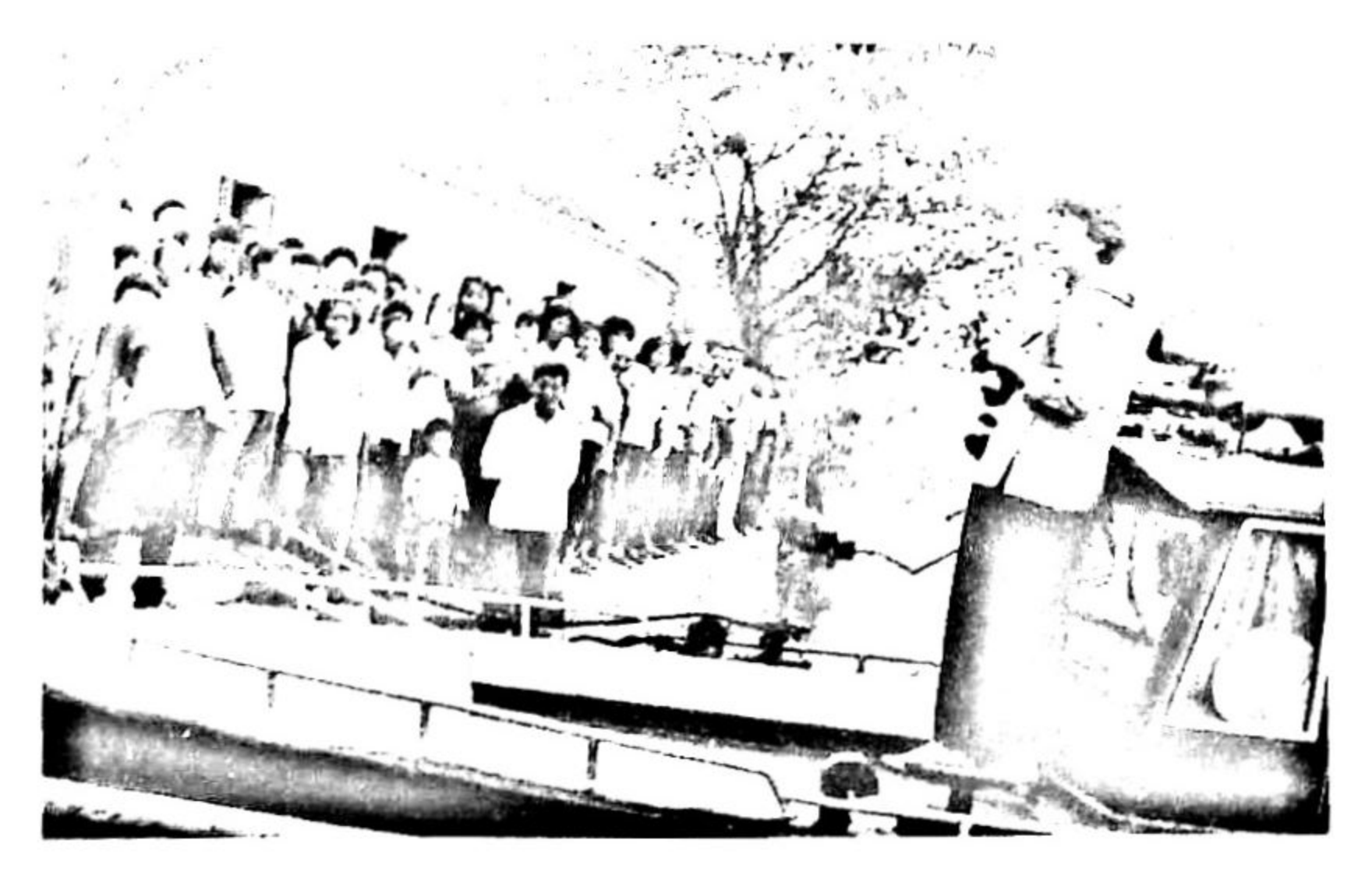
“改革开放后，政策宽松了，村民手中有钱了，建筑和装修材料买得到，匠人好请，想造房子很容易，所以村里年年有人家造房子。特别是进入九十年代后，村民建房进入高潮期，而且大部分建楼房。总的趋势是，八十年代中期平房改楼房，九十年代楼房改别墅，房子越造越好。同时，造房户多了，建房市场大了，市场上建筑材料也多，建筑队伍不断壮大。”

第十一章　南希访江村四件礼物寄真情

1981年9月20日至24日，美国科学促进协会常务董事、美国农业发展委员会亚洲组主席、马里兰大学副校长、人类学教授南希·冈萨雷斯应中国科协邀请，先访问安徽凤阳，再来开弦弓村访问，结束后在苏州与费孝通会见，交流了访问感受。南希·冈萨雷斯是第二位访问开弦弓村的国外学者，也是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后，第一位访问中国的外国学者。

第一节　坐船进村作访问

9月20日清晨，南希·冈萨雷斯由翻译朱葆琛（中国科协国际部美大处）、苏州地区外事办王士庆陪同，从苏州坐车，8时半抵达吴江县震泽镇，受到等候在那里的吴江县政府办公室杜庆云、庙港镇政府周正华、开弦弓村两个大队沈春荣和周全福等人的迎接。即刻乘上停在河边的小汽艇，赴开弦弓村，冈萨雷斯通过翻译了解接待者的职务和姓名，并询问何时得知她要



⊙ 开弦弓村民欢迎南希·冈萨雷斯来访。

来开弦弓村。汽艇激起的波浪拍打着河道的两岸，冈萨雷斯饶有兴趣地欣赏沿途连片桑地、平整的绿色稻田、树丛中的村庄，拍摄了不少照片。

上午 10 时 50 分，汽艇开过西藏荡宽阔的湖面，进入小清河，停靠在开弦弓南村（红卫大队）一侧，河岸上站满热情欢迎她的村民。南希·冈萨雷斯激动地向村民打招呼，拿照相机拍照。庙港乡文化站站长同时拿起照相机拍下了历史性的一刻。冈萨雷斯的住房安排在开弦弓荷花湾大队部的楼上，她看过房间满意地说："比我想象的好得多。"

南希· 冈萨雷斯一到大队部还没有坐下，就好奇地观看贴在墙上的各种图表，一一询问。周正华代表庙港政府介绍开弦弓村简要情况。她听后说："去年我访问了西安和北京，今年来之前已到了辽宁、安徽、广州、杭州、上海等地，包括开弦弓在内，已到过中国 20 个人民公社。到开弦弓是她访问的最高潮，其他地方都是住宾馆，只有开弦弓村是吃住在村里。本来费孝通先生要和我一起来的，感到很高兴，但费老临时因病不能同来，又感到很遗憾。"时近十二点用午餐。

南希· 冈萨雷斯在开弦弓村的访问，日程排得满满的，参观访问的项目，包括随机的访问项目，一个接着一个。她充分利用时间，不停地看，不停地问，不停地记，工作效率非常高。短短的四天时间里，共进行了 34 次调查活动，其中包括访问 5 户社员家庭，参观社队工副业 10 处，召开座谈会 3 次，参加生产队社员大会 1 次，还调查访问了学校、合作医疗站、商店等单位，并在 3 户社员家里吃了午餐，接触社员群众 300 多人。

在整个访问中，南希·冈萨雷斯热情友好，讲话直爽坦率，工作一丝不苟，兴趣广泛。对了解任何问题都要反复核实，打破砂锅问到底，并再三提出反对客套和冗长的介绍，欢迎提供具体数据，要求和社员自由交谈，不要干部参加。在这次接待工作中，我方始终遵照万里副总理"实事求是，不做手脚"的指示要求进行的，大胆放手让外宾直接接触群众，充分显示出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对自身的发展充满信心。

第二节　紧凑高效访江村

9月20日下午，南希·冈萨雷斯先后参观了荷花湾大队丝织厂，看了生产过程和产品，询问了工人工资报酬的计算方法和奖励办法。当走到荷花湾第五生产队时，看到蚕茧生产组的社员在摘茧，她询问了该组人数、户数，计酬办法，还看了五队的蚕室和幼蚕生长情况，蚕室温度的控制方法。参观荷花湾大队商店，询问商店人数，售货情况。参观庙港公社缫丝厂（原开弦弓缫丝厂）、了解缫丝过程，蚕蛹的用途，当知可作食品吃时，她提出要尝尝，当天晚餐准备了油尕蚕蛹。还参观了荷花湾粮饲加工厂、访问了村民徐火泉和周永坤家庭，晚上召开村民座谈会。

9月21日上午，南希·冈萨雷斯一吃过早饭，就去红卫三队参观蘑菇种植场。再越过东清河桥，到开弦弓北村（立新大队）访问，在立新一队晒谷场上观看社员在附近田里开采泥炭，到一队村民徐德昌家观看用泥炭烧饭的情况，还参观了他家儿子的新房，然后参观立新大队制糖厂，到村民钱金和家访谈，了解全家生活情况，并在钱金和家用午餐。下午先后参观立新四队蚕房、立新大队丝织厂、立新6队养猪场和防洪闸。回来的路上，又走访了村民姚雪荣家和倪桂法家。晚上阅读为提供她的全村的各种资料。

⊙ 南希·冈萨雷斯在村民家中访谈

9月22日上午，参观访问红卫中心小学、红卫初中班，听取校长辛培灵、教师周仁虎介绍村里的教育情况和办学经过，观看学生课前眼保健操和课间广播体操。访问红卫一队村民姚玉山家（在费孝通《江村经济》一书的

来开弦弓村。汽艇激起的波浪拍打着河道的两岸，冈萨雷斯饶有兴趣地欣赏沿途连片桑地、平整的绿色稻田、树丛中的村庄，拍摄了不少照片。

上午 10 时 50 分，汽艇开过西藏荡宽阔的湖面，进入小清河，停靠在开弦弓南村（红卫大队）一侧，河岸上站满热情欢迎她的村民。南希·冈萨雷斯激动地向村民打招呼，拿照相机拍照。庙港乡文化站站长同时拿起照相机拍下了历史性的一刻。冈萨雷斯的住房安排在开弦弓荷花湾大队部的楼上，她看过房间满意地说："比我想象的好得多。"

南希·冈萨雷斯一到大队部还没有坐下，就好奇地观看贴在墙上的各种图表，一一询问。周正华代表庙港政府介绍开弦弓村简要情况。她听后说："去年我访问了西安和北京，今年来之前已到了辽宁、安徽、广州、杭州、上海等地，包括开弦弓在内，已到过中国 20 个人民公社。到开弦弓是她访问的最高潮，其他地方都是住宾馆，只有开弦弓村是吃住在村里。本来费孝通先生要和我一起来的，感到很高兴，但费老临时因病不能同来，又感到很遗憾。"时近十二点用午餐。

南希·冈萨雷斯在开弦弓村的访问，日程排得满满的，参观访问的项目，包括随机的访问项目，一个接着一个。她充分利用时间，不停地看，不停地问，不停地记，工作效率非常高。短短的四天时间里，共进行了 34 次调查活动，其中包括访问 5 户社员家庭，参观社队工副业 10 处，召开座谈会 3 次，参加生产队社员大会 1 次，还调查访问了学校、合作医疗站、商店等单位，并在 3 户社员家里吃了午餐，接触社员群众 300 多人。

在整个访问中，南希·冈萨雷斯热情友好，讲话直爽坦率，工作一丝不苟，兴趣广泛。对了解任何问题都要反复核实，打破砂锅问到底，并再三提出反对客套和冗长的介绍，欢迎提供具体数据，要求和社员自由交谈，不要干部参加。在这次接待工作中，我方始终遵照万里副总理"实事求是，不做手脚"的指示要求进行的，大胆放手让外宾直接接触群众，充分显示出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对自身的发展充满信心。

第二节　紧凑高效访江村

9月20日下午，南希·冈萨雷斯先后参观了荷花湾大队丝织厂，看了生产过程和产品，询问了工人工资报酬的计算方法和奖励办法。当走到荷花湾第五生产队时，看到蚕茧生产组的社员在摘茧，她询问了该组人数、户数，计酬办法，还看了五队的蚕室和幼蚕生长情况，蚕室温度的控制方法。参观荷花湾大队商店，询问商店人数，售货情况。参观庙港公社缫丝厂（原开弦弓缫丝厂）、了解缫丝过程，蚕蛹的用途，当知可作食品吃时，她提出要尝尝，当天晚餐准备了油氽蚕蛹。还参观了荷花湾粮饲加工厂、访问了村民徐火泉和周永坤家庭，晚上召开村民座谈会。

9月21日上午，南希·冈萨雷斯一吃过早饭，就去红卫三队参观蘑菇种植场。再越过东清河桥，到开弦弓北村（立新大队）访问，在立新一队晒谷场上观看社员在附近田里开采泥炭，到一队村民徐德昌家观看用泥炭烧饭的情况，还参观了他家儿子的新房，然后参观立新大队制糖厂，到村民钱金和家访谈，了解全家生活情况，并在钱金和家用午餐。下午先后参观立新四队蚕房、立新大队丝织厂、立新6队养猪场和防洪闸。回来的路上，又走访了村民姚雪荣家和倪桂法家。晚上阅读为提供她的全村的各种资料。

⊙ 南希·冈萨雷斯在村民家中访谈

9月22日上午，参观访问红卫中心小学、红卫初中班，听取校长辛培灵、教师周仁虎介绍村里的教育情况和办学经过，观看学生课前眼保健操和课间广播体操。访问红卫一队村民姚玉山家（在费孝通《江村经济》一书的

插图中，姚玉山在田间做秧田播种），姚玉山向她介绍了解放前后全家生活上的变化，他的妻子用当地接待贵客的习俗，用甜茶、糖烧芋艿和自制的熏青豆招待客人，并与客人共进午餐。下午到红卫10队时任公社管理委员会主任的周正华家访谈，并与在场的成年妇女和老年妇女座谈。接着再次来到立新大队钱金和家，照了一张“全家福”。晚上南希·冈萨雷斯在住处抄写开弦弓村资料。

9月23日上午，南希·冈萨雷斯访问红卫合作医疗站，了解收费情况，看赤脚医生看病、打针、换药。参加荷花湾4队社员会，听社员讨论责任制落实，桑田管理小组劳动力搭配。下午召开社队干部座谈会，询问统计表数字的来源和情况，弄清早晚稻、粳稻、籼稻，了解开弦弓八队三业分开分组联产责任制情况。晚上召开妇女主任、妇女队长、女赤脚医生参加的计划生育座谈会，详细了解计划生育情况。

第三节　村民生活问仔细

南希·冈萨雷斯在开弦弓村的访问中，对改革开放初期的开弦弓村怀有极大的热情和兴趣。她在参观中，现场观看和了解了养蚕、养猪、蘑菇种植、捉虾、挖泥炭和泥炭使用、制糖、缫丝、织绸、粮食加工、电力灌排、商店营业、“赤脚医生”（农村医生）换药扎针的实际过程。询问了工厂分配、职工收入、学校教育、教师待遇、合作医疗事业、“赤脚医生”待遇等情况。

⊙　南茜在开弦弓村一队徐雪坤新婚夫妇的新房里，打开箱子看了箱内的新衣料。（1982年摄）

在村民家中访问时，了解了生产队联

产计酬、户与户之间的关系、氏族关系、家庭结构、村民生活、人情风俗、婚姻习俗等各方面的情况。她在徐伯兴家，极有兴趣地了解专业承包捉虾的情况，对捉虾工具照了相。在徐德昌儿子徐雪坤的新房里，她开箱看了箱内的新衣料，询问了新娘嫁妆、结婚仪式，小夫妻日后计划生育的打算。访问社员周志浩家时，问了家庭经济收入，边听边算账，并在周家共用午餐。她用方言自称是“自家人”，并高兴地认周志浩母亲为“干娘”。

南希·冈萨雷斯十分关心费孝通及其姐姐费达生，在红卫五队老年村民倪桂法家和一队姚玉山家访谈时，专门问起了费孝通及其姐姐费达生在开弦弓村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在第一天（9月21日）晚上召开的村民座谈会上，应她的要求，专门请到了在《江村经济》和《重访江村》照片中出现的村民，他们是：南村红卫大队姚金奎，生产队长，插图中的腰鼓队队员；赵成汉，副业组村民，插图中在踏水车；蒋金娥，红卫三队妇女，当年是蚕桑生产上很有技术的小姑娘，插图中的腰鼓队队员；周富林，土改干部；北村立新大队村民周海珍、周荣泉。

第四节　四件礼物情义深

在这次访问中，南希·冈萨雷斯处处受到开弦弓村人民的热情欢迎，真诚和朴实的款待，使她亲眼看到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的真实面貌。同时，她对开弦弓村充满热情和友好的访问，也使她成为中美交往中的友好使者。她在最后一天的告别晚会上，热情洋溢地发表了很多感想，向开弦弓村人民表示深切的感谢。

⊙ 南希·冈萨雷斯坐船观赏小清河两旁的美丽景色

她说：“你们这里确实起了很大变化，虽然交通不便很偏僻，可是你们在世界

费孝通一到村部，看到村里的大会堂改成丝织厂的厂房，远远就听见沙沙的织机声，车间里年轻的女工熟练地操作着丝织机，非常高兴。他走到村部新建的五楼五底办公大楼阳台上，向南看去是枝条繁密的百亩大桑园，桑枝随风摆动，郁郁葱葱。再往南看，是几百亩丰收在望的金黄色稻田，生机勃勃。费孝通感慨地说："真是家乡巨变，农副工齐发展。"他在村部办公室坐定后，心情特别激动，主动叫工作人员拿宣纸和毛笔，随手挥笔写下二首唐诗，书赠开弦弓村，表达自己对家乡和父老乡亲的深厚感情：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已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费孝通在开弦弓村的访问中，看到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劳动生产力，加快了副业和工业发展的情况。在前三年里，开弦弓村人均年收入从 1978 年的 114 元，增至 300 多元，终于打破了农业合作化时期的 20 多年间，农村经济长期徘徊的局面。

他说："我觉得特别兴奋的是，在这里看到了我几十年前所想象的目标已在现实中出现，而且为今后中国经济的特点显露了苗头。"[1]费孝通在村子里的 4 天里，向干部群众详细了解全村农业、副业、工业、土地、人口、文化教育、农民收入、家庭生活等情况，参观了缫丝厂和丝织厂。

三访期间，县长于孟达向费孝通汇报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县政治经济面貌发生的变化。是年 11 月，费孝通在英国伦敦接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颁发"赫胥黎纪念章"仪式上，以《三访江村》为题发表演讲，第一次提及"用开弦弓村作为观察中国农村变化的小窗口"，[2]并提出"将在开弦弓村建立一个社会调查基地，一个可以进行继续不断地观察的社会科学实验室"的愿望。[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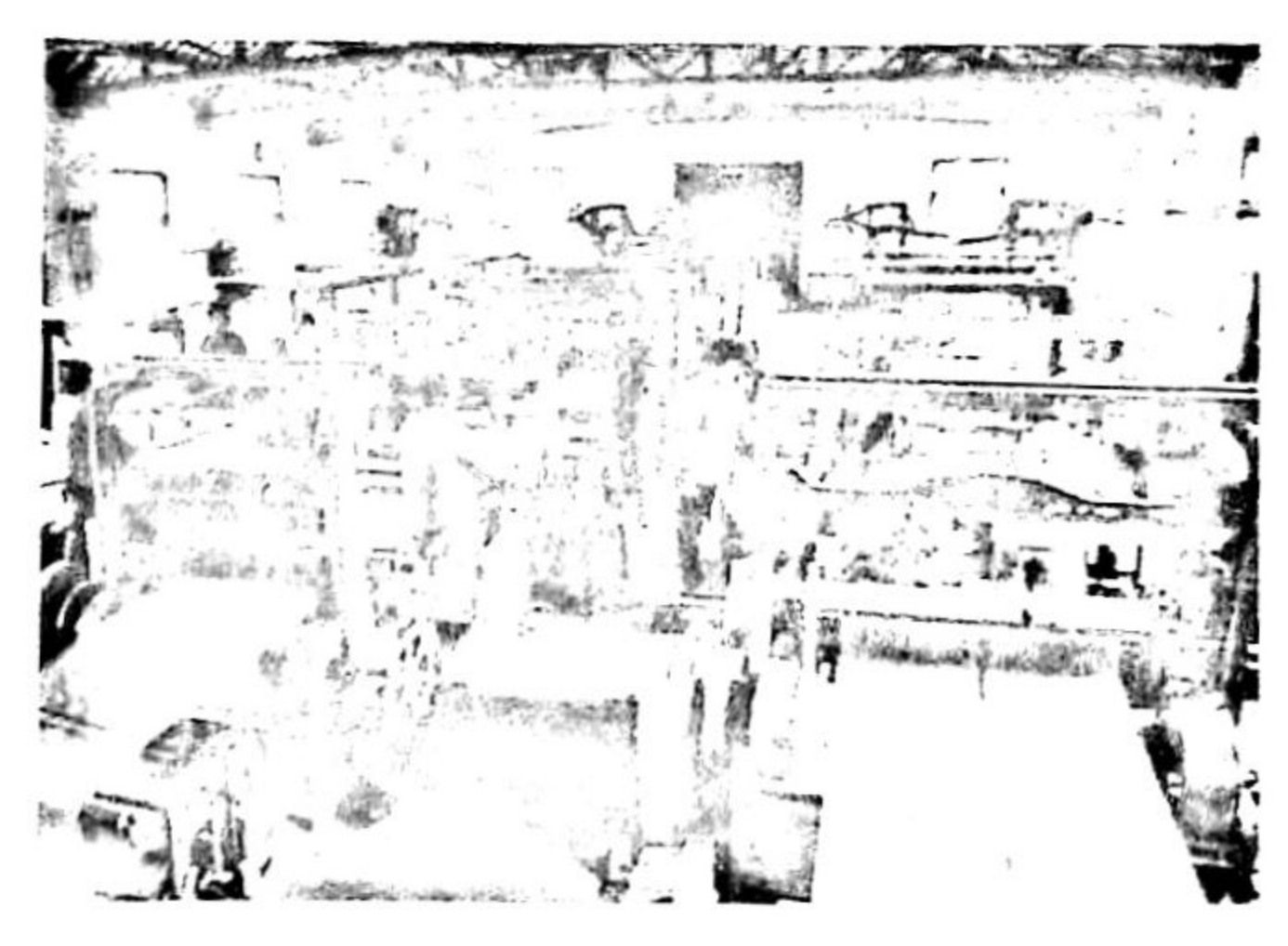
---

① 费孝通《三访江村》，载《爱我家乡》第 49 页，群言出版社，1996 年 6 月。
② 费孝通《三访江村》，载《爱我家乡》第 34 页，群言出版社，1996 年 6 月。
③ 费孝通《三访江村》，载《爱我家乡》第 49 页，群言出版社，1996 年 6 月。

第二节　乡土孕育小城镇

费老“三访江村”时，看到全县农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被解放出来的农村劳动力，以“离土不离乡”的形式，进小城镇做工，经商，搞服务，使“农、副、工”三业得到全面发展，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小城镇显露出繁荣的景象，感到非常高兴。

费孝通从小生长在小城镇，对小城镇建设有着特别的感情。1982 年 10 月，费孝通五访江村，县长于孟达接受他的要求，陪同访问了吴江县的盛泽、震泽、松陵、平望等县属镇。费孝通感触很深，他认为吴江小城镇在历史上有过繁荣发展的时期，但是在六十、七十年代“以粮为纲”，搞单一经济，取消商品生产，使小城镇不断衰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才使小城镇表露出复苏的苗头和复兴的气息。



⊙ 1982 年，开弦弓村丝织厂立织车间，原为村大会堂。

1983 年 5 月，费孝通“六访江村”，他带领由中科院社会学所、江苏省委政研室、江苏省社科联、民盟中央、北京大学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吴江全县小城镇开展全面调查。是年 9 月，他在南京召开的“江苏省小城镇研究讨论会”上，作“小城镇，大问题”的长篇发言。提出小城镇的定义，深入分析小城镇的类别、层次、兴衰、布局和发展等种种理论问题。他认为，小城镇是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加快小城镇建设可以推动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和加快城镇化进程。他讲了一个上午还没有讲完，下午继续讲，会议反

应十分强烈。

发言中，费孝通举了一个十分生动而朴实的例子——航船。他说："航船就是普通手摇的有舱的小木船，因主要用于人的交通和货物的流通而得名。那时（1936 年）村子（开弦弓村）里有两条航船。……后来我也'免费'搭乘航船往来震泽，发现震泽镇的市河里停靠的航船有上百条，据说都是来自镇周围各村。震泽显然是附近这些农村的商品流通中心。""通过航船，震泽与其周围一定区域的农村连成了一片。这几百条航线的一头都落在震泽镇这一点上，另一头则牵着周围一片农村。当地人把这一片滋养着震泽镇，同时又受到震泽镇反哺的农村称之为'乡脚'。没有乡脚，镇的经济就会因营养无源而枯竭；没有镇，乡脚经济也就会因流通阻塞而僵死。"[①]

1984 年 8 月，在费孝通的指导下，家乡吴江成立吴江县小城镇研究会。花两年时间，完成了有史以来全县七大镇及部分乡集镇的首次总体发展规划的制定工作。提出了实行镇乡合并，沟通城乡关系的建议，得到江苏省和苏州市委的肯定。是年在吴江黎里镇进行撤乡建镇、实行以镇管村新体制的试点工作。打通了原黎里乡政府、镇政府之间一墙之隔的墙，把乡、镇分设的两套机构合并成一套机构，使黎里镇的镇区和周围农村的规划和建设统一起来了。从 1985 年起，乡镇合并的工作逐步在吴江全县和整个苏南地区推开，城乡关系由分隔走向融合，小城镇应有的地位得到确立。

第三节　乡镇工业添活力

关注和研究乡镇工业发展，是费孝通在"江村访问"中，追踪时间长、倾注精力大、发表论述丰富和社会影响巨大的又一课题。八十年代初，乡镇工业在苏南大地上兴起，一方面农村干部和广大农民群众发扬"四千四万"精神（即走尽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从田头走进工厂，走向市场，走向富裕美好的新生活。另一方面，对农民

① 费孝通《小城镇大问题》，载《爱我家乡》第 60—62 页，群言出版社，1996 年 6 月第一版。

办工业这一客观现象，引起了社会的不同反响，有的支持，有的反对，反对的意见常常占据着上风，给乡镇工业扣上“浪费资源”、“污染环境”、“挖社会主义墙脚”、“培养资本主义的温床”等“罪名”。

面对这一局面，费孝通坚定地站在农民利益的立场上，热情关心和支持乡镇工业的发展。1981年四访江村时，他调查了吴江乡镇工业在农村经济中的地位作用问题，在一次乡镇工业座谈会上，乡镇干部和企业代表发言时，都按当时习惯称乡镇工业为“乡村工业”，费孝通听后热情地说，“乡村工业的叫法好，这个名字早就有了。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乡村工业的生命力是强大的，是农民自己需要的，是有基础的。”

1984年“八访江村”时，费孝通走访了家乡吴江的大部分乡镇和骨干企业，而且还连续调查了苏、锡、常、通四市及所辖的部分县、镇，拓宽了对乡镇工业的社会调查。进一步看到，乡镇工业发展快的地方，农民先富起来了。他认为：“这个事实应当大书特书。中国农民在农业繁荣的基础上，兴办乡镇工业，乡镇工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农业生产，走上农民富裕、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道路。这是一条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出现的和资本主义以农村崩溃为代价的工业化迥然不同的新路。这条符合我国国情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业化道路，不是从理论上推论出来的，而是农民群众在实际生活中自己创造的”。“乡镇工业要不要发展，如何给予科学的定位，作出正确的评价，不是哪个人说了算，而必须让事实来讲话。”

⊙ 县长于孟达陪同费孝通访问开弦弓村。

1985年7月，费孝通“九访江村”，他不顾盛夏高温，先后访问了吴江的开弦弓村和庙港、北厍、梅埝、桃源、黎里、平望、震泽等乡镇，深入考察乡镇工业的发展前景。写成《九访江村》一文，用大量事实和数据回答了社会上强加在乡镇工业头上的“盲

目发展”、“浪费资源”、“水分太大”等种种不实之词。

他认为：“乡镇工业今天的高速度主要来源之一是农民的集体积累，它是十几年来农民工劳动的结果。乡镇工业发展是有深厚根基的。”[①]再次满腔热情地把乡镇工业比作“草根工业”，他说：“在初期短短几年里，苏南的乡镇工业到处蔓延，落地生根，历经艰险而不衰。社队工业的这种强盛的生命力和普遍的适应性，不能不使人想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小草，草根深深地扎在泥土之中，一有条件它就发芽，就蓬蓬勃勃地生长。这种社队工业，可以称作草根工业，Grassroots Industry。”[②]

费孝通曾三次访问七都镇，充分肯定七都人把发展乡镇工业的突破口，确定在培育发展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通讯电缆行业上，并把进一步发展的目标瞄准科技含量更高的光缆，称为“朝阳工业”。热情赞扬七都乡镇工业已从“草根工业”长成为在市场经济大风大浪中有竞争力的“满帆工业”，成为加快推进农村城镇化进程的物质基础，使乡镇干部得到启示和鼓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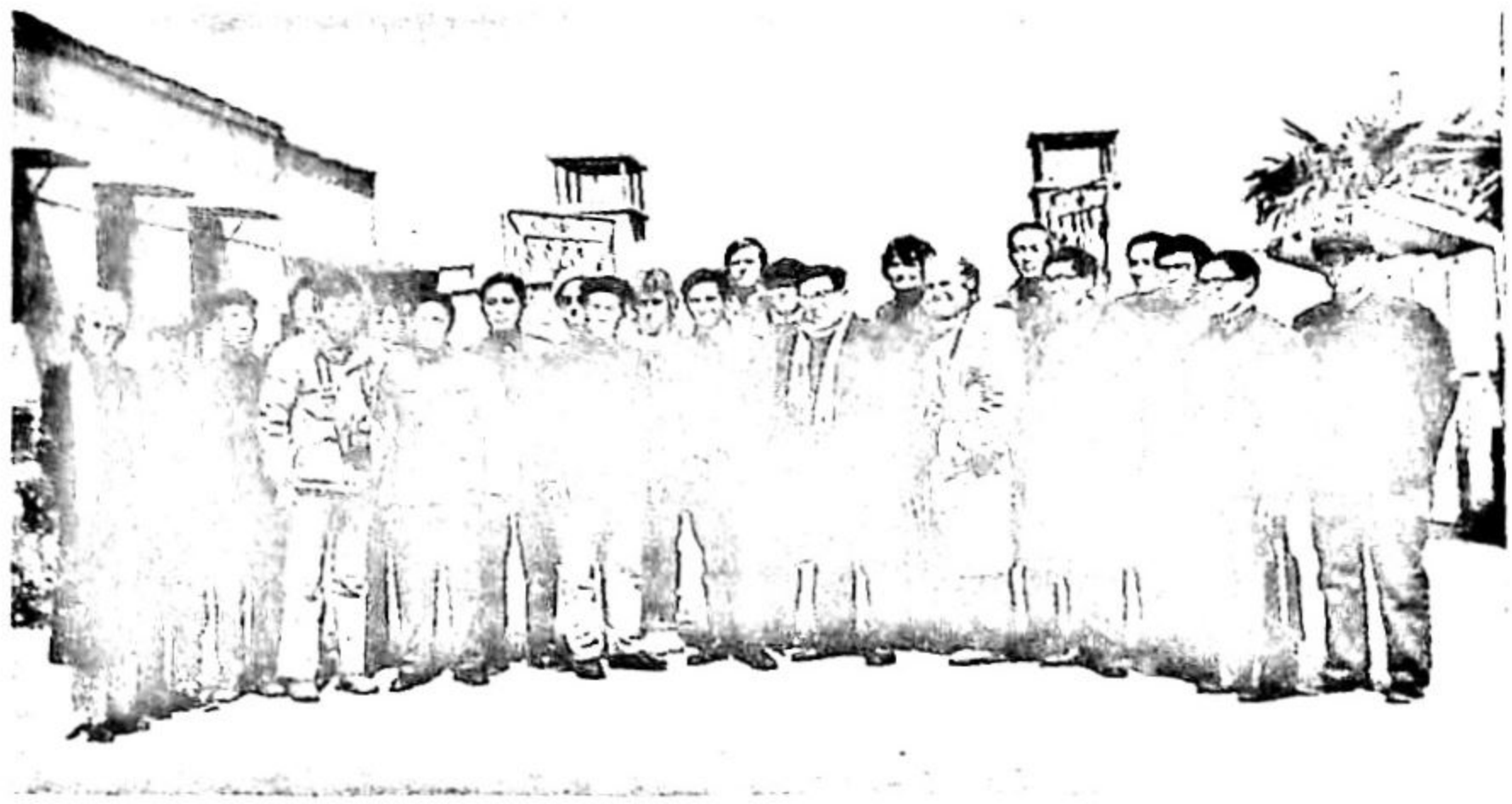
第四节　游子回乡倍感亲

长期接待过费孝通的老县长于孟达回忆：

“回顾费老的一生，可以说他是把爱国与爱家乡结合得最完美的典型。费老在家乡吴江考察时，几次题写‘爱国爱家乡’这句话，以此来勉励大家认真做好工作，加快家乡建设。在费老心目中，‘爱国’与‘爱家乡’是统一的，每一位有志报效祖国的人，不但要有爱国之心，而且要热爱自己的家乡。1994 年 10 月，费老来吴江时，送给我用毛笔写在宣纸上的条幅：

垂虹五彩迎天晴，鲈乡遗风念双亲。
偕君几次访江村，喜见旧貌变更新。

① 费孝通《九访江村》，载《爱我家乡》第 111 页，群言出版社，1996 年 6 月。
② 费孝通《九访江村》，载《爱我家乡》第 117 页，群言出版社，1996 年 6 月。



⊙ 1984年3月，美国社会学、人类学代表团10人，由上海社会学会会长李庆云和沈关宝等人陪同来开弦弓村访问。

“从这一条幅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费老最高兴看到家乡经济的快速发展，城乡面貌的不断变化。如1980年代初，费老看到大运河两旁的堤岸被风浪冲刷得七凹八凸，像狗牙一样，不堪一睹。曾向我们提出，运河是水运大动脉，水运成本低，适宜大宗产品的运输，应该把堤岸修好，充分发挥大运河的作用。我们根据他的意见，花了几年时间，修好了吴江市内大运河两岸几十公里长的块石护坡。并在沿河种植花草树木，形成景色秀丽的绿化带，费老看到后非常高兴。我认为这就是费老心中对家乡‘喜见旧貌变更新’的深厚感情。

“1987年9月，费孝通十三访江村，与应邀前来的日本东京大学教授中根千枝进行学术交流。我为了找一个适宜交流的幽静环境，特意安排在古镇同里的退思园里。席间，中根千枝问费老，中国哪里最好？费老毫不犹豫地回答：‘吴江最好，吴江是我的家乡，爱国先要爱自己的家乡。’热爱家乡之情溢于言表。

“费老平时的生活十分俭朴。八十年代初，费老三访、四访江村时，已是古稀之年。那时县里的接待条件比较差，我们为了照顾好费老的生活，总想把伙食搞得好一点，但是他坚持只要烧一点家乡菜。费老十分爱吃油炸臭豆腐干、霉干菜烧肉、鲜鲫鱼、熏豆茶，因为这些都是他小时候在家乡吃过的菜，他说家乡菜味道就是好，言谈中充满着乡土情。

“费老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架子。对农村基层干部和普通农民都非常热情，受到大家的尊敬。在三访江村后的十几年里，费老走遍了吴江全县23个乡镇，结交了大批各行各业的家乡朋友。有一次，费老在开弦弓村访问，有一位原来相识的农民请他吃饭，因为这位农民的家离开弦弓村比较远，而且要坐船进去，时间安排又很紧，所以我就劝费老不要去了。但是他仍然高兴地坚持要去，费老说：‘农民兄弟请我吃饭，盛情难却，同时这也是我了解农民生活的好机会。’

“1990年代末，费老看到太湖污染日益严重，无锡等上游地区蓝藻频发，太湖‘三白’（白虾、白鱼、银鱼）等资源的产量逐年减少，损害了太湖沿线渔民和农民的利益。他向吴江市和庙港镇提出‘保护太湖、开发太湖’的建议，要充分利用太湖资源和环境，造福吴江和庙港人民。同时，由费老发起，在浙江湖州召开‘环太湖地区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研讨会’，江浙两省和环太湖地区市县有关负责人和学者参加，我受费老邀请，参加了这次会议。费老在会议上提出：‘太湖是周边人民共同的家园，要同心协力，保护好太湖环境和资源，不但要加强对工业污染的治理力度，还要重视生活污水的治理。’费老的论述受到广泛的赞同，既为保护太湖环境出了力，也维护了地处太湖下游的家乡吴江的利益。”

第十三章　工业兴村开弦弓旧貌换新颜

1967年荷花湾大队联合周围7个大队，成功创建联合缫丝厂，三年后仅凭公社书记的一句话，缫丝厂收归公社，开弦弓又成为无工业的农业村。1978年初，时处改革开放前夕，开弦弓仍以小清河为界，分为南村荷花湾大队和北村开弦弓大队。两村干部群众受无锡县乡镇工业迅速兴起的影响，又一次萌发了创办工业的想法，探索工业兴村。

第一节　南村办起丝织厂

1978年，南村荷花湾干部群众商量，我们开弦弓村有两次办工业的经验，上级政府号召发展乡村工业，我们应该向无锡县学习，把村办工业尽早办起来。

但是，村里除了办过缫丝厂外，办其他厂都没有经验。这时，他们想到了队里的插队青年，这些青年是“文革”期间，插队到开弦弓村的盛泽中学学生。盛泽是著名的丝绸重镇，几位插队青年的父母都在盛泽丝织大厂里工作。其中有一位青年叫曹金妹，祖父当丝织厂厂长。他们到盛泽镇向这位厂长征求办厂意见，厂长爽快地讲：“要办厂就办丝织厂，一是丝织品市场大，二是技术和设备可帮助联系和解决。”

大队决定创办红卫丝织厂，第一期工程上6台K611丝织机。K611丝织机为全铁结构，电机传动，安装方便，操作简便。最大的优点是价格不高，既能织低档大宗化纤织品，又能织高档真丝绸品种。在无梭织机引进之前，全县丝织企业普遍采用K611织机。当时，物资供应十分紧张，都要计划分配。村里打着样板村的牌子，向上级主管部门争取得到6台丝织机的计划，凭县计委调拨单到盛泽镇华生纺机厂提货。但是，仍需要用3吨钢材调换。

钢材也是紧张物资，村里想出了穷办法，先开船到苏州市区收购废铁，用废铁换钢材，下半年再用钢材去换织机。每台织机的价格是3000多元，6台织机近2万元。当年集体资金很少，买织机的钱主要是借用各生产队的公积金。缺口部分由村干部与生产队长一起，挨家挨户做工作，向社员借，经过千辛万苦，总算凑满资金把织机买回来。

⊙ 1994年，新落成的开弦弓丝织厂新车间排列整齐的"k611"丝织机。

第一次进原料，厂里又没有钱，再分头向社员借了一千多元。这些钱虽然不算多，现在一家一户都能轻易拿出，但在农村经济十分薄弱的合作化时期，生产队和社员能凑足这笔钱，已是大数目了。开弦弓南村就是靠了这一点点钱，又一次启动了农村工业。

有了丝织机就像战士有了武器，关键的问题解决了。但其他困难还很多，如有了机器要有人会开，还要有人会维修，机器开了如何管理等等。种田人第一次办丝织厂，样样都要从头学。他们先到盛泽通过知青的父母找懂行的人，了解生产环节和管理知识，再与盛泽大厂联系培训事宜。

办织造厂是村里的新生事物，充满希望。为了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大队选派原6队队长倪进兴专门抓工业，由谭汉文担任厂长，具体负责丝织厂工作。年轻人，听到要派人出去培训的消息，热情很高，感到有奔头，都想去。由大队提出条件，各生产队摊派，尽量照顾到户。年龄20岁以下，平时在生产队劳动吃得起苦，还要手脚麻利，脑子聪明。第一批村里派出9人，8人学挡车，1人学维修。第一年有职工30人，第二年增加到70人，第三年增加到时94人。

1979年6台机赚了7万元。1980年再增加6台机，利润超过10万元。1981年又添了4台机，利润超过15万元，台机年利润近1万元。工厂地点就在红卫大队部后面的大会堂里，丝织厂上马后，直接进入发展期，设备年年增加，效益逐年上升。

第二节　北村奋发奔小康

几乎在同一时期，开弦弓北村，也在酝酿办工业。时任北村村书记的谈雪荣，他在2008年9月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回顾了北村白手起家办工业的一段朴实而传奇的经历。他说：

⊙ 2008年9月，村干部谈雪荣、沈春荣、王建民、姚富坤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专题节目里，把开弦弓村誉为“中国乡镇工业发源地”。

“‘文革’后期，我们这些村干部，被组织到江阴华西村参观取经，因为华西村是‘农业学大寨’的典型，那里的村民生活水平提高得很快。当时的指导思想是农业学大寨，要你搞农业，不要你搞工业。我们看了华西村的农业，感到比我们开弦弓村好不了多少，仅从水稻生产的经济收入是难以改善生活的。那么他们建房、修路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总感到华西村隐瞒了什么。

“黄昏后，村子静下来了，我听到有异样的声音，循着声音，找到了一座拉着厚厚窗帘的房屋，四周围有竹篱笆，里面就是不给外人参观的村办工厂。我们终于发现了当年华西村隐藏的秘密：华西村就是靠这些不起眼的村办小工厂的利润致了富，支撑着“农业学大寨”的典型。华西村的富，富在他们有工业，有村办工业。华西村看准了发展工业的方向，他们成功了。十几年后，华西村又成为改革的典型。

“参观回来后，我们北村（立新大队）下决心再办工业。当时怎么办？就是聘用‘星期天工程师’，所谓星期天工程师就是国营厂里的技术工人和技术人员，利用星期天和节假日的休息时间，到乡镇企业兼职。那时农村虽然穷，但是还有些办法，就是搞点福利，吸引能人来村里指导办工业。当时国营厂没有什么福利，农村虽然穷，但是鸡呀，鸭呀，鱼虾都有，来的人每人一个鸭子，几条鱼，已很高兴了，所以‘星期天工程师’很有吸

⊙ 1985 年，吴江县召开村办工业会议时，组织组成参观开弦弓丝织厂。

引力”。

1978 年，村里听到南村红卫大队要办丝织厂，立新大队（开弦弓北村）也提出要办丝织厂。办工厂开头最难，农民除了“三铁耙六棵头”（指种田），既不懂技术，又不领行情，办厂需要的设备和材料，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有钱也买不到，都要找关系。

大队干部首先想到了费达生，她最关心开弦弓村。他们到苏州丝绸工学院找费达生，当她知道村里要办丝织厂，心情比自己的事情还高兴。在费达生的热情帮助下，通过苏州丝绸工学院，在苏州大厂买到了 12 台铁木丝织机，并答应帮助村里培训职工。

大队部腾出几间房子做车间，生产特丽纶和头巾纱。当年产品好销，但原料难买，费达生知道后，又帮助村里解决了半吨人造丝。第二年，了解到本县坛丘农机厂在造丝织机，又添了 6 台 K611 全铁织机，扩大了生产规模。分配上为了稳定农业，强调同工同酬，工人工资不能高出务农人员太多。学徒工每月 18 元，3 个月后，按工种定工资，每月 27 元至 30 元，保全工最高，超过 30 元。开头一段时间，工资先转入生产队记工分，年底由生产队统一分红。工厂规模不大，但又踏上了农村工业化的道路。

第三节　两村合并共发展

1981 年 10 月，费孝通“三访江村”，开弦弓村再次受到新闻媒体的关注。但是，“一访”和“重访”时的开弦弓村，已在 1962 年困难时期，为了划小核算单位，分成荷花湾（红卫）、开弦弓（立新）两个大队，这为社会学跟踪调查和研究带来不便和困难，同时也不利于开弦弓村自身的发展。

当时，被分开的两个大队都已办起了丝织厂，两个大队的规模基本相等，红卫大队有 10 个生产队，299 户，1202 人，耕田 2456 亩。立新大队有 9

个生产队，292 户，1102 人，耕田 2647 亩。两村的重新合并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1982 年 4 月，两个大队重新合并，合并之初，村民中议论比较多的问题是：谁吃亏了，谁便宜了。红卫丝织厂比立新早办一年，有丝织机 16 台，管理上抓得严，又争取到上级部门的支持，进的原材料价格便宜，产品质量高，生产成本轻，发展势头比立新强。立新大队有丝织机 12 台，发展的路子比较狭。合并时红卫积余 17.8 万元，立新亏了几万元。

村干部从大局出发，向群众做好解释工作，合并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再说两村都是集体经济，只要原来账目清楚，合并后新的领导班子建立后，又是一个新的集体，就不再分你我了。两个村合并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把原来南北两村两个丝织厂合并成一个厂，靠积累的十几万元钱和两个老厂原有的设备，创办开弦弓村丝织厂。在村西头，小清河北岸的农地上建新厂房。

为了节约资金，发动村民无偿去运石材、石灰、砖头等建筑材料，请本村村民徐雪其造新厂房，他造过农房，但没有造过厂房，先到盛泽大厂去参观，然后土法上马。技术力量不足，就走出去找关系，请来一名有经验的老师傅吴同宪来开弦弓指导技术，解决生产中的技术问题。村里再派 10 多名年轻人，到苏州有名的国有大企业光明丝织厂学习保全工。同时，村里派出几十名女青年到盛泽新联丝织厂培训，学挡车工。

⊙ 1982 年 4 月，开弦弓南村北村合并，图为开弦弓大队成立大会会场。

新增设备主要是采购旧织机，平均每台 2000 元，而买新设备，市场价 5000 元，2 台新织机可买 5 台旧织机。大多数旧设备经过调试，或换过几个易损件，在使用功能上不比新设备差。等厂房造好时，新购置的丝织机已经到了，出去培训的人员也都陆续回来了。他们一面安装新织机，一面把两家老厂里的织机迁过来。

1982 年第一期工程，建厂房 1100 平方米，安装丝织机 54 台，辅助设

备有捻丝车11台、整经机2台、落丝车2台、纡子车96锭、翻丝车1台。1984年再上第二期工程，丝织机总数达到86台，并增添配套辅助设备。新厂开工后，把主要精力转向产品的销售和开发上，开发出织锦缎和提花织物等系列新产品。

投资7000元，在盛泽东方丝绸市场，建销售门市部。借助丝绸专业市场的功能，打开产品销售渠道，按照市场信息，与用户单位建立直销关系，产品销往盛泽、苏州、上海、南京、连云港等地。如为上海制伞总厂提供大宗涂层尼丝纺和特丽纶等产品，成为厂里的重要客户。只有一二年工夫，工厂成为庙港乡的骨干企业，并使开弦弓村成为全县工业兴村的样板村。

第四节　工业兴村富家乡

1989年春，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王淮冰带领“苏南模式与社会进步”课题组，来开弦弓村调研。在他发表的“江村见闻”[①]中，记录了他看到的开弦弓村：

“这个村的最大特点，是坚持农副工协调发展。1988年农副工三业总产值为837万元。工业488.32万元，占58%；副业259.24万元，占31%；农业89.79万元，占11%……从1981年到1988年，前后八年，三次投入，办了三个工厂：开弦弓丝织厂、江村联营丝织厂、食品饮料厂。去年还化30万元办起了一个85千瓦用柴油发电的小电厂，解决生产、生活缺电的困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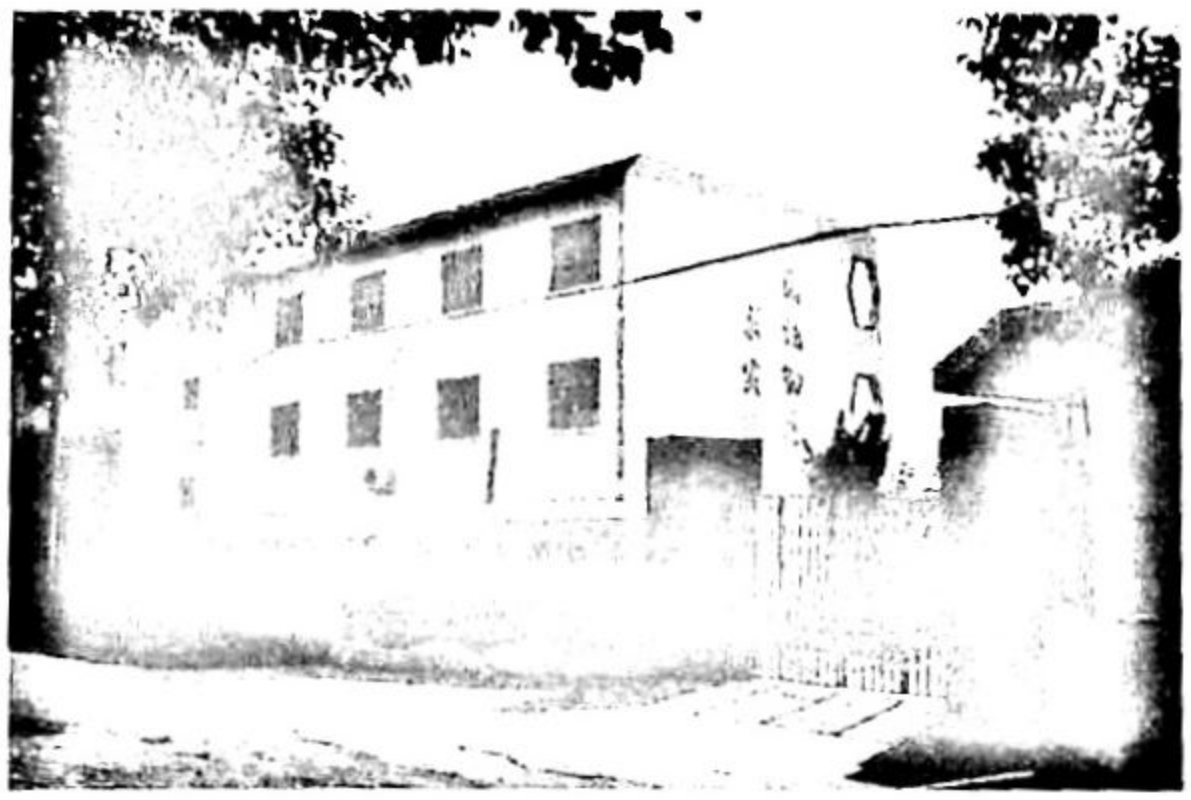
“看来他们在办工业时，比较注意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1988年，标志经济效益的村办工业净收入为137.18万元，具体分配如下：国家税收：30.03万元；工人工资：54.47万元；利润：52.68万元；乡村工业在苏南已是‘三十而立’，利国利民，挑着国家税收和集体事业支出的重担，艰苦奋斗，确实站稳了脚跟，经得起风吹浪打。”

兴办工业从多个方面改变了开弦弓村的面貌：

---

① 王淮冰：《江村报告》第49、50、51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11月。

1. 村办工业解决了农业劳动力的出路。丝织厂上第一期时，村里坚持1户1工，上二期时，增加到1户2工。八十年代末，全村转移劳动力420多人，平均每户有2人进厂，年轻人都进了厂，包括为工厂服务的人员，剩下种田的都是50岁以上的半劳力。



⊙ 1990年8月竣工的开弦弓小学教学楼

2. 以工促工，推动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办厂之初，开弦弓村为了凑足上6台织机的2万元钱，动用生产队的公积金，不足部分还得一家一户地与社员借，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6台织机买回来。有了工业后，开弦弓村把工业上赚到的钱，继续投资办工业，每年新上一二十台织机很轻松，像滚雪球一样，工厂越滚越大。

3. 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工业成为村里的主导产业后，农民的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工业，拓宽了农民奔小康前景。

4. 以工补农，稳定农副业生产。并村之前红卫大队为了鼓励村民养羊，厂里拿点钱出来，养一只羊补贴十几元钱，调动了养羊农户的积极性，不少农户都到震泽去买羊。红卫9队一位社员，养了7只羊，补到86元，高兴得不得了。开弦弓是全县农业现代化的试点村，当时添置了联合收割机1台、中型拖拉机1台、还有插秧机等一批农机，都是从工业利润中支出的。

5. 村里每年从企业上交的利润中拿出一点钱，照顾全村孤寡老人和补助退休村干部。如1995年全村共补贴10户，2590元。

6. 集体事业有力量办了。大队合并前，红卫大队从丝织厂工业利润中拿出两万元，造了五楼五底的大队办公楼，当年全县各地的大队部都是平房，来村里参观的人，一看大队办公楼，就服帖了。两个大队合并后，用工业上的钱建了农贸市场，改善了村里的环境。

7. 扩建开弦弓小学。从1989年下半年开始基建，到1990年8月竣工，建三层教育楼一座，平房9间，总建筑面积1253.9平方米，整修了操场、跑道，增加了绿化和配套设施。总造价48万元，其中开弦弓村投资16万元，都是村里各企业上交的利润。

第十四章　苏南模式露弊端工业盛转衰

时代变迁，常常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开弦弓村的村办集体工业从1978年创办红卫丝织厂开始起步，走过了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期十多个年头的发展历程，由小变大，由弱转强，由少变多，可谓勇往直前，兴旺发达。然而，到了1990年代中期，却又反过身来，由强转弱，迅速衰败，直至资不抵债，一蹶不振。1972年被公社平调去的缫丝厂，也因种种原因而倒闭。从此开弦弓村彻底结束了“苏南模式”的集体工业阶段。值得后人思考的问题是：这是偶然的现象，还是必然的结果呢？

第一节　资不抵债顺境过

开弦弓村的集体工业从1970年代末开始形成，至1980年代的兴盛阶段里，就像航行在太湖里的帆船，风顺势顺，破浪前进。工厂三班制，机声不间断，产品来不及做，应付款少，预付款多，一年利润几十万，高的年份超过一百万。进入1990年代中期，全村工业由兴旺转入衰退，产品难销，利润

⊙ 1990年代中期，秋季里宁静的开弦弓村。虽然村里的集体工业亏损了，但是村民寻找新的就业门路多了，实际生活水平仍在提高。

减薄，仓库里产品积压，账面上利润变成应收款，三班制开不出，改两班制，两班制开不出改长日班。企业开始欠债，越欠越多，直至资不抵债。

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虽说'面临的问题最多，最困难的时期'这样的话只是和过去一帆风顺的这些年比较而说的，但是问题毕竟出来了，摆在乡亲们的面前了。对我这个特别关心乡镇企业的人来说，也是一声响亮的警钟。"[①]

1997年，村里的骨干企业开弦弓丝织厂，主要设备有丝织机149台，捻丝机59台，大卷装16台，整经车4台，发电机2组等，年生产化纤布的能力已达到55万米。全厂固定资产为317.4万元，而负债额高达396.8万元，已陷入资不抵债的境地。主要负债来源，银行贷款256.8万元，其它借款14.6万元，其他应付款125.4万元。终于走完了由起步、发展、辉煌、衰退近20年不平常的历程，黯然停产。

其他村办企业也是奄奄一息，负债累累。如：江村酿造厂，固定资产23.23万元，负债126.19万元，年生产38°醉蟹酒240吨。开弦弓化学品厂主凝剂车间，固定资产9.64万元，负债90.8万元，年生产主凝剂20吨。开弦弓化学品厂银杏车间，固定资产128.7万元，负债19.8万元，年生产黄酮甙2吨。化学品厂产品无销路，原来主要来自丝织厂的上百万利润的投入，随着企业倒闭，固定资产成为一堆废铁，它的货币价值随之消失。

1997年经审计确认，村级经济共负债960万元，其中最大的一笔是开弦弓丝织厂欠农信社的400万元抵押贷款，抵押物是工厂的厂房。开弦弓村已完全失去了偿还债务的能力，即使市场行情好也无法恢复生产。因为只要有销售，在银行的账户上出现余额，就被银行扣去。实际上这些厂房和设备都已陈旧，已不值所抵款项，银行为了尽量减少坏账，把村里的集体资产都作为抵押物，收归了银行。从此，开弦弓村集体工业一蹶不振，画上了一个彻底结束的句号。

最令人吃惊的是，抵押物中包括村部的办公楼，楼下当中两间就是费孝通先生访问江村的图片陈列室。这样的破败状态，令很多前来调研的学者感慨不已，称开弦弓村已穷得到了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

---

① 费孝通《吴江的昨天、今天、明天》，载《爱我家乡》第207页，群言出版社，1996年6月。）

真是，时迁物移，兴亦速、衰亦快，此一时、彼一时。谁能想到曾是农、副、工各业都走在全市前列的样板村和村办集体工业轰轰烈烈的先进村的开弦弓村，会在很短的时间里，衰败到了这样的境地，最后竟列入吴江市扶贫村的行列。

第二节　集体工业问题多

我们在访谈中，提起村里集体工业为什么会衰退，而且衰退得这样快、这样彻底时，村书记王建民、老书记沈春荣、谈雪荣、谭汉文、周明芝，以及村干部姚富坤等，都先后作了比较翔实的分析。大家对此都感到非常惋惜，认为，情况是明摆着的，客观原因不可否定，主观因素无法推卸。关纳起来有如下几点：

首先，失去市场优势。进入九十年代，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工业产品滞销，企业利润降低，乡村集体企业原有的市场优势，逐年消失。企业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偏离实际的生产指标，开始盲目生产，造成产品积压和应收款增加的现象。如 1995 年，开弦弓村丝织厂的应收款上升到 99.2 万元。据资料统计，共有应收款 87 笔，欠款地区有南京、上海、天津、无锡、苏州、宜兴、昆山、吴县及本县乡镇。其中超过 1 万元的有 23 笔，超过 10 万元的有 3 笔。

其次，体制性弊端显露。村办工业名为村里集体所有，经营好坏却关系到县、乡镇、村各级干部的政绩。每年下达生产指标，都要层层加码，只能增不能减，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企业发展规划或项目开发，都由上级做主，不是看市场，而是看上头。厂里听村里的，村里听乡里的，乡里还要听县里的。各级干部分别为了向上级显示自己的政绩，层层向企业压指标、压任务，不怕产品积压，不怕贷款增加。

第三、企业管理华而不实。企业里规章制度一套又一套，大多数是从大厂抄来的，不从本企业实际出发，不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而是贴在墙上，专门给参观的人看的。而且厂不大，机构齐全，管理人员成堆。有人无事做，有事无人做。在利益分配上吃大锅饭，做好做坏一个样，管理上出的问题，

厂长很难处理。村里为了把水端平，招工时强调一户一工，家家户户都能增加收入。并把招工当做照顾困难户的手段，而不是发展生产的需要，招进的工人不是文化偏低，就是年龄偏高。表面看，工厂是大家的，关心支持的人多，实际是大家负责，又大家不负责。市场行情好，企业发展，大家有功劳，皆大欢喜。市场行情低落，企业亏损，大家都没有责任。

其三、企业负担重。村干部工资和村里的日常开销，都由村办企业承担，而且还有多项上交项目。我们在村档案室找到1996年开弦弓丝织厂的承包合同，当年承包利润为50万元：

承包的效益指标有：固定资产折旧491400元（折旧率12.6%）；基本工资、奖金835200元（职工290人，人均基本工资2400元、基本奖金480）；福利97440元（为基本工资的14%）；建农金34800元（每人1200元）；教育附加费42000元（按销售额的6‰收取）；管理费7000元（按销售额的1‰收取）。以上6项总计：1507840元。上缴利润按实际净利润的25%计算，还在6项之外。也就是说，开弦弓丝织厂，要在税后形成效益（毛利）1507840元，人均创利5200元，才能不亏损。这些指标比3年前1993年的948380元，又增加了559460元。

其四，盲目发展，管理混乱。进入九十年代，市场已开始疲软，企业资金短缺，时任村领导心血来潮、不顾后果，决意要上化学品厂新项目。在未经深入的可行性调研和科学试验的基础上，盲目投入上百万元，不但把丝织厂积累的利润全部用完，而且还向银行贷款。生产的中间体黄酮甙，属制药行业，却登记为化工企业，并

⊙1997年，费孝通（左3）与开弦弓村村干部在一起。面对集体工业出现的问题，他说："对我这个特别关心乡镇企业的人来说，也是一声响亮的警钟……要想办法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加以解决。发展中的困难，还要靠新的发展来克服。"

在未取得生产许可证和销售许可证的状况下盲目投产。因为药剂行业生产要求高，制药厂不愿买、也不敢买村办小化工厂生产的制药中间体，使产品生产出来就没有销路。化学品厂的主要原料银杏叶，从山东等地采购，路线远，运输成本高。原料质量又不严格把关，进料枯黄，提炼不出黄酮甙，最后只能当柴烧。

其五，人心涣散。吴江邻近浙江，浙江搞的是在家庭工业和手工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温州模式”，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九十年代中期，在浙江的影响下，在开弦弓村周边的乡村里个体私营工业已在悄悄发展。在高工资的诱惑下，村办集体厂里有技术的年轻职工和管理人员，跳槽到个体企业的人员不断增多。使集体企业人才流失，人心涣散。

第三节　丝厂投机厂倒闭

讲到开弦弓村集体工业的衰败时，还应交代一下庙港镇缫丝厂的结局。因为这个厂的前身是开弦弓村缫丝厂，它是1967年由开弦弓村（当年的红卫、立新大队）与邻近大队合股联合创办的股份制村办企业。相对于1929年开弦弓村创办的老丝厂，村民乐意称之为新丝厂。新丝厂既属于村办集体企业、又具有股份制性质，是在“文革”期间特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条件下，开弦弓村人民在农村工业化道路上的一项伟大创举。

1972年，当新丝厂形成生产能力和一定的规模后，被庙港公社无偿收去，一夜之间变成了公社办厂。原投资办厂的各个大队与缫丝厂已无直接的关系，但是缫丝厂仍然建在开弦弓村的土地上，各地来开弦弓村调研的学者和来宾，都要参观这家缫丝厂。他们看到车间里一排排整齐的立缫机和先进的自动缫丝机时，就会联想起在费达生的支持和指导下，开弦弓村两次创办缫丝厂的史实。在他们的心目中，缫丝厂仍然属于开弦弓村的。而且，工厂里有100多名工人来自开弦弓村（主要是女工），工资是这些家庭的重要经济来源，在村民的感情上，也仍然把工厂看作是村里的，希望缫丝厂一直兴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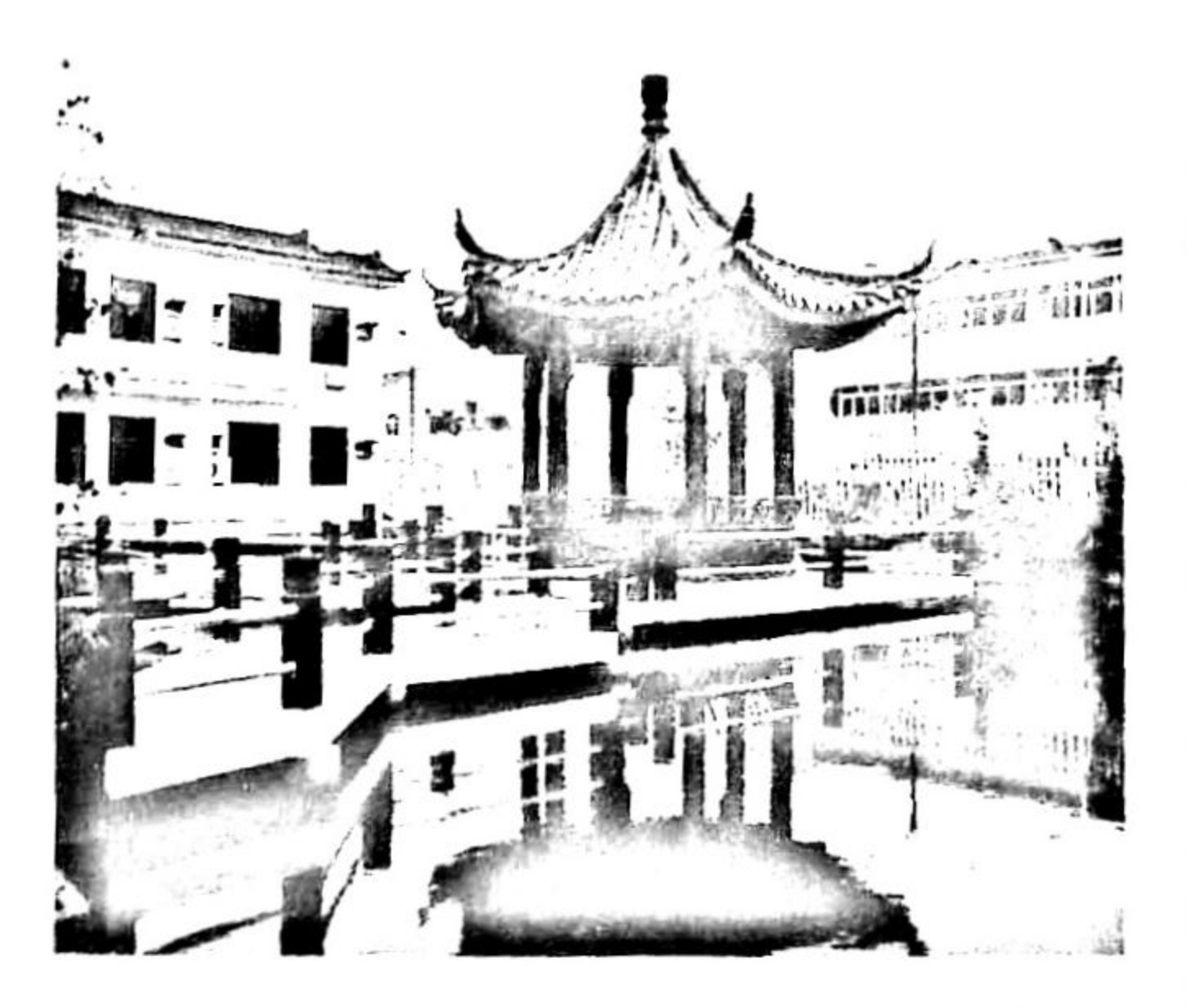
在收归公社的二十多年时间里，缫丝厂确实有过兴旺和风光的昨天，

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缫丝行业进入重要的发展时期。1982年，由庙港公社委派的书记陈圣江兼任厂长，工厂每年把取得的利润用于技术改造，继续投入生产，扩大生产规模，使缫丝厂进入高速发展期。如1987年，缫丝厂全厂固定资产超过100万元，职工人数508人，立缫车120台，年产白厂丝78吨，工业产值338万元，利润57万元。

九十年代初，缫丝厂已全部淘汰了办厂初期的土设备，增添了当年先进的自动缫丝机，建造了宽敞的新厂房和办公大楼，成为全市知名的乡镇骨干企业。厂丝成品率达到98.5%，品级继续提高，逐渐接近4A级，被省丝绸公司评为优质产品。在缫折单项评比中，居全省100多家丝厂之首。

1993年，以缫丝厂为核心，组建金蜂集团，陈圣江任总经理。至九十年代中期，虽然由于市场上茧丝绸行情疲软，企业效益下降。但缫丝厂仍不失为庙港乡最体面的龙头企业和接待参观者的第一选址。但是，在1998年企业改制时，累计总投资457.8万元的庙港缫丝厂，却以“零资产”转让，成为企业新主人金永观的私营企业。

金永观原是本乡某村书记，1997年接替陈圣江任缫丝厂总经理。所谓“零资产”转让，从理论上讲，就是虽然工厂的规模很大，但负债也同样庞大，两者相抵，企业净资产已为零。也就是说，金永观不必投入一分一厘，就由乡镇办企业负责人变为私人企业的老板，缫丝厂也由乡镇企业变为私营个体企业。



⊙2004年，时过境迁，缫丝厂倒闭后，唯有原厂内的曲桥小亭还能证明工厂当年的辉煌。

如果缫丝厂转制后，能继续稳定生产，提高效益，那么理应能继续惠及地方、惠及村民。但是金永观感到，各地缫丝能力迅速发展，生产成本不断提高，利润逐年降低，做缫丝赚钱太难了。他的目光开始离开缫丝业，瞄准

了设在嘉兴的中国茧丝绸交易市场，做期货交易。2003年，蚕茧、厂丝行情上扬，来自浙江湖州蚕茧市场的信息显示，当年每担秋茧的价格将突破1000元，比春茧每担560元翻了近一番。每吨茧丝从春茧上市后最低的9万元，上涨到17万元以上。在短短几个月间，涨幅近100%，可谓暴涨。有专家认为，价格大幅度涨跌都属不正常现象，丝绸企业一定要冷静，提高依靠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合利安排生产，避免行业发展的大起大落。

这一年，并不精于期货交易的金永观，竟在期货市场上，旗开得胜，赚了近两千万元，一夜实现暴富。在如此难得的大行情下，做多头的金永观账面利润极为可观。但是他未能听从专家的提醒，见好就收，及时平仓主动退出期货市场，而是充满赌徒心理，赚了还想赚。就在行情即将逆转的前几天，他还向吴江丝绸有限公司下属的盛泽东方丝绸市场融资1000万元，继续投入嘉兴中国茧丝绸交易市场的期货交易。没有几天，价格开始大幅下跌，金永观的账面利润迅速消失。

但是金永观仍不甘心，一心期待着行情恢复上涨，在期货市场硬挺到2004年6月，交进市场的保证金全部赔光，负债累累，认赔出局。金永观输惨了，从账面盈利2000万的纸上辉煌到真金白银地损失2500万，缫丝厂元气大伤，勉强维持到年底，工人们放假过年，过完年工厂不再开工，缫丝厂从此倒闭。

第四节　苏南模式走下坡

吴江市老市长张钰良，在回顾这段历史时，道出了苏南模式由兴至衰的奥秘，他说：

“市场经济是一台功率巨大的推动机，是为人类造福的动力源。苏南乡村工业的崛起，‘苏南模式’的形成，是苏南乡村干部确立市场观念的开始。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人都想赚钱。农民自己办工业，不依赖国家计划，在当时想占也占不到国家计划的光。靠什么？就是靠市场。一是有市场。中国社会经过‘文革’动荡，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商品奇缺，市场上急需乡村企业生产的产品。二是有市场机制。乡村企业得改革开放的春风，

⊙ 集体经济的兴衰只是开弦弓村社会变迁中的一个历史阶段，来访学者有增无减。图为南京工业大学的师生们在开弦弓村参观。

遍地开花。市场缺什么，生产什么；市场时兴什么款式，就生产什么款式，当时称‘船小好调头’，乡村工业的机制十分灵活。

“为什么要搞以集体经济为主的‘苏南模式’？因为苏南地区从1950年代合作化开始，一直坚持集体经济，对个体经济管得很严，甚至对社员在自留地上种什么都有限制。农村青年想学个‘五匠’（农村手工业的统称，一般指：木匠、泥水匠、篾匠、白铁匠、裁缝），都要经过生产队、大队、公社逐级批准。长期以来，在苏南只有集体经济，没有个体经济。苏南乡村工业刚出世时，只能走集体经济的路子，干部群众也只能同心协力把集体工业搞上去，只有这样个人才能多得一点，这是苏南乡村工业发展的原始动力和积极性。所以‘苏南模式’是时代的产物，是适时而兴。

“在改革开放初期，社会舆论上，还经常出现反对发展乡村工业的言论，其中最有力的一句话是乡村企业‘挖社会主义墙脚’。在坚持计划经济的人士眼光里，农民自发办工业就是搞资本主义，不把乡村工业也看作社会主义的一部分。的确，乡村企业是挖了国营工业的墙脚，‘星期天工程师’是挖人才，办联营厂是吃大厂，这是事实。不挖，乡村企业发展不起来，但

绝不是挖‘社会主义的墙脚’，而是挖‘计划经济的墙脚’。

“‘文革’后期的国营工厂，还处于半瘫痪状态，产品几十年不变，款式永远是老面孔。他们不看市场看计划，不从市场寻出路，只向上头争计划、争拨款。这样的墙脚不牢固，这个乡不来挖，自会有那个村来挖。从市场竞争的角度看，这是在利益的驱动下，产生的生产力要素的合理流动。原以为‘皇帝女儿不愁嫁’的国营工业，结果在市场竞争上，败给了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土里土气的乡村工业企业。

“但是，一物降一物，强人后面有强人，乡村企业的活力比国营大厂大，而个体私营企业的活力又比乡村企业大。轰轰烈烈一时的‘苏南模式’，结果又败在更不起眼的家庭工业手里。有位学者经过深入调查后，说过两个例子：第一，同样一吨钢材，卖给集体厂是好钢，再从集体厂卖给私人厂，就变成了‘废钢’，价格相差几倍。第二，两个厂长，一个一心一意为集体，大家都说他好；另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企业勉强维持。转制时，好的厂 1200 万固定资产，厂长两滴眼泪；差的厂‘零’资产转制，一夜成为财大气粗的私人老板。不说其中的理弯曲直，事实是个体私营工业一发展，集体乡村企业就站不住脚了，墙脚一挖就松动。根本原因是，个体私营工业的生产三要素（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更加紧密，管理三要素（责任、权力、利益）更加统一。概括地说，就是一句话：顺应经济规律就兴，违背经济规律就衰。”

第十五章　勇往直前再探索家庭办工业

九十年代中期，开弦弓村村办集体工业彻底破产，落入“扶贫村”的行列。但是开弦弓村并没有停止农村工业化的探索，全体村民在完全失去对集体经济的依赖和希望后，被迫走向市场，重新振作精神，挺起胸膛，到市场里去找生计，坚定地迈出了发展个体家庭工业的步伐。有的拉横机、有的搞丝织、也有的外出做生意，可谓历经沧桑，自强不息。在短短几年里，全村形成了以家庭羊毛衫编织、化纤织造为主体的家庭工业和股份制企业的工业群体。2010 年，全村经济总收入 24800.6 万元，其中工业收入 21701 万元和服务业收入 1546.8 万元，占总收入的 93.87% 万元。村民们摆脱了村办集体经济的束缚，真正成为经济发展的主人，一只只创家立业、发家致富的小故事组成了这一阶段社区变迁的主旋律。

第一节　苏南模式成历史

在改革开放之初至整个八十年代，苏南乡镇工业进入兴旺发达的黄金时期。这种以集体经济为主的发展乡镇工业路子，被费孝通称为“苏南模式”。他说:“‘苏南模式’这个词是我在 1983 年所写的《小城镇　再探索》中提出的。感觉到苏南这个地区在农村经济发展上自成一格，可以作为一个模式。”“我所说的‘模式’是指在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特色的经济发展过程。”[①]

“文革”结束后，淳朴勤劳的苏南农民顺应了人心思安、百废待兴，

---

① 费孝通《四年思路的回顾》载《费孝通文集》第 481 页，群言出版社，1999 年 10 月。

而又社会问题成堆的特殊社会环境，从拾遗补缺、小打小闹开始，发扬“四千四万”精神，以“亦工亦农”、“离土不离乡”的形式，冲破城乡分割和计划经济的重重阻碍，兴办乡镇工业。

想当年，农村剩余劳动力要找出路，用地宽余，城市工业受“文革”影响还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技术、设备闲置，市场上商品奇缺、供不应求。苏南各级政府抓住这一历史性机遇，发挥出强有力的行政组织力量，加强城乡横向经济联合，乡镇工业由土到洋，迅猛发展，打造出工业领域里的半壁江山，成为富农、强农的经济支柱。闯出了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的农村工业化、城市化新途径。

那时候创办乡村工业企业，要人有人，要技术有技术，要市场有市场。常常是上一个产品成一个产品，办一个项目成一个企业，真是风起云涌，势不可当。苏南乡镇工业的兴起，就地转移了劳动力，推进了小城镇建设，发展了社会生产力。群众富了，集体强了，对国家的贡献大了，可谓名成利就，功不可没。

但是，面对乡镇工业的迅猛兴起，在苏南各级干部中倾向性认为：坚持“苏南模式”，就是坚持社会主义，这是率领群众走共同富裕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并欲与邻近的浙江省以家庭个体工业为主的“温州模式”一争高低。潜台词是：“你走你的独木桥，我走我的阳关道，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在上述带有政治偏见的思想指导下，苏南各级政府在发展集体经济的同时，不断挤压和限制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

这种做法与“文革”时期，禁止和破坏社员发展副业生产的“割资本主义尾巴”非常相似。说明当时坚持的“苏南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还受到“文革”时期“极左”思潮的影响。实事求是地分析，“苏南模式”是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里，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一种过渡形式，是合作化以来形成的农村集体经济的延续，是在各级政府仍然牢牢掌握农村经济支配权的前提下，实现农村工业化的权宜之计，决定了“苏南模式”在历史变迁中的短暂性。

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市场经济机制逐步确立，以集体经济为主的苏南乡镇工业的优势逐渐消失。而自身政企不分、责权利不清，分配不公、管理混乱、后劲不足等弊端，却在一项一项地暴露出来。曾经兴旺发达的苏南乡镇集体工业，不知不觉地陷入了产品滞销、效益降低、设备陈旧、人心涣散、举步维艰的衰败局面，悄悄地退出历史舞台。

第二节　再兴工业靠民资

开弦弓村家庭私营工业的兴起，既是村民自发的创造性劳动，又是在国家日益完善的市场经济大环境中，得到吴江市委“启动民资”的政策性鼓励和支持下发展起来的。

九十年代中期，苏南模式的集体乡镇工业如日薄西山，黯然失色。部分农民不顾政策上的束缚，已在暗地里自发地创办家庭工业。如邻近开弦弓村的横扇镇搞家庭羊毛衫编织，盛泽、坛丘、南麻等镇合伙排丝织机等等。不少集体企业的干部看到浙江个体老板发财了，“身在曹营心在汉”，也在心动，也想单独干。

如果政策上再一成不变地坚持集体经济，不但无法挽回农村经济衰退的局面，而且政府必然与农民处于对立的位置上，打击农民奔小康的积极性。所以国营、集体企业的转制和鼓励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已是形势所迫、大势所趋，这是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适应，其结果不仅仅是量变，而且是社会生产力质的提高。

1999年，吴江市委从实际出发，提出以“三资（制）”（引进外资、启动民资、搞好改制）工作为重点的工作思路。大胆实践和探索经济发展的新路子，一是紧紧抓住台资投资大陆的历史性机遇，改善投资环境，加大招商力度，大批台资电子企业落户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二是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方向，攻坚克难，民进公退，全面完成对原公有制企业和乡镇集体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三是因势利导，营造政策放开、干部放手、业主放

⊙ 2010年，开弦弓村私营企业田园纺织厂的喷水织机。

心的发展氛围，鼓励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

在长期坚持农村集体经济的苏南，吴江市委、市政府出台了鼓励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政策，率先打开了限制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政策大门，使农民的聪明才智得到充分发挥，投资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开始时，很多人还难以摆脱“苏南模式”的思想束缚，认为又要走回头路了，指责之声不绝于耳。

显然，当年在苏南地区敢于率先提出“民进公退”，当仁不让地支持农民发展家庭工业，是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的。令我们不能忘怀的是，2000年春，费孝通二十四访江村，在家乡听取市委书记汝留根关于开展“三资（制）”工作情况的汇报，知道农民收入增加了，十分高兴和赞赏。当场挥毫写下了十六字条幅：“审时度势、倡行三资（制）。功不自居、泽及桑梓。”在关键时刻，费孝通又一次站在农民利益的立场上，支持农民致富，支持农村工业化的进程。

第三节　依托“东方”搞织造

丝绸织造业既是开弦弓村集体工业的主体，也是个体私营经济的重要行业，而且都是借助了盛泽镇织造优势的外部条件发展起来的。所以，在详细记述开弦弓村村民发展个体私营丝织业之前，有必要先概要介绍盛泽丝绸业和东方丝绸市场的情况。

⊙2007年，繁华的丝绸重盛泽镇街景。

盛泽镇位于吴江市域东南隅，与浙江嘉兴毗邻，是著名的丝绸产销重镇，历史上与苏州、杭州、湖州共称“四大绸都”，“日出万绸，衣被天下”是其生动的写照。开革开放后，盛泽镇出

现国营、大集体厂与乡镇集体丝织企业并驾齐驱的局面，丝绸业得到快速发展。从1984年开始，盛泽各大厂纷纷利用出口创汇的有利条件，先后从日本、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工业发达国家，引进喷水、剑杆、片梭等无梭织机及染整设备，生产面貌焕然一新。

为了借助市场机制，促进盛泽镇及周边地区丝织品的生产和销售，1986年10月，吴江县政府组织建设占地8000平方米、有146个门市部（店面）组成的东方丝绸市场。开业不到一个月，来场客商日益增多，丝绸销售量越来越大，出现了“店多成市”的奇迹。当初抱怀疑态度的企业，也纷纷要求进场，以后几年市场连续扩建，商铺供不应求，市场魔力逾显强劲。

从90年代中期起，在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的推动下，东方丝绸市场加速发展，市场面积扩大到4平方公里，来自全国各地的6000余家丝绸商行云集市场，经营数千个品种的纺织品，年交易额超过821亿元，连续七年市场交易额居全国同类专业市场首位。盛泽镇已成为我国丝绸纺织品的主要生产基地、出口基地和产品集散地。[1]

东方丝绸市场第1期工程建设之初，庙港乡工业薄弱，开弦弓村丝织厂是乡里的骨干企业，县里分配给庙港乡的进场任务，由乡工业公司硬性压给开弦弓村。村里出资7000元，在东方丝绸市场内建设一间门市部。门市部建好后，却由庙港乡工业公司经营，成为乡里的资产。但是开弦弓丝织厂生产的丝织产品（俗称面料），主要通过盛泽东方丝绸市场的门市部，销售到全国各地，有力地推动开弦弓村丝织业的发展。

开弦弓村办集体企业彻底亏损后，村民继续借助与盛泽之间建立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仍然把丝织业作为发展工业的重要方向。到2010年底，全村有个体私营丝织企业9家，其中3家办在村外，老式铁木结构的K611织机已淘汰，代之而起的是技术含量高的喷水织机。其中最为成功的是周永林、徐柏明、周全锋和饶贵龙等村民，他们不但熟悉盛泽，而且成功地依托盛泽发展了自己的事业。

---

① 《2011年吴江统计年鉴》第4页。

第四节　仿效横扇兴编织

⊙1999年，开弦弓周姓村民的家庭羊毛衫编织厂。

羊毛衫编织业是开弦弓村涉及面最广的家庭工业项目，其传统基础是村民“家庭养羊—手工纺纱—竹针编结”的副业。横机面世后，机械编织的羊毛衫以商品的身份走进市场，成为开弦弓村村民投资少、见效快的投资项目，其起因主要是受北部邻镇横扇镇羊毛衫业的影响。

开弦弓村东北部与横扇镇相邻，有公路相通。横扇原来只是太湖边上一个偏僻的传统乡集镇，因家庭羊毛衫编织业的兴起，而闻名遐迩。全镇拥有各类横机（针织机中的一个大类）5万台，年产羊毛衫超亿件，素称是全国最大的羊毛衫生产基地，2004年1月，横扇镇被中国纺织工业协会、中国毛纺织行业协会授予“中国羊毛衫名镇”的称号。

七十年代末，横扇乡建新大队（今石塘村）开办了一家规模不大的五金厂，为上海一家羊毛衫厂生产“漏针器”配件，但利润很薄，厂里一位精于针织的师傅，建议转产羊毛衫。五金厂从上海购进3台横机，请上海师傅来村指导，生产羊毛衫。没有料到，这3台横机第一个月就为厂里带来了8000余元的“巨额利润”。第二年五金厂更名为建新针织厂，横机增加到8台，产品销售一路看好。到1983年，全厂产值突破200万元。

这次看似平常的邂逅，为横扇人开启了致富之门。当时只允许办集体企业，第二年叶家港村及镇办五金厂先后办起了羊毛衫厂。由于投资少、见效快，不少村又陆续办起了多家集体性质的羊毛衫厂。到1988年，全镇有镇办羊毛衫厂4家，村办羊毛衫厂14家，从业人员540名，这一年横扇

人靠羊毛衫编织赚了106万元，从此羊毛衫这个产业在横扇扎下了根。

1983年底，横扇镇沧州村农民周根火向当地工商所打报告，申请创办私营羊毛衫厂。工商部门经过4个月的考虑，批出开业执照。在长期坚持以集体工业为主的“苏南模式”的江南，当年横扇镇工商所敢于批出私人办厂的执照，是冒着很大政治风险的，所以这一行动的本身就是一个突破性的创举。

周根火从4台横机起家，在半年时间里获利六万元。越来越多的集体编织厂职工跳出集体厂，买一二台横机回家自织，赚了钱再增加机台，滚动发展。亲戚朋友、左邻右舍，纷纷效仿，全镇出现了私营羊毛衫厂年增数百家的高潮。

一批销售本镇羊毛衫的专业户，在全国各地开设专销店500多家，把全镇分散在千家万户的家庭羊毛衫生产与社会大市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吸纳来自苏北、安徽、云南、贵州、四川、河南和东北三省的外地民工2万多人，为横扇家庭织造业提供了强大的动力。至1997年底，全镇家庭横机增加到18000多台，年产羊毛衫近5000万件。是年高峰的一天，镇托运站发出本镇生产的羊毛衫2700包，每包200件左右，总量超过50万件羊毛衫，因此有“时出万件”的美誉。[1]

开弦弓村的家庭羊毛衫编织业，先由横扇镇传入西草田，然后再由西草田传入开弦弓全村，并得到较快的发展。西草田原是一个独立的行政村，2001年与开弦弓村合并，成为开弦弓村第20至第25村民小组。这六个村民小组位于全村东北角，与横扇镇打弓湾村和徐河湾村相邻。1994年上半年，受横

⊙ 2007年，羊毛衫专业镇横扇镇街景。

[1] 吴云云《博弈的启示——对横扇镇家庭编织业发展情况的调查》载《情系城乡》第106页，2002年10月。

扇镇影响，西草田村民徐文泉、徐明泉买入6台手拉旧横机，合作生产羊毛衫，这是开弦弓村最早的家庭羊毛衫编织工厂。

同年下半年，村民徐正荣见横机利润高，也筹资排了6台手拉横机。其后，村民纷纷效仿。九十年代初，丝织行情好，村里有一批青年在盛泽等地丝织厂做挡车工和保全工。但到了1994年、1995年，丝织行情下滑，而羊毛衫编织行情看好，不少职工回家搞编织。这样做不需要两地奔走，生活稳定，好照顾家庭，而且收入比厂里高得多，所以从事羊毛衫编织的家庭不断增多。

至1995年底，从事羊毛衫编织的农户增加到30多户。1997年达到高峰，每片场（指并排而建、朝向一致、场地相连、通道共用的3-5户人家组成的建筑群落）上都能听到拉横机的声音，搞家庭羊毛衫的编织户，最多时有70多户，还不包括为编织户搞配套服务的农户。

至2000年，全村从事羊毛衫编织的农户126户，拥有手拉横机1379台，编织工人1418人，其中西草田73户，手拉横机857台，编织工人896人，开弦弓53户，手拉横机522台，编织工522人。2010年，全村电脑编织47户，其中大电脑编织机138台，小电脑编织机136台，电脑绣花机8台，亮片机5台，后两种分布在村民小组4、22和25组。

第十六章　阻力重重周玉官狭缝求生存

开弦弓村最早的个体私营企业，是1983年周玉官创办的庙港电子元件厂，即今天的吴江永泰电子有限公司。他的工厂虽然不算大，但是起步早，几乎与“苏南模式”的乡村集体工业同步。在限制家庭私营工业发展的十几年里，他的工厂经常受到政策性的限制，甚至打击。从中可以看到，尽管红极一时的“苏南模式”，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但从根本上说仍然是计划经济的延续，对私营经济具有很强的排他性。

第一节　初创电子元件厂

周玉官，1962年生，高中文化，开弦弓村十九组村民，1978年7月，庙港中学高中毕业，开始寻找就业路。当年的高中毕业生，在村里是最高学历的知识分子，他在镇办化工厂当过一年技术员和副厂长，在村办丝织厂当过供销员，在学校代过课。

⊙ 周玉官创办的吴江永泰电子有限公司车间一角。

八十年代初期，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入了江南农村，也吹进了善于接受新知识、平时关心国家大事的周玉官的父亲周仁奎的心坎里。有

一天，他对儿子说："党的政策已转向鼓励群众勤劳致富，年轻人要善于用学到的知识进行创业。"因周玉官对物理有深厚兴趣，在庙港街上摆起了修理收音机的摊店，寻找适合自己的创业之路。1982 夏，他发现市场上电扇供不应求，天气又热，于是从嘉兴市场上买回电器和五金零件，在家组装电风扇，把装好的电扇放在自己的摊店里卖。人们排队购买，没有几天 130 多台电扇全部卖出，赚了 4000 多元。这在当时，算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1983 年，刚满 20 岁的周玉官，创办庙港电子元件厂，生产电子线路板，几年后改名吴江永泰电子有限公司。开始时，周玉官与另外三位朋友搞合资，总投资一万元，添置 4 台钻床，1 台脚踏剪板机，1 台 15 吨冲床，自制烂板机、抛光机、烘箱各 1 台。工厂办在周玉官家正屋后的龙梢（后屋）里，总面积 40 平方米左右。因为周玉官占的股份最大，所以当厂长。

当时原材料紧张，周玉官经常与同事一起，骑了自行车去邻近的浙江嘉兴厂家买回边角料，用作线路板上的铜壳板。请了几位亲戚和邻居做工人，再到国营大厂找关系、接单子，因陋就简开业生产，最早的产品是调光台灯上用的线路板。由于缺乏管理经验，成本核算粗估估，认为生产一块线路板，可以卖 3 角钱，毛利可赚 1 角钱，心里蛮高兴。但忽略了工艺落后、生产效率低、合格率低等不利因素，一年下来一算，除去人工开销，亏了几千元，第二年就散伙了。

第二节　最早盖起别墅房

在失败面前，周玉官又一次得到父亲的支持。父亲不但不责怪儿子，反而鼓励他要战胜暂时的困难，把工厂办下去，使周玉官坚定了办厂的信心。但是，当时的地方政策不支持发展个体经济，银行不贷款给个体私营企业，为了筹集办厂资金，周玉官只能向亲戚朋友借钱，常常是借了东债还西债。

为了提高产品的合格率，周玉官经常结合生产实践，反复钻研工艺技术，自己实在解决不了，再请大厂技术人员指导。有一次，为了解决"丝网印刷"的质量问题，周玉官好说歹说，总算请来了一位技术员。但他只做几个示范动作，不肯把技术要领讲出来。周玉官看到对方操纵自如的样子，而自

己就是学不会、印不好，真是急煞人。幸亏父亲在旁边冷静观察，发现对方在操作时，总是用一个指头把丝网板提空，于是照着实践一下，果然有效，总算摸到了技术关子。

⊙ 1990 年，周玉官建造了开弦弓村最早的别墅式楼房。站立者为他的妻子徐华。

周玉官想买一本线路板印刷工艺的书籍，学点理论知识。但当时的书店里买不到，后来在一大厂技术科发现了这样的书，托朋友偷偷借回家，花几天时间匆匆抄写了一本，成为自己的理论根基。为了找业务，周玉官经常要与国营和集体厂打交道。当时在人们的观念中，办个体私营厂就是搞资本主义，国营集体厂都尽量不与私营厂往来。好不容易接到一点业务，往往不是难做的，就是利润很薄的。周玉官就是靠做人家不愿意干的、利润低的活起家，依靠自己过硬的产品质量和真诚的态度，在狭缝中求生成、求发展。

经过几年跌打滚爬，周玉官所做产品从简单到复杂，从手工操作到机械化操作，生产技术过关了，外面的门路也宽了，盈利逐年增加。1991 年年产值上升到 27 万元。1992 年、1993 年产值又连续翻番，分别达到了 50 万元和 100 万元，生产红红火火。他在村里最早用上了电脑，最早用互联网代替传真机，用电子邮件和城里的朋友通信，最早学会在电脑上设计、修改和传递图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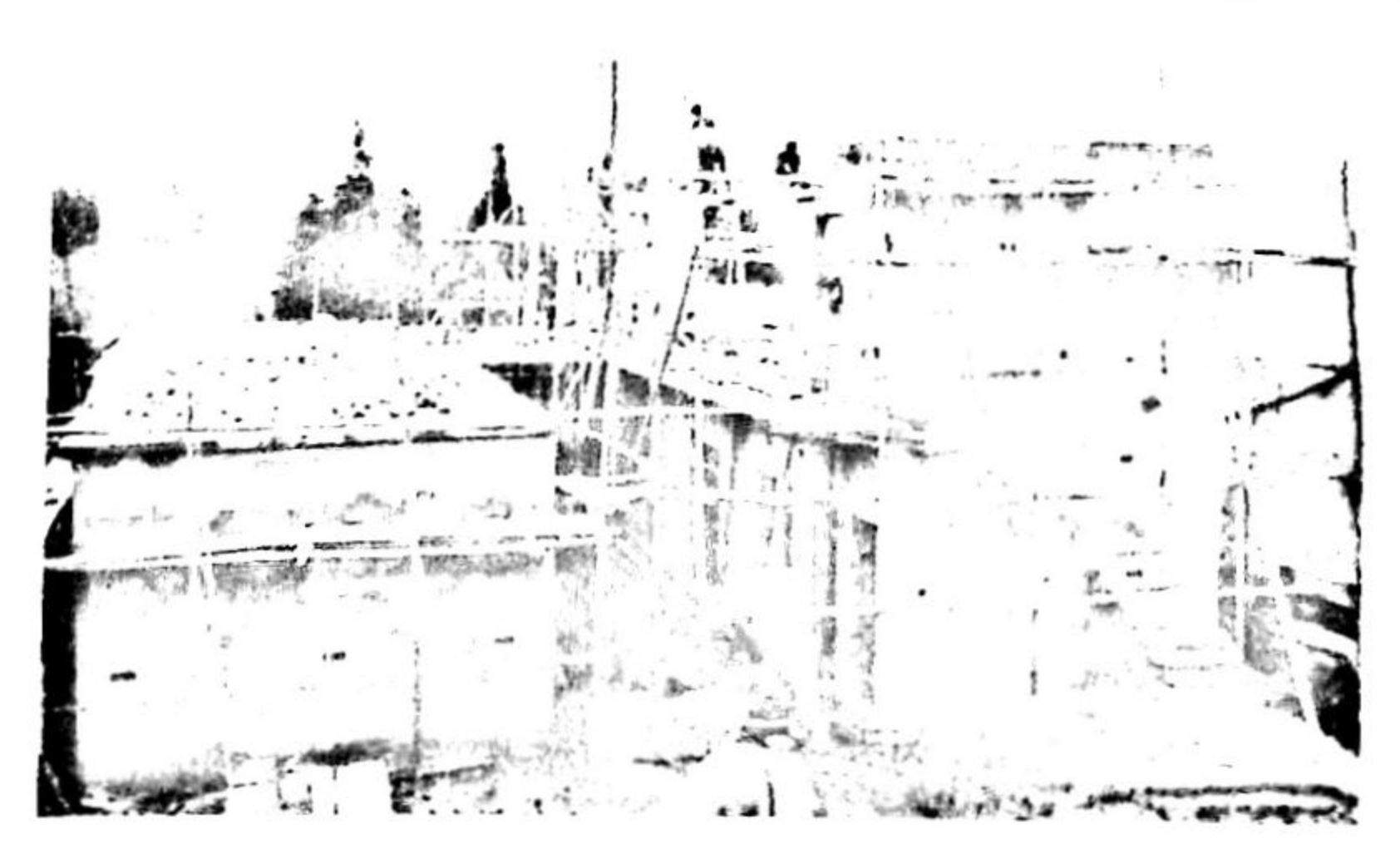
在他二十多年创业路上，上交国家税收两百多万元，并为增加就业，解决村里剩余劳动力的出路，作出了不小的贡献。他在村里最早盖起别墅式楼房，在开弦弓村家庭工业普遍兴起之前，周玉官一直是村里公认的首富。

第三节　民营企业遭打击

周玉官的线路板业务得到发展，原有的厂房显得太小了，迫切需要建造新的厂房。1995 年初夏，周玉官父子俩商量在住宅南面空地上，建造一幢上下两层的厂房。这块地是他父亲用自己家的土地与别人换来的，中间还破费了点钱。为了尽快把厂房建起来，周玉官到镇上土管所办理了建房手续。

在 1994 年到 1995 年间，庙港镇限制家庭工业发展，组织人员逐户进行检查。对个体织机户剪轴头（剪断织机的经线），拆电线（强行拉电）。周玉官家正在建楼房，镇上知道所建房屋用作厂房，目的是为了发展家庭工业，所以派人来拆房子。正当要上梁盖屋面，亲朋好友前来贺喜的时候，传来了出人意料的坏消息。周玉官被某副镇长招到镇上，严厉批评他“私人建厂房是犯法的”。

周玉官回忆说：“镇上派人来拆房子的那一天，我们全家人都眼巴巴地看着，辛辛苦苦建起来的楼房被强行拆掉，心里非常难过。那天，我父亲看着被拆下来的砖瓦，泥灰未干；看着用水泥浇铸的大梁，往下丢，最坚强的老汉也憋不住伤心，这天我父亲哭了。我家创办无线电线路板印刷厂，在同行业中是起步早的，如果镇上不加阻挠，我完全可能把握机遇，做大做强。但是，无情的事实，使我错失了发展良机。”



⊙ 1995 年，镇上派人来拆周玉官家正在建造的房子。批评他“私人建厂房是犯法的。

第四节　临危受命管理忙

1997年，开弦弓村村办集体工厂全部关了门，村党总支书记被免职，村中无人主持工作。这时，镇党委想到了懂技术、会经营的私营企业主周玉官，请他主持全村工作。像他这样的私营企业家、非党人士担任一把手，在开弦弓村历史上没有先例，而且在全市也是唯一的一个。周玉官的实际职务是村经济合作社社长，但是开弦弓村的干部群众都称呼他“周书记”。

这件事引起了来访者和新闻媒体的关注。1999年10月16日《农民日报》用一个整版的篇幅，以《去看江村》的头版大标题，发表特派记者的专题文章，作了详细报道。江苏省社科院王淮冰研究员在《江村报告》一书中，以“江村非党人士主村政”为题作介绍。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法学博士薛和，在《江村自治》一书中，把私营企业家周玉官担任“村书记”作为“江村社会各阶层分析”一章里的实例。

周玉官临危受命，从前任书记手中接下来的，是个负债累累的“烂摊子”，

⊙2001年，出任开弦弓村“一把手”的周玉官，向费孝通汇报工作。

等着他的不是柳暗花明平坦大道，而是山重水复的崎岖狭径。上任后他先从镇里请来审计人员，对前任书记任期内的财务情况进行审计。费时一个多月，终于水落石出，开弦弓村村办企业共负债务 972 万元。

工作中最头疼的是村里的债务，不断有人上门讨债，周玉官坚持债务不能让村民背。欠银行的债是大头，如今银行非但对开弦弓村一文不借，而且见到开弦弓村的钱，就扣下来抵债，连村民卖茧子得 20 多万元，也被银行扣了下来。他再三交涉："这是农民的钱。村里欠银行村里认，但无论如何不能以村民个人售茧的钱作抵，村民的利益不能损害。"这些钱总算交到养蚕户的手中。

在 6 年任职期间，周玉官把主要精力放在村里，把自己放在普通村民的位置上，设身处地地维护村民的利益。村务上有急用缺钱时，他把家里的钱借作公用，毕竟是为村里办事，父母、妻子都能理解，都在默默地支持他。同时，周玉官的工作也得到了村民们的理解和支持。个别农户不交湖荡水面租赁费，经他耐心解释，对方诚恳地说："真对不起了，拖了这样久，你来我一定交。我们没有别的办法支持你，只能做到这些。"

周玉官工作务实，没有官场习气，平时讲宽容，不刻板。他提倡让村干部们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也干些自己的事，增加点家庭收入。他的工作赢得村民的拥护和好评，被庙港南片几个村的村民选为吴江市人大代表，还被有关部门推荐为吴江市工商联常委、市私企协会理事。说明在市场经济时代，群众并不看重"书记"的名分，而看重实际的为人和能力。这是人们的普遍心理，从中可以看到世风发生的变化。

第十七章　精打细算徐国奇加工羊毛衫

徐国奇家是村子里创办家庭羊毛衫编织厂较早的农户。1995 年，他与姐夫、连襟合办羊毛衫编织厂艰辛曲折的经历，生动反映了开弦弓村家庭羊毛衫编织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手拉横机逐步向电动横机、“小电脑”横机，再到“大电脑”横机的发展全过程。从中我们清楚地感受到，费孝通在《九访江村》中所提出的思想：“草根工业无疑是中国农民的一个了不起的创举”，“他们根据自己的生活需要去改变工业的性质，让工业发展来适应自己。在草根工业中，农民表现了充分的主动性，这不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一大特点么？”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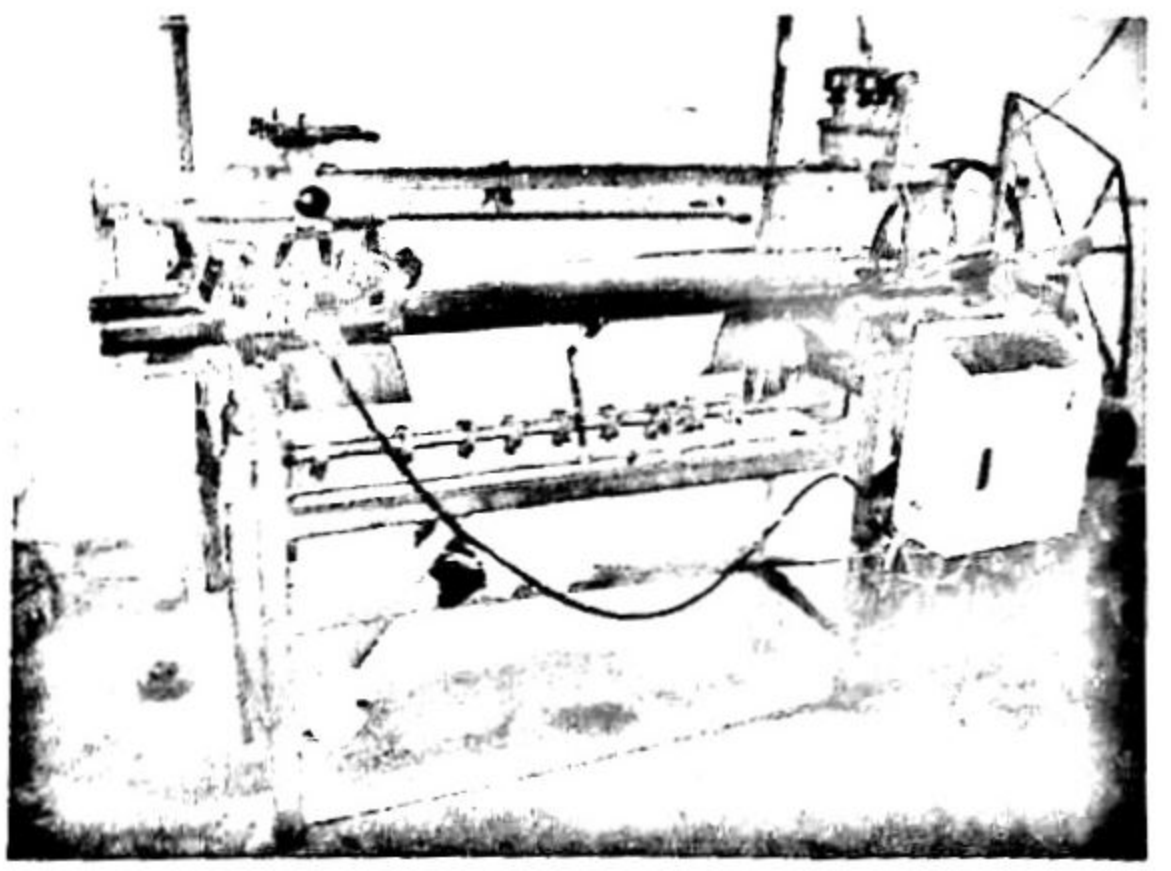
第一节　齐心协力办织厂

徐国奇，1970 年生，高中文化，家住西草田 3 组，他原是西草田村会计，1997 年担任西草田村书记，两村合并后，担任开弦弓村副书记兼村会计。妻子徐明英，初中文化，1971 年生。父亲徐文虎，初中文化，1948 年生。母亲朱雪凤，小学文化，1947 年生。我们在参观他家的工厂时，徐国奇向我们生动介绍了创办家庭羊毛衫厂的亲身经历和体会。那么，最艰难的第一步是怎样跨出来的呢？他说：

“我家从 1995 年 5 月开始，与姐夫合作搞羊毛衫编织。由于我 1994 年初结婚时，欠了 1.8 万元债，1995 年才还清，家中没有积蓄，手头只有几

① 费孝通《九访江村》载《爱我家乡》第 117 页，群言出版社，1996 年 6 月。

千元。为了能省点本钱，1000多元一台的新横机不舍得买，所以考虑买旧横机。我与姐夫及横扇几位朋友相约到张家港妙桥、常熟福山等地收购旧的手动横机。因为那里的农村里，在女儿的嫁妆里，常要带一台横机，因此农户家里常有闲置的旧横机。我们去了两天多时间，收购到20多台旧横机，每台300元至500元，大约是新横机价格的三分之一。我和姐夫各分到4台，我总共花费2300元。”



⊙ 开弦弓村早期流行的手拉横机

当时，市场行情比较好，织一件羊毛衫可赚8元。每个工人每天可拉10到15件，一人一台机，包吃包住，实行计件制，加工一件羊毛衫，工人可得4至5元，平均台机日利润100元左右。工人做一天（含加班），可得工资50至60元。羊毛衫市场季节性强，春秋季薄型，冬季厚形。每年上半年春节过后开工，至4月20日前后结束，下半年立秋后开工，做到年底，实际开工天数约200余天，台机利润约1万多元。

开始时，徐国奇请4名工人，把买来的4台旧横机经过检修后开起来。在半年多时间里赚了3万多元，全家人非常高兴。做了一段时间，感到规模太小，用赚到的钱，再买两台新横机。每台1150元，又花了2300元。再买点配件，添置工人用的床、桌、盆等用具。加上第一次购买的4台旧横机的钱，总投资5500元。

家庭工业与务农相比，赚钱多，致富快，很快把全家人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母亲做饭，包括工人吃的饭。明英（妻）套扣，把工人织好的衣袖与衣片缝合，兼做日常管理。父亲做包装和运输，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把晚上打好包的羊毛衫搬到船上，早晨5点运到开弦弓村公路上，拦车送濮院羊毛衫市场。徐国奇自己因为村里工作忙，只能晚上与妻子一起加班。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分工不分家”的生产和管理系统，全家人都是起早摸黑地做，既辛苦，又开心。

第二节　姐夫连襟明算账

2001年6月，国奇家买了5台“小电脑”电动横机，放在连襟家里，两家合办。每台“小电脑”6200元，共31000元，但半年就挣了4万元，收回了全部投资。2002年5月再买1台，8月又添2台。10月因有一农户买了“小电脑”横机不会使用，折价转让给国奇4台。2003年岳母加盟2台，当年分给她1万元。2003年下半年再添3台，“小电脑”横机增加到17台。后来又买了3台带子机，作为配套，一个全部使用全自动“小电脑”横机的初具规模的家庭羊毛衫编织工厂就形成了。

⊙ 2007年，徐国奇与他的轿车和开在横扇镇的工厂。

厂里用工人两人，工资从每月800元开始，逐步增加到1300元。国奇夫妻两人，加上连襟夫妻两人，共有6人。白天由妻子徐明英、连襟夫妻和2名工人等5人操作。国奇白天要上班，下班回家后加点班，确保机器24小时运转。去年（2006年）讨债讨到年三十（催讨应付款），到了正月里，两家各分到7万元，大家都很开心。

为了搞好合作，在国奇的心中一直有一本投资与分配的明细账，在两家的利益分配上，做到“亲兄弟、明算账”。开始时，国奇的投资大，占的机台多，在后来的历次增加机台时，他有意识让连襟多一点，最后达到两家占有相同的机台数，先做到投资均等。同时，虽然国奇白天做得比他们少，但在整体策划、机器维修等方面都主要由国奇承担。连襟家也认为，国奇会算账，善管理，两家利益平分合情合理。

2007年采用“大电脑”横机后，管理以国奇姐夫为主，国奇妻和姐姐协助经营。另请8位工人，其中挡车工6人，倒毛纱1人，检验1人。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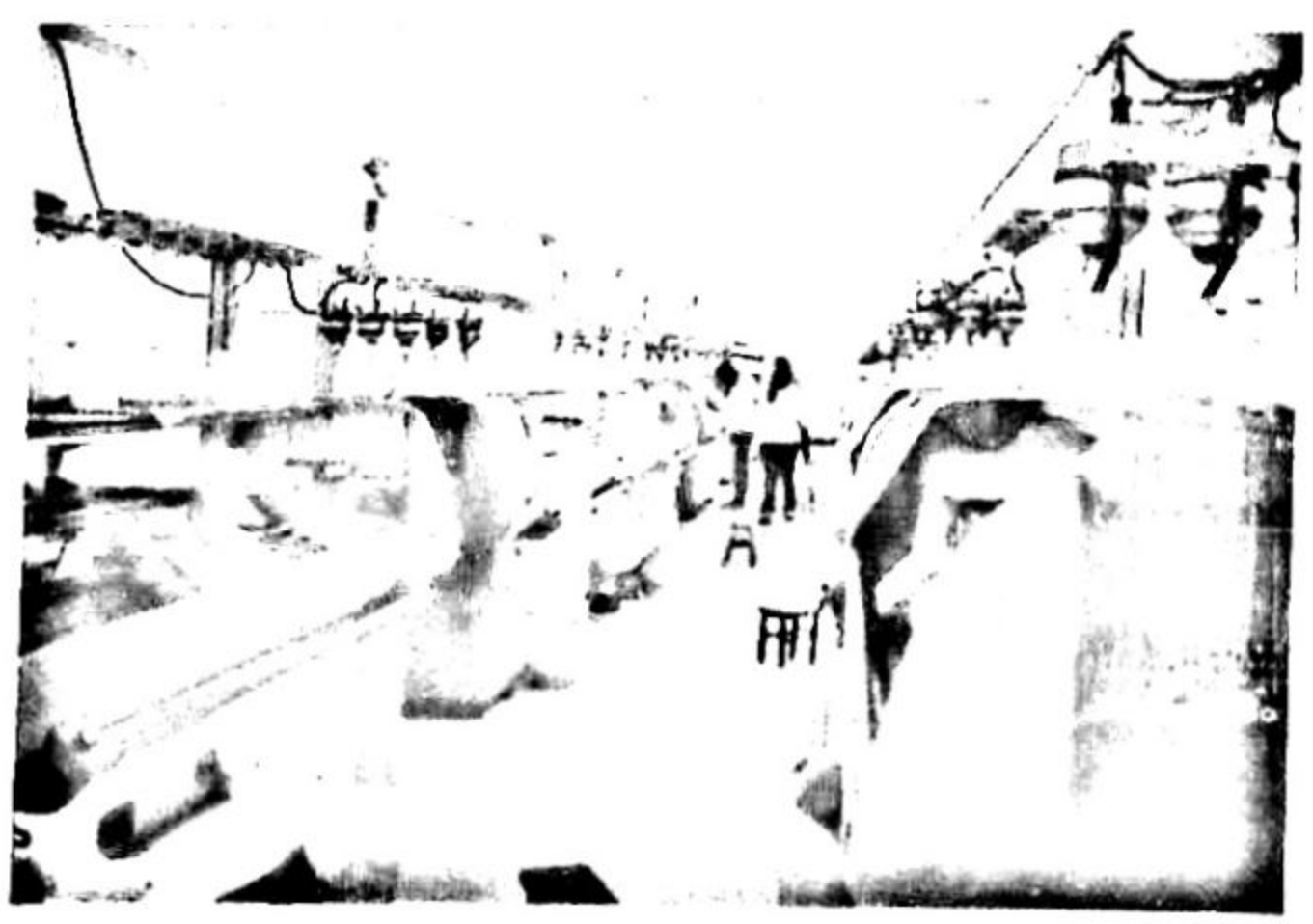
国奇本人来说是出资不出人，这样他本人就被“解放”了。当年7月开始进入正常生产，到农历12月底，加工费收入60万（“大电脑”和“小电脑”一样，也是为成衣厂加工衣片，只是加工的衣片花样复杂一点，“小电脑”无法生产，只挣加工费），净利40多万，台机获利3万元。原“小电脑”一块，由国奇连襟一家独立经营。

第三节　分工协作增动力

民工是编织业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虽然流动性大，但是只要先来的民工第一年做得好，第二年就会带来很多人，而且很多是夫妻档。其中安徽民工最多，对村里编织业的发展促进也最大。村里多数编织户用民工10人左右，规模较大的用20多人。规模最大的徐明泉户，用民工40多人，开40台手拉横机。2002年建新厂房，又添了几十台机，工人增加到80人（包括套扣工和杂工）。

村里的编织户增多，还带动了一批为编织配套服务的农户，全村形成了分工协作的编织体系。这些配套工作有：

“套扣”，就是把编织的衣袖与衣片缝合，多数由年龄较大的妇女操作，也有企业职工，下班回家后加工。人均每小时可加工5件，手脚快的一天可套80件，每件加工费1元。



⊙ 2007年，徐国奇与姐夫的合作工厂车间，排列着整齐的“大电脑”横机。

“染色”，衣片套扣成成衣，但还是白坯，下一道工序是染色。开弦弓村农户编织的白坯，一开始多数到邻近的光荣村染厂加工，也有到横扇、震泽、八都加工，染色费平均每件0.8元。

“整烫”，羊毛衫染色后，

再经整烫就可出厂，大约每7至8户编织户，需配套1户搞整烫，村里经常有5、6户专做整烫。

“染色接送”，每缸接送费20—30元，接送人员用自己的摩托车接送，每天可收入100—300元不等。

“包装”，随着生产量的扩大，包装工作靠自己已经来不及，兼职包装工便应运而生，每件包装费0.1元（包装材料由业主提供），每人全天可挣50—100元。

还有“辅料配件商店”等等。

第四节　电脑横机进村庄

邓小平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994年，横机进入开弦弓村，羊毛衫编织逐步成为村子里重要的家庭工业。同时，新技术的应用，使横机编织由手动到电动，半自动到全自动，不断推动横机编织业的发展。

2000年，在横扇镇出现电动横机（链条机），开始时仅用于拉羊毛衫衣领，后来由于工人越来越难请，就用电动横机拉衣片。但换衣片款式进行翻机时，仍需人工调节，实际上是半自动。后来厂家将链条改成了微电脑，可以输入数据自动控制，解决了简单花样的程序设置，使电动横机从半自动跨入全自动，民间将这种电动横机俗称“小电脑”。

“小电脑”自动横机一人可管4—6台，而且速度快，比一人一台的手拉横机，可提高工效近10倍。如夫妻两人专做羊毛衫，可看7至8台“小电脑”自动横机。每台“小电脑”一年可赚8000多元，高的接近1万元。夫妻两人做6台机，一年可赚4至5万元，行情好，可赚6万元左右。每台“小电脑”自动横机的价格只有6000多元，一般农户都能买得起，所以很快被编织户广泛采用，取代手拉的老式横机。而30多万至50多万元一台的可提各种花色的进口高档横机，称为“大电脑”，普通农户用不起。

虽然做“小电脑”横机很快进入正常的运作轨道，但是这样做，国奇仍要开夜班，人太辛苦了。为了不影响村里的工作，国奇又考虑投资“大电脑”横机的设想。最早出现在横扇地面上的“大电脑”横机，都是从国

⊙ 与羊毛衫专业镇相邻的西草田村一角

外进口的，自动控制的程序多，速度快，可编织高档羊毛衫，但价格十分昂贵，只有资本雄厚的少数老板才敢尝试。近年国内成功仿制“大电脑”横机，性能接近进口，每台价格只有十几万元。可是，单独搞精力和资金都不够，所以仍然采用合作经营的形式。

2007年4月，国奇又担当起发展大电脑横机项目的总策划，先提出方案和实施步骤，商量确定由国奇、姐夫、连襟和姐夫的弟弟等4人合作。经过实地调查研究，在横扇租厂房，到浙江绍兴选机型，共购进国产“大电脑”横机14台，设备投资182万元，预付3年厂房租金10万元，另有其他配套费用10万元，4人总投资超过200万元。国奇个人贷款40万元，动用银行贷款办家庭工厂，本身也是一项进步。

在十多年的辛勤创业的过程里，国奇和连襟、姐夫等合作搞羊毛衫加工，已经历了手拉横机——电动横机——“小电脑”横机——“大电脑”横机的各个阶段，生动反映了羊毛衫编织业技术进步的历程。从表面看，用手拉横机做的是成衣，产销一条龙，因此自己就是老板。改用小电脑和大电脑自动横机，批量生产单一的衣片，为成衣厂加工羊毛衫上的前片、后片或衣袖，这样人家是老板，自己却成了伙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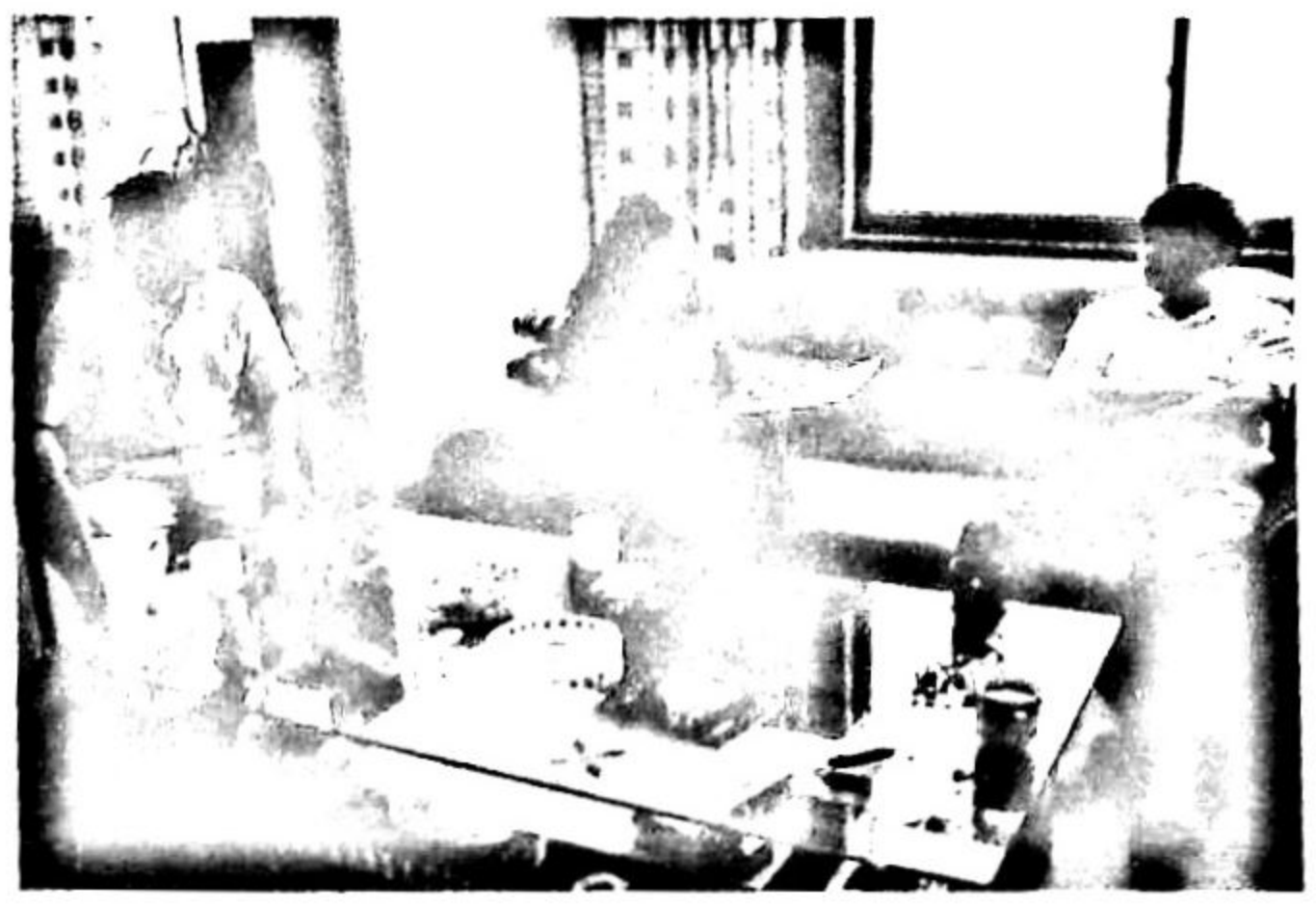
这种技术进步及其分工和变迁，进一步提高了生产的专业化协作水平，扩大了生产规模，产生了一大批运输、销售和配套服务的专业户，从社会总体上提高了羊毛衫生产的能力。可以这样说，电脑自动横机进入寻常农户家，不但是一项重要的技术进步，而且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取得的一项了不起的社会进步。

第十八章　以厂为家周永林夫妻搞丝织

周永林，开弦弓村十组村民，1962年生。读高中时，听到村里要办丝织厂，就放弃了高中学业，由村里委派到盛泽国营新华丝织厂学艺。回村后，进大队（村）丝织厂当保全工。他在村里当过集体丝织厂厂长、村主任、村经济合作社主任、村书记，中间还在盛泽东方丝绸市场做过几年生意。现在，他拥有两家丝织厂，一家叫江村丝绸有限公司，在原来的村办集体丝织厂的旧址上，另一家是与一位庙港朋友合办的联诚丝织厂。

第一节　休学学艺当厂长

周永林一家都是开弦弓村土生土长的村民，父亲周兴传（1937年生），母亲谭林珍（1939年生），妻子陆月芬，1963年生，高中文化。她与周永林一样，也是第一批进村办丝织厂的工人，具有戏剧性的关系是，夫妻俩人谈恋爱前夕，都是村办丝织厂的副厂长，周永林分管设备，陆月芬分管生产，都是丝织业内同心同德的行家。



⊙ 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常向群研究员（中）在开弦弓村访谈周永林，左为姚富坤。

1986年，周永林升任厂长后，她为了支持周永林的工作，主动要求辞去副

厂长，担任生产科长。女儿周菁菁，1987年生，在苏州科技学院本科，学环境工程专业。一家三代人，文化教育的程度一代比一代高，生动反映了开弦弓村变迁的一个侧面。

来到周永林的江村丝绸有限公司，一走进厂区就像是当年参观村办集体丝织厂一样，自然而然地联想起曾经在这里轰轰烈烈十几年的开弦弓村集体丝织厂。但是，还是这个大门，还是这片厂房，早几年来这里时，集体企业已经资不抵债，工人都已回家，车间里积满灰尘，窗户玻璃破碎，墙角堆满垃圾，真是满目疮痍。

而今这片老厂区，企业的性质已由集体转成个体。一排排丝织机重新转起来了，车间的窗户又明亮了。呈现在面前是一片生机勃勃，兴旺发达的景象，社会变迁之速实在令人惊奇和感慨。最为新奇的是，在“集体厂长”和“个体老板”两个角色的转换，都落在了周永林一个人的身上。

1978年，周永林16岁，正在读高中，兄弟读初中，家庭经济十分困难。这一年大队要办丝织厂，要尽快培训技工。办厂负责人是担任村团支部书记的谭汉文，他给周永林两个选择，一是当团支书，二是学保全工。当时农村里对读书还不太重视，全大队只有4人读高中，多数同龄青年都已参加生产队劳动。周永林想早点参加工作，减轻一点父母的负担，所以选择了学技术。不等高中毕业，就走出校门，到盛泽新华丝织厂学保全工。

周永林到了盛泽新华丝织厂，跟师傅曹好生。曹好生的父亲是厂里的厂长，女儿就是大队里的插队青年曹金妹。由于有这层关系，一个想学，一个愿教，师徒间配合密切。开始时，周永林跟着师傅走，看师傅怎样维修设备，熟悉后就成了师傅的助手，配合师傅搞设备检修、大修、调试等工作。

学习3个月，周永林回村做保全工，从安装设备开始做起，到平时的设备维修保养，在丝织厂内属技术性强的工作。从中能学到技术，但劳动强度很大，责任心很强，一有设备出故障，就要及时修理，减少停机损失。所以保全工的工资要比挡车工高一点，每月工资30元。当时叫转队工资，先由厂里把钱转到所在生产队，记工分，年底参加分红，实际拿到的钱低于30元，但能分到一份工分粮，粮食在集体化时期一直是紧张的。

1982年，红卫、立新两村合并，两村原来各有一个丝织厂，因为是同一行业，为了便于管理和发展，合并成一个厂。在清溪河北面的稻田里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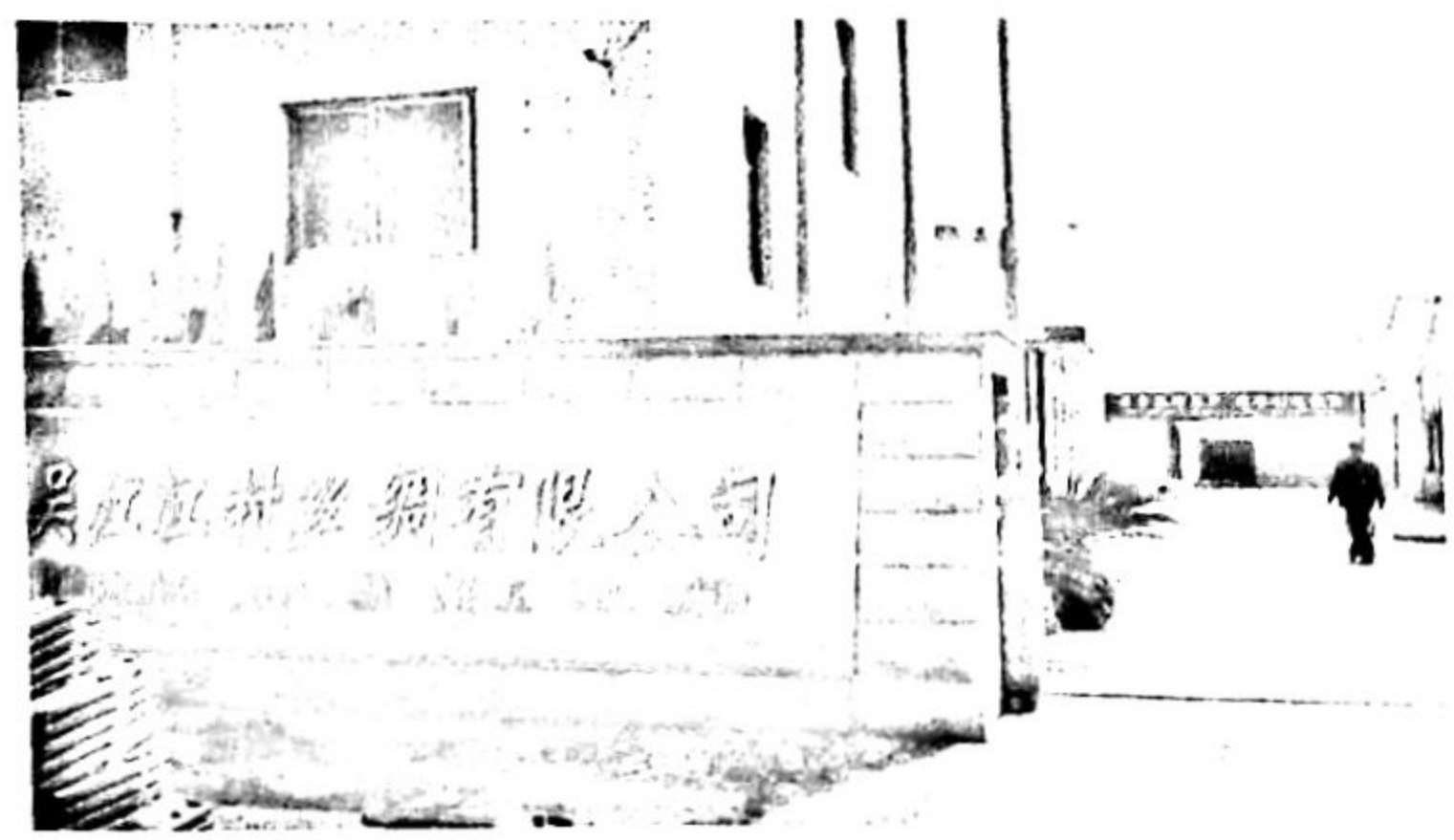
造新厂房，成立开弦弓村丝织厂。1983年下半年开工，新旧绸机共54台，周永林在新厂当保全工组组长，谭汉文当厂长。下半年周永林当副厂长，负责设备，妻子陆月芬也当副厂长，分管生产。三年后的1986年，周永林当厂长，妻子主动辞去副厂长，降为生产科长。1990年下半年，周永林担任开弦弓村经济合作社社长。

第二节　夫妻离厂改经商

周永林为人谦和，聪明而有技术，不但群众基础好，而且深得领导信任。从一个村的范围看，在他被推选盛泽学艺，到担任组长、副厂长、厂长、社长的十多年里，可谓一帆风顺，仕途通畅。但是，村办集体厂厂长名义上是厂里的一把手，实际上厂里大事都由村书记说了算，在周永林的内心深处，“官”做得越大，越感到不是滋味，最后萌发了走出开弦弓村，自己闯市场的想法。

周永林对集体厂的弊端早已看得很清楚，做主人多、管理人多，有人无事做，有事无人做，表面上大家负责，出了问题大家都没有责任，名义上厂长是一厂之长，厂里出了点问题时，厂长很难处理。但是，真正使周永林下决心离村，其中还有一段不小的插曲：

1991年，从上到下要求乡村工业加快发展速度。村、镇干部考虑，必须增加对村办工业的投入，村里没有这么多钱，怎么办呢？办法是与大厂搞联营，利用对方的资金、设备和技术，加快村办企业的发展，被称为：“借鸡生蛋”。但是非亲非故，单相思



⊙ 周永林创办的江村丝绸有限公司，右侧的蓝色标语写着：“质量赢得客户，信誉创造效益”。

难结良缘。最后请出老县长于孟达当“红娘”，在他的促成下，盛泽乡办大厂工艺织造厂同意与开弦弓村联营，投入丝织机20台和拈丝车等一批前道设备。

但是，双方都是集体企业，具体运作中，双方人员责任性差，相互扯皮的事情多。联营后，实际效果并没有想象的那样好，半年没有出效益，反而亏损了50万元，到年底工人工资发不出。时任村经济合作社社长的周永林，大年三十前连续3个夜晚与会计一起到对方厂里协商，总算拨来20万元，解决了工人工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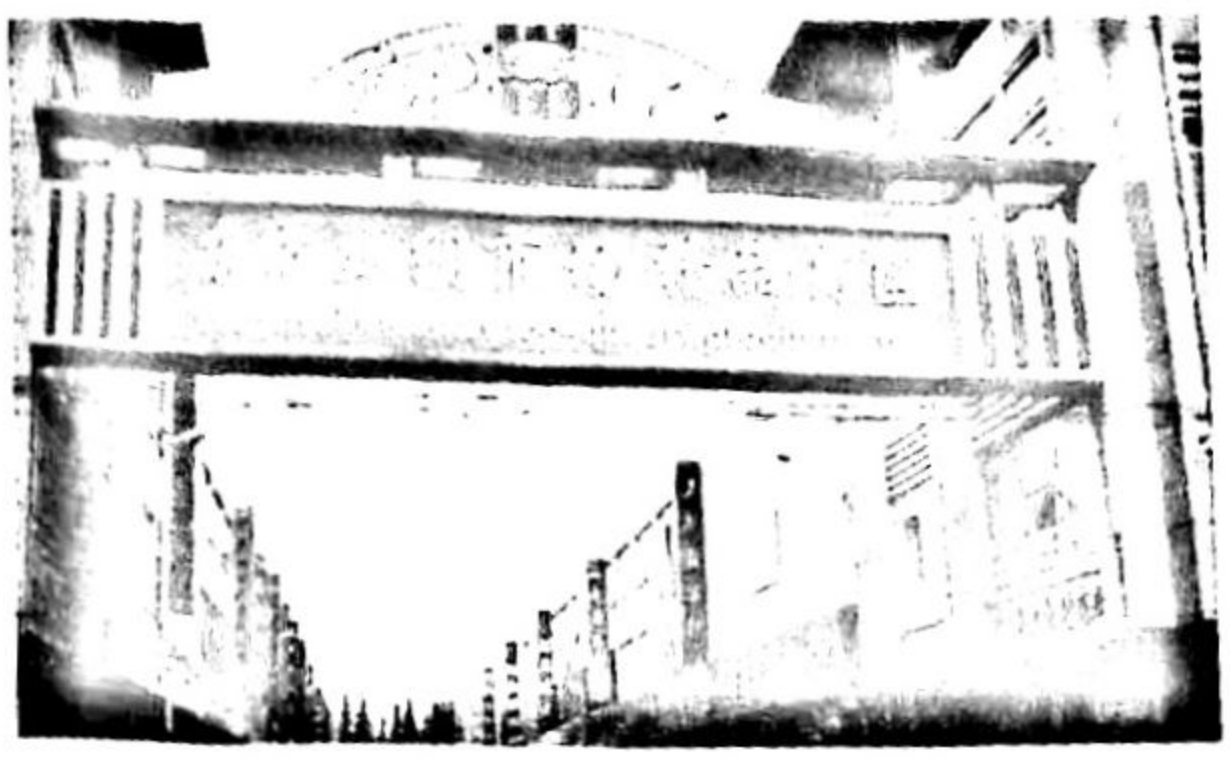
到1993年3月，联营厂的效益还是上不去，镇党委书记找周永林谈话。对他说：“联营厂不要搞了，还是村里单独搞，由你回厂当厂长。”但周永林心里明白，联营关系解散后，企业的困难更大了，乡村干部都可做主，对这个左右为难的厂长实在不敢去当。而且，当时南麻、坛丘等周边乡镇都已开始发展个体私营经济，而庙港依然限制私人办厂，所以周永林感到集体厂前途越来越渺茫了，当场拒绝了镇党委书记提出的要求。不久，周永林被免去村经济合作社社长的职务，在家闲居。

到了这一年的八月份，南麻有个朋友在一家集体厂里承包了16台织机，知道周永林懂技术、会管理，请他去帮助指导。条件是织出的面料由他包销，并可卖掉后再付款。这样，身无分文的周永林，也做起了丝绸生意。年底，周永林在盛泽东方丝绸市场，承包了镇劳动服务公司的门市部，终于有了固定的经营场所。

第三节　万商云集看“东方”

东方丝绸市场开业初期，市场内都以集体名义开设门市部，销售本厂产品。这些门市部，从经理到职员都是本企业职工，拿固定工资和少量奖金。经营人员就是看看店、记记数，效益高低，与己无关。后来企业开始重视经营效益，推行承包制，每年门市部与企业签订合同，确定上交企业的利润。完成上交任务，多赚的钱都归经营者所得，调动了经营人员的积极性。

这种承包经营的做法，虽然还没有完全摆脱计划经济的观念，但已带有市场经济的性质，很快在全场推广。实行承包后，使原来的集体门市部，



⊙ 东方丝绸市场市场交易额居全国同类专业市场首位，因为起步早，知名度高，客流量大，生意好做。

增强了经营活力。企业所关心的主要目标是拿到每年的上交利润，至于店铺是本厂职工经营，还是厂外人员经营，已不重要了。这样就为私人进市场做生意，打通了一条现实的途径——承包门市部。

周永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东方丝绸市场做生意。1994，妻子也从村办厂出来，夫妻俩一起在盛泽东方丝绸市场开店。因为东方丝绸市场起步早，知名度高，客流量大，生意好做。周永林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货源上，和连襟轮流跑浙江湖州等地收购绸匹。湖州农村私人织绸很普遍，但农户织绸批量小，地点分散，当时交通和通讯条件还很差，到偏僻的农村一家一户地收坯布，经常要步行几十里。但是，这些不利条件，使产地与市场保持较大的差价，利润率高，一年算下来可赚几十万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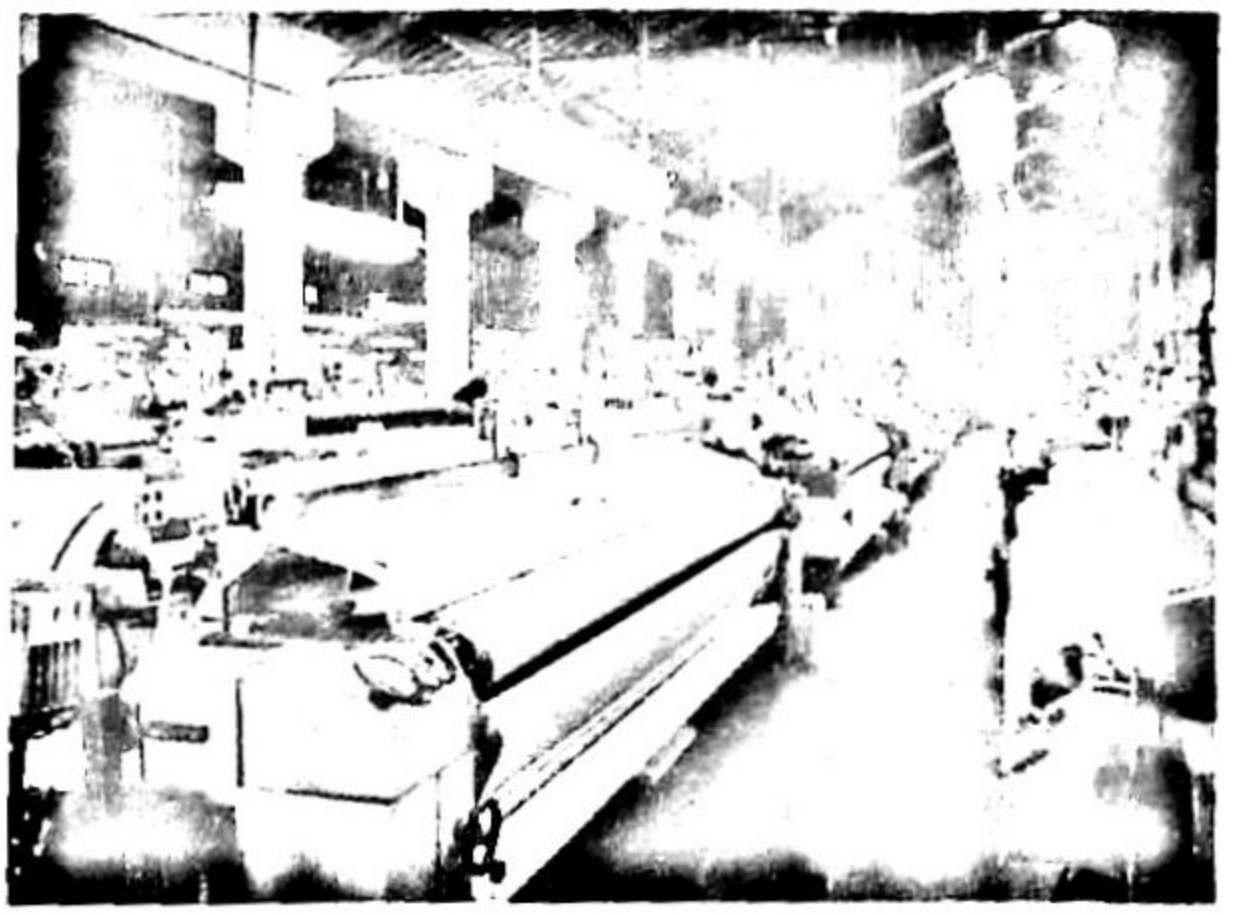
第四节　随机应变重办厂

周永林在东方丝绸市场做了二三年生意后，各地的交通通讯条件改善得很快。做生意的人都有手机，价格高低，一个电话就了解得清清楚楚，市场行情越来越透明，经营利润越来越薄。在这种不利的形势面前，他认为，要把生意继续做下去，必须开辟自己的生产基地。

1997 年，开弦弓村丝织厂亏损倒闭，150 台丝织机都卖给了村民，村里有几十户人家排了织机，开始家庭织造。平均每户 2 至 6 台，起码是 2 台，但前道设备仍然集中在村办厂里。这一年的下半年，无党派个体业主周玉官接任“村书记”的担子，请周永林回村承包。

是年 10 月，周永林与村里签订 3 年合同，承包 16 台大卷装机，做丝

织前道和加拈。大卷装机又称牵经车，把众多经线卷在滚筒上，为丝织前的主要准备工作。周永林把加工好的大卷装发给丝织农户加工织布，织好的布交给周永林销售，并付给织户加工费。大多数织户都是本村的，最多时（1999 年）周永林外发加工的绸机有 200 多台。



⊙ 2007 年，周永林厂里的喷水织机。

这种发料加工的形式，对拥有少量织机的村民来说，简化了前道准备的工序，减少了进料、销售等经营环节，并具有稳定的加工费收入，受到村民的欢迎。而对周永林来说，可以减少购买织机的大量投资，轻松地建立了生产基地，为经营提供稳定的货源，有效地扩大了销售量，增加了经营收入。

但是，市场形势千变万化，原来村办丝织厂卖给村民的丝织机，都是用了十几年的 K611 旧织机，门幅只有 1.1 米至 1.45 米。而当时开始时行由喷水织机织出的面料门幅宽 2.4 米至 3.3 米。老织机织出的狭幅面料，市场上越来越难销，利润越来越低。周永林做了 3 年多时间发料加工，再也做不下去了。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前，周永林又一次改变经营方式，他分几批买入喷水织机，淘汰落后的老式 K611 织机。2002 年上半年，周永林成立江村丝绸有限公司，拥有喷水织机 40 台。2002 年下半年，在镇开发区，与庙港朋友合资创办联诚丝织厂，安装喷水织机 50 台，两人各半，另聘厂长管理。

2003 年，周永林出资，从银行手里买回他已使用多年的村里的老厂房。这些厂房和土地，是村办企业倒闭后，原开弦弓丝织厂欠农信社 400 万元抵压贷款的部分抵押物。从此，周永林有了完全属于自己的工厂。是年 3 月，周永林担任开弦弓村党总支书记。

4 年后的 2007 年，他主动向镇党委提出辞职，以便集中精力管理自己的工厂。按照“男主外、女主内”的农村传统习俗，周永林主管经营和销售，妻子陆月芬分管厂内管理和生产，父母亲在厂里做些杂务。一家人各尽所能，和睦相处。真正实现了集体厂时期提倡的一句口号：以厂为家。

第十九章　艰苦创业徐柏明寻觅市场路

开弦弓村农民编织的大批量羊毛衫，不是为了自己穿，而是为了卖钱，它已不是农耕社会自给自足的农副产品，而是用于市场交换的商品。它有一个大去处，就是相邻的浙江省桐乡市濮院镇羊毛衫专业市场。这是一片充满魔力的大平台，不但为农民编织的羊毛衫找到了出路，而且市场本身就是一个蕴商机、寻找致富门路的大行业——经商。同时，濮院羊毛衫市场也是由众多农民搭建起来的，开弦弓村村民徐柏明就是其中之一。

第一节　寻找就业新行当

徐柏明，开弦弓村村民，1973年生，初中文化，老家西草田。按照当地风俗，父母从小就把柏明寄养在开弦弓村6队村民吴其宝家，并订上了“娃娃亲”。1998年入赘吴家，妻子吴冬梅，岳父在村中养殖鱼虾，岳母在家务农。在徐柏明懂事的时候，已是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的80年代初期。但是，他家还是单靠种几亩田过活，也

⊙ 2008年9月，作者朱云云（左）、姚富坤（右）在徐柏明办公室作访谈。

没有搞什么副业，父母带着柏明姐弟三人相依为命，生活十分困难。

初中毕业后，父亲吴其宝为了让柏明有一门谋生的手艺，十七岁学理发，当时虽然女性开始流行烫发，但理发还是很单一的。徐柏明去苏州美容美发学院学习时尚盘发、做新娘头等，结识了一批来自江苏、浙江各地的同学。十九岁在开弦弓村十五组租房开理发店，开始独立生活。由于自己的努力和勤快，理发、洗头、染发、焗油，都做得不错，吸引了周边不少顾客。

但是徐柏明感到，虽然理发生意红火，毕竟是小生意，发展前途有限。于是买了一条船，改行搞运输，长途开上海、湖州，返运农副产品。短途来往于村镇之间，做粮食、水果生意，以物换物。新米上市，徐柏明开船进村，农民用稻谷或大米换水果或日常用品。

九十年代中期，横扇及西草田兴起家庭羊毛衫编织，使用手拉横机。徐柏明做理发时认识很多做羊毛衫加工的老板，知道他们需要这种设备，正巧在苏州学习时认识一位张家港同学，他们那里生产这种编织机。于是，与一位从小一起长大的搞机修的朋友，合作做机器生意。两人凑了点钱，再借了的钱，以一万多元做本钱，从张家港的朋友那里进货手拉横机到村里来卖，进货价每台 1150 元，销售价每台 1350 元。第一次进 8 台机器，租了一辆面包车运进村里，很快都卖掉了，赚了 1600 元，接着再进 9 台机器。后又通过常熟的朋友，发现常熟的机器和配件比张家港便宜，改从常熟进货。

徐柏明看到村里使用的编织横机越来越多，时间长了肯定要维修和更换易损件。夫妻俩在开弦弓村菜市场旁边，租一间房子，开了一家专卖编织横机零配件的纺配店，为附近编织户服务，生意也不差。有时横机老板来菜场买菜时，顺便带点零配件回去，有时徐柏明帮助送货上门。实在忙不过来时，就叫兄弟帮助看店、送货。同时，村里纺织机也增加很快，以前是 K611 有梭织机，后来普遍使用喷水织机，徐柏明就增加纺织机零配件，也使徐柏明增长了对纺织机械的了解。

但是，一两年之后，手拉编织横机开始萧条，零配件卖不动了。于是徐柏明产生了自己编织羊毛衫的念头。1994 年，徐柏明从横扇镇买进 13 台横机和配套设备，到南通（苏北）招来工人，经营羊毛衫编织。但是，说时容易做时难，虽然生产规模不算大，却每天都要进料、出货、整烫、套扣和了解市场行情，一样都不能少。最麻烦的事情是要服侍好“十几张嘴（工人）”，服侍不好，就会影响羊毛衫的质量和产量。一家人起早摸黑、辛辛

苦苦地做了两年，亏损1.5万元。最后，被迫停产，把全部设备转让出去。

徐柏明在做羊毛衫编织的两年中，经常到震泽镇的染厂去为羊毛衫染色，认识了不少做羊毛衫生意的个体老板。1995年，他买了一辆小四轮农用车，为他们运送羊毛衫，来回奔波于羊毛衫厂与染厂之间，每天可赚一二百元，多时可得三四百多元。由于编织户经常会跟染厂发生一些染色质量纠纷，柏明搞运输，介于双方之间。他为了不影响自己的生意，十分注意对染色过程的观察，主动跟厂方交换意见，丰富了自己鉴别羊毛衫染色质量的知识。徐柏明在就业路上，连续换了几个行当，跟编织、织造、印染、设备、配件都有接触，为后来做羊毛衫生意和创办织造厂，打下有利基础。

第二节　投入濮院大市场

徐柏明在为本村本镇编织户运送羊毛衫的过程中，看到这些编织户老板经常要送货到濮院羊毛衫市场去，两地差不多一个小时的路程。多数老板坐在拉羊毛衫的卡车上，但是卡车座位少，人多时只能坐在装货的车厢里，既不舒服，又不安全。徐柏明就买了一辆10多个座位的面包车，每天开濮院，接送两地往返人员，每人往返一趟160元，不少老板都成了徐柏明的乘客。徐柏明每次把车开到濮院，与乘客讲定返程时间后，就在濮院市场上转圈子。他用心观察市场，分析市场的信息来源、羊毛衫款式、销售状况、店面位置、交通工具和路线等各方面的市场因素。

⊙ 位于嘉兴濮院的全国最大的羊毛衫专业市场，成为农民致富的大平台。

濮院羊毛衫专业

市场位于嘉兴市西南10公里处的320国道两侧，东近沪杭高速。市场创办于1988年，现有羊毛衫交易区11个，门市部近6000个。2010年，濮院市场物流中心外运羊毛衫19万吨，市场成交额113亿元，连年居全国同类市场之首。每年从濮院市场流向全国各地的羊毛衫服装达到5亿件，其产销量占全国羊毛衫生产总量的40%以上。也就是说，平均2至3个中国人就有一件羊毛衫来自濮院市场。

市场上，有开弦弓村近邻横扇镇商户开设的近百家店铺，而且都在市场的中央市场区，销售量占市场的十分之一以上，开弦弓村也有多人在这个市场上做生意。在横扇镇上设有托运站，全镇成千上万从事编织的淳朴农民，把起早摸黑织出的羊毛衫，一大包、一大包地从家中搬出，装上托运站几十辆专业运输车，源源不断地运往濮院市场，通过市场强大的集散功能，销往全国各地和出口世界各国，成为开弦弓村和整个横扇镇生产的羊毛衫的主要出路。

这一件件凝结着编织农民的智慧、汗水和感情的羊毛衫，从市场上换回一沓钞票，再从这些钞票中拿出一部分换回毛纱、新设备、支付工人工资，维持和扩大再生产，把剩余的部分用于盖新房、添新衣、买食品，买汽车，子女上学等，实现他们改善生活的梦想。使我们不由得联想到唐代诗人李绅的悯农诗，并自然而然地读成：

编织夜继午，汗滴机下土。
谁知身上衣，件件皆辛苦。

第三节　跌打滚爬为致富

徐柏明在市场考察中认识到：一个吃，一个穿，永远不会过时。要想在羊毛衫行业上有所发展，最好的途径是到濮院开门市部。但是，本地在濮院开门市部的人亏损的很多，不少人劝他，开门市部人辛苦，赚钱难，经营羊毛衫行业已没有前途了，还是不去为好。徐柏明考虑到这项生意，

投资大、风险大，担心妻子不会同意，所以开始时，徐柏明瞒着妻子，利用开车到濮院羊毛衫市场的时间间隙，开展对濮院羊毛衫市场的调查。差不多在市场上转了半年，徐柏明认为，虽然按传统工艺织出的羊毛衫不好销，但是科学技术在进步，“大电脑”自动横机织出的产品十分热销，仍然前途无量，暗下决心在濮院买门市部，做羊毛衫生意。徐柏明构思完整后，再跟妻子商量，妻子听他讲得头头是道，由担心转向全力支持，开始了夫妻同舟共济，闯荡市场的新征途。

⊙ 徐柏明店里陈列的用大电脑横机编织的羊毛衫，受到广大时尚女性的青睐。

2003年，徐柏明在濮院市场二区租店面开张，半年后感觉这个生意可以做，把开弦弓的纺配店处理掉，夫妻两人一起到濮院市场做羊毛衫生意。不久打听到三区有一店主想出租店面，经商洽签订2年合同，每年租金4.5万元，一次性付清。他们之所以下决心调换到三区，主要看中这家店面的市口位置，正处在热闹地段，而且沿大街，生意好做。2个月后，店主因在家乡横扇还办了丝织厂，经济周转困难，想把店面转让给他们。

夫妻两认为这是扎根市场的好机会，借了钱把店面买下。腊月二十七讲好价格34万5千元，到了正月十五去付款，又要增加2万元。夫妻俩咬咬牙，以36.5万元成交。从此两人在濮院开店搞羊毛衫批发，注册商标“亮嘉丽”，厂名“诚信针织制衣厂”，后改名“田园纺织有限公司”。两人一想到这么大的投资，而且半数以上是借的钱，心里十分担忧，所以不敢懈怠，专心致志在濮院做生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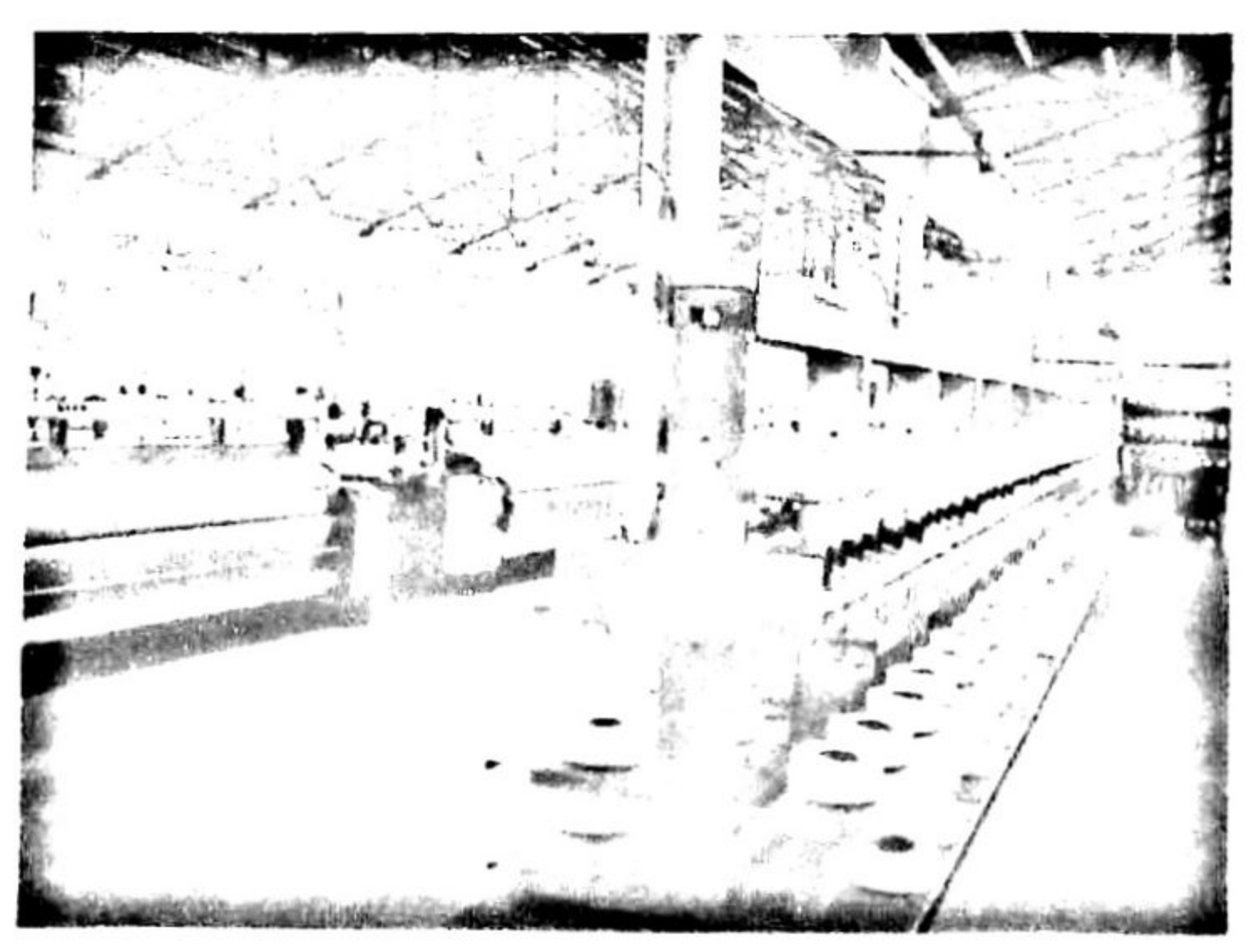
徐柏明经常走访厂家，寻找新款式，新货源，还要不断了解信息，听取各方面意见，来回奔走，非常辛苦，有时深夜12时才回濮院。为了防止

受骗，建立稳定的供销渠道，他每年出去两三次，到全国各地访问生产厂家和销售客户，了解对方经营情况和家庭实力，建立互信。濮院门市部由妻子和娘舅家女儿、女婿照看，连工人共9人，每天销售七八千件羊毛衫。

夫妻两人配合默契，从不为小事斤斤计较，所以生意做得比较顺利。大部分厂家（供货单位）在横扇、庙港，也有广东东莞等地。有50多家客户与门市部建立稳定的销售关系，这些客户来自全国各地，其中有北京、天津、西安、武汉、重庆、西宁、拉萨、乌鲁木齐等众多城市。在两年多时间里，徐柏明在濮院羊毛衫市场上赚了60万元。而且，生意越做越大，不但在市场中心区拥有一间30多平方米的门市部，而且附近还有5间仓库，面包车换成了高档轿车。2007年在濮院中央花园买了一套150平方米的住房，翌年乔迁新居，全家人在濮院欢度中秋。

第四节　又回村里办织厂

在濮阳这半年，徐柏明感觉羊毛衫生意可以做，就正式把妻子叫到濮院这边来了，把开弦弓的纺配店处理掉了。而之前店里的一些应收款让这些老板发一些羊毛衫，把账结清。在濮院羊毛衫市场的经营者中，徐柏明年轻精明。他耐心地经过半年多时间的市场调查，分析了“天时、地利、人和”各方面的因素，选择的店面位置好，仅两年多时间，同地段的店面上涨到50万元左右，到2008年升到130多万元，至2013



⊙ 2006年，徐柏明回村创办田园织造厂。

年徐柏明这个店面可以卖500万元了。

徐柏明继续关注新的发展路子，考虑在自己的村子里办工厂，生产羊毛衫，建立自己的生产基地，形成产销“一条龙”。当时镇上的几家银行知道在濮院经营羊毛衫的老板很有钱，所以经常派人到濮院市场拉存款，一个星期要去两三趟，动员他们把钱存到银行里，相互也熟悉了。徐柏明早就看中原金蜂集团（缫丝厂）东面一块地，因企业倒闭这块地就抵押给银行了。跟银行行长商量把这块地租下来，行长说：“犯不着租下来，帮你申请一下，争取买下来。”

2006年下半年，徐柏明办完相关手续，通过拍卖举牌，250万元从银行买下这块土地。沿马路建店面出租，里面建标准厂房大部分出租，一部分自己办厂。又投资387万，添置了35台喷水织机，专织特丽纶出口土耳其。徐柏明在创业的道路上又迈出了一大步，初步形成了有自己生产基地的羊毛衫和丝织面料的销售业务：

一是绍兴销售部，主要销售特丽纶、遮光布等产品；二是濮院销售部，销售羊毛衫，做了十多年了，已有基础；三是以开弦弓村的工厂为主要生产基地，为绍兴和濮院两个销售点提供部分货源；四是资金存兑（民间贷款的一种），也在做；五是出租店面，在盛泽、柯桥、绍兴、濮院、开弦弓都有一些店面出租。

从徐柏明走过的创业路，我们看到了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里，勤劳朴实的开弦弓村村民，奋斗拼搏、艰辛创业的缩影。他们在由集体经济为主的“苏南模式”转向个体私营经济的过程中，开始关心市场、认识市场、热爱市场和投身市场。从世代把土地视为命根子的农民，开始把市场视作他们办厂、经商、求生存、谋发展、奔小康的依托，创造越来越富裕的新生活。[1]

---

① 本章近年情况由人民大学博士生王沙沙调查

第二十章　两闯上海周跃明回村建别墅

1990年代，政策逐渐放宽，开弦弓村的家庭工厂不断增多。有的像周玉官、徐国奇一样直接在自己的家里办工厂，也有村民到村外办厂或经商。村民周跃明就是这一类型的典型人物。周跃明，小学文化，年轻时学过木工，开过家庭木工作坊，屡遭挫折，背上一身债务。但是创业赚钱之心未灭，先后两次闯上海，在莘庄创办“上海阿杰木制品有限公司”，成功进入上海庞大的木业市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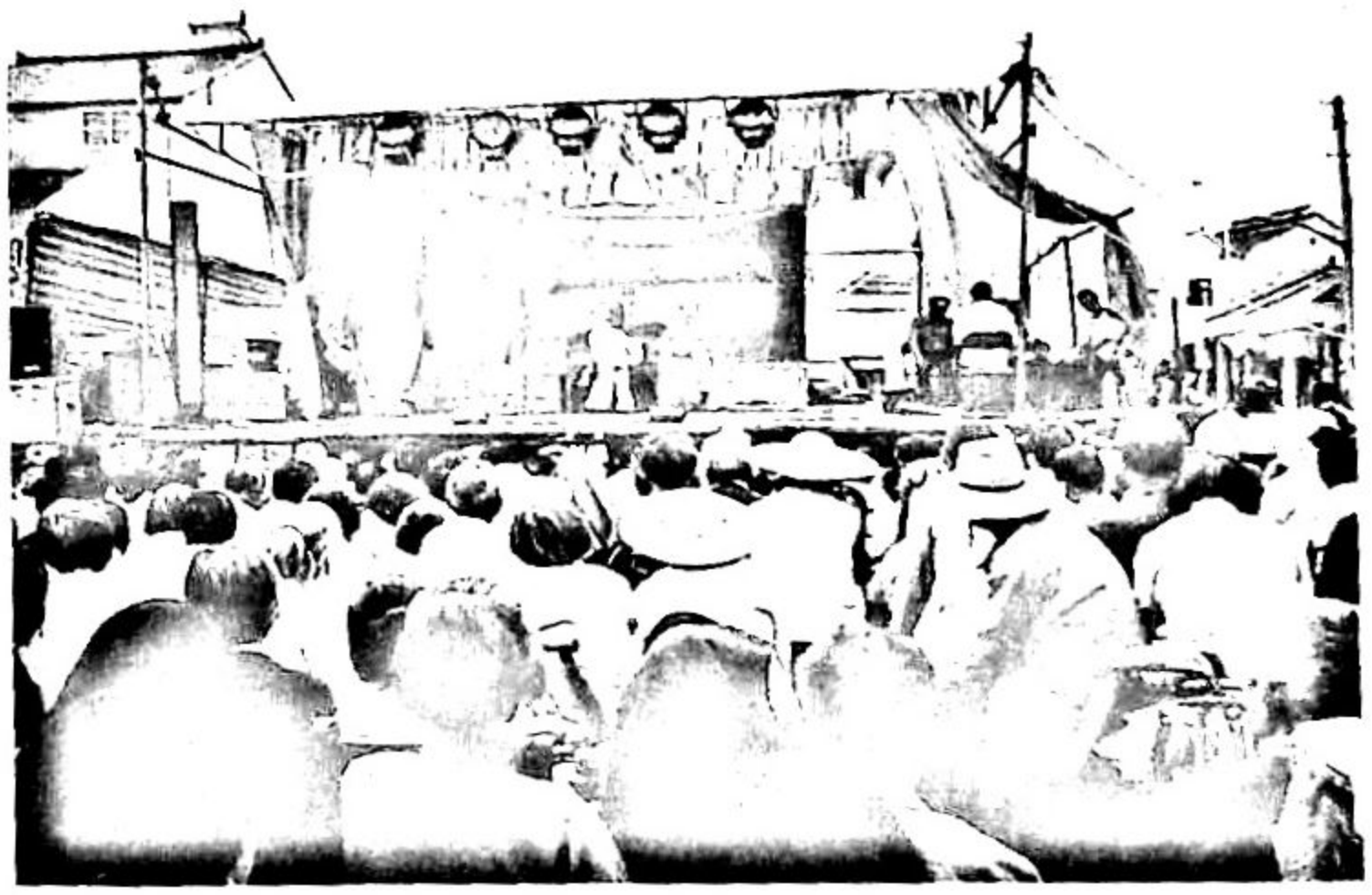
第一节　小小年纪想赚钱

1966年春，周跃明出生于本镇张家浜村一家贫困的农民家庭。三个月后，被开弦弓村11组村民周四宝夫妇领养。因为周四宝夫妇结婚后不久，就遇到“大跃进”和“困难时期”，生活十分艰难。为了生存，周四宝到浙江讨过饭，直到三十岁出头（1966年）才有孩子，可是孩子很快夭折了。夫妇俩在悲痛中以为两人岁数已大，今后可能不会再生育孩子，所以就从邻村领养了同龄婴儿周跃明。周四宝用喂过亲生儿子的奶接着喂周跃明，五年后，周四宝夫妇又生育了女儿周健美。

周跃明幼时得到养父母的宠爱，如同亲生，进入儿童时代越显淘气。上学后，十分贪玩，学习成绩平常，所以只读完小学。1977年秋天，有一天傍晚，跃明随父亲到邻村姚家港看镇上文艺宣传队做戏。开始时与父亲一起坐在台前，跃明好动，样样好奇，看不了多久，独自一人溜到后台，看琴师演奏。看就看么，还要用手去拉二胡弓弦上的尾棕，使二胡走了调。在全神贯注演奏的琴师，被他一次又一次的捣乱实在恼火了，随手打了跃

明一个巴掌，却巧被正在寻找儿子的父亲看见，他见儿子被打，顿时怒气冲天，一个箭步冲上后台，揪住演奏师的胸脯，两人扭打起来。

宣传队的琴师们和勤杂人员，看见后都围了过来，有劝阻的，也有帮打的，还有台下观众起哄的，弄得场面乱作一团，看戏变成看相打。两人互不相让，从台上打到台下，又从台下打到河边。琴师见有人帮打，愈是来劲，而跃明父亲自知寡不敌众，边打边退，被他们逼到河边，落入水中。幸亏他会游泳，迅速游到河对岸，夺路而逃。回到家里，只是对跃明骂了几句，事情就算过去了。



⊙ 开弦弓村民在观看传统戏曲。

周跃明虽然读书不认真，但是年纪轻轻就想“寻钞票”（赚钱）。所以父母认为跃明有志气，对他特别欢喜，十六七岁时让他拜师学木匠。周跃明学艺十分刻苦，而且心灵手巧，一二年就能独立做家具了。十八岁就闯荡上海，在建筑工地打工，交了一些朋友，也领略到上海市场之大。二十岁刚出头的周跃明，就想独立经营，第一次接了一批做写字台的生活（业务），租用生产队仓库作为生产基地，向私人借了点款买材料，请几个外地木工，以计件制的方式，做了一批写字台。全部油漆好后，送到苏州客户处交货。

但是出师不利，令周跃明万万想不到的是，对方收到货后，却以生产质量问题为由，迟迟不肯付款，讨了几年也没有讨着，实在无奈时，打了官司。但由于周跃明性格耿直，第一次独立与客户签订合同，缺少实际经验，过于信任对方，合同行文不严，文本中疏漏之处被对方利用，法院也难于追究责任。周跃明赔了钱，欠了债，第一次“寻钞票”失败了。

过了一段时间，大概在1990年前后，周跃明为了还债，到上海找朋友，好不容易接到一批做门框的生活（业务）。包工头把自己承包的一部分

加工门框的业务，转包给周跃明。包工头按照当时的行规付给周跃明百分之三十预付款。周跃明高高兴兴回到开弦弓村，租用老中学的校舍，请自己的师傅、师兄为帮手，再请几位外地木工，重新添置了木工刨床等设备，像模像样地开始了批量生产。在刚开始的半年里，生产、销售、结账都算正常，赚了点钱。

但是好景不长，正如诗人杨万里所言："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栏。"周跃明还在村里紧张地加工生产，做好的门框一批批送往上海，而在上海那边，包工头竟然卷款逃跑了。跟周跃明一起做这批门框的工头，得知这一消息，竟急得跳入河中。真难想象，七八个人起早摸黑做了大半年，眼看辛苦钱快要拿到手了，结果把借来的本钱都贴掉。周跃明老债还未还清，又多了一大笔新债，最多时全家负债十几万元。

在当时农村，收入超过一万元的家庭称为"万元户"，十几万元可是个大数字了。从此，弄得周跃明朋友分手，亲戚断门，家里三日两头都有讨债人。为了躲债，周跃明常常到半夜才悄悄回家，有时回来看到家里的灯还亮着，就在外面再躲躲。那时候，从事个体工业还像是做不光彩的事一样，集体不会帮助你。在集体厂上班的村民，年收入不到2000元，要帮也帮不起。父母辛辛苦苦挣得几百元养蚕钱，为了还债，也拿出来垫上了。过年时，家里讨债的人更多了，连吃年夜饭，还有人围着桌子讨债。

因为家里穷，父母没有钱为周跃明娶别人家的姑娘成亲。到周健美18岁的时候，母亲周四宝不得不跟女儿商量，把她许配给周跃明。周健美知道虽然哥哥与她从小兄妹情深，但不是亲哥哥，懂事的周健美答应了。但是，家里实在没有什么钱来办婚事，到了1993年，周跃明已是27岁了，周健美也是22岁了，两人才结婚。周健美在回忆当年结婚时的情景时，还感到心酸。她说：

"结婚前，房间里唯一自己添置的一张席梦思床垫，几次差点儿被一位债主拿走，是我父母苦苦哀求后才勉强留下。结婚时，是周跃明娘家帮助添置了一些家具，才勉强办了婚事。结婚那天下午，我们还没有打开亲戚、朋友送来的人情（红包），就有许多人上门来讨债了，堂屋里围坐着一群讨债人，他们看中的就是人情钱。仅有的一点红包钱，还了几个债主，但还有好几个债主只能空手回去。结婚是人生大喜事，但对我和跃明来说，那一天根本高兴不起来。"

第二节　两闯上海尝苦甜

就在周跃明和周建美结婚的那年秋天，夫妻两人东拼西凑积了一千多元钱，再闯上海。周建美说："没办法，生活还得过下去，欠下的债总得慢慢地归还人家。"他们来到当时还是上海郊区莘庄镇的一个村上，向朋友借了三万元，租两间店面，开一家小五金商店。周跃明跑外勤，负责接生意和进货，周建美看店、做生意和照顾生活。为了节约，二十来个平方的店面，白天是商店，晚上就是他们的房间。小夫妻都是从小一起吃过苦的人，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还债，同舟共济，相濡以沫，生活再艰苦，也毫无怨言。

店里经营的是为建筑配套的五金零件，周跃明从浙江南浔进货，南浔是重要的区域性装饰材料的供货市场，而上海是全国发展最快的城市，是巨大的用户市场。商店开业后，生意还不错，虽然店面零售并不能赚到多少钱，但以商店为基地，便于与客户联系，大多数商品直接卖给建筑工地。小五金，品种繁多，为了保证店里不断货，周跃明必须经常跑南浔，奔波在进货的路上，两地相距150多公里，来去开销也不轻。而且每年要扣除一万二千元房租金，加上水电费和两人的吃用开销，头一年还赚了三万元。

⊙ 周跃明在上海莘庄的工厂，就在这样简易的厂房间里，产生了百万富翁，让文化偏低的周跃明施展自己的才能。

一年做下来算账时，周跃明跟朋友商量，利润全让朋友拿走，但把本钱留下，第二年再还本钱。两口子又经营了一年，到1995年底时，周跃明信守诺言，把三万元本金如数还给朋友。这一年，除去生活费用，周跃明还赚了五万元。由于小夫妻待人真诚，经营服务周到，开了两年店，不但

赚到了钱，而且结识了不少朋友。朋友们对他们的困难处境很关心，他们认为，上海是建筑业的大市场，每年需要大量门框，跃明本来是木工，有技术，应根据市场行情，还是重操旧业为好。周跃明在一位房产公司上班的朋友的全力协助下，夫妻俩把商店转让给别人，用赚到的五万元钱作本钱，租用了几间集体仓库，叫了几个外地木工，重新干起了加工木制门框的老本行。

开头两年，周跃明把一部分精力花在结识朋友和打开产品销路上，虽然生意也不错，但是赚到的钱几乎都花掉了。他认为，现在是搞市场经济，从开弦弓村来到人地生疏的上海做生意，关键不在生产，而在销售。因为生产一头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而销售一头的主动权却在人家手里。从第三年开始，很多建筑公司使用过周跃明生产的门框，认可了他的质量，在木制门框行业建立了信誉，业务越做越宽。开弦弓小学老师周全奎访谈周跃明时，他坦然地谈起过这段成功的创业经历和自己的体会：

“我第二次闯上海，千方百计开了家木工厂，但还是心有余悸，只怕哪一天又要亏钱。所以，小工厂开业后，我特别看重合作伙伴的情义，以自己微薄的力量和十二分的热情结交朋友，感动朋友。有一次，为了给一位朋友送礼，没有钱，只能把自己唯一值钱的金戒指送到商店里去出出新，抛抛光，送给朋友。还有一位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老总，曾给过我订单，心里对他很感激。老总退休了，我还要经常去看他，送一点家乡的时鲜特产，后来这位老总又被另一家公司返聘，很多订单又给了我。

“这几年来，我的业务源源不断，工人一般每隔两三天就要加班一次，当然，我也付给工人优惠的加班补贴。现在厂里生产业务、质量验收，都由我的助手全权处理。他是浙江长兴人，跟随我近十年，为人诚恳。前几天，我特地给他（指助手）配备了一辆崭新的专用轿车。我只管接单、进货、结账和应酬。现在我在上海的朋友多了，路也宽了，我不愁没有业务干。”

从 1993 年起，周跃明在上海闯荡了六七年，赚的钱一年比一年多，总算还清了所欠的十几万元债。还债这一天，周跃明特地从上海赶回开弦弓村，把债主们请来，所有的债，加上百分之二十的利息，一次还清。周跃明的工厂，虽不大也有三十多名工人，拥有较好的机械化设备，添置别克轿车、大众轿车和货车各一辆。他艰苦创业的历程，展现了开弦弓村村民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里，跌打滚爬、倔强成长、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生动画面。

第三节　手中有钱造别墅

周跃明还清债后，1999 年花了近一百万元，在老家开弦弓村，建造了全村迄今为止最豪华的别墅。这座别墅坐落在村东美丽的东庄荡湖边，坐北朝南，格外引人注目。屋前是占地三百多平方米的小花园，栽种了主人喜爱的广玉兰、金桂、含笑、红枫等花木。

就是这样一座豪华的别墅，出人意料地降落到开弦弓村，降落到一个曾经是负债累累的贫困家庭——周跃明的家中，怎能不令人刮目相看呢？这不是海市蜃楼，也不是美丽的幻想，而是这个家庭里的主人勇敢地走出农村，闯入上海大市场，用自己的辛勤、智慧和诚信，换来的劳动成果。是改革开放后，苏南农村现实的一幕。

2005 年，北京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周拥平在开弦弓村调研时，曾多次访问周跃明一家，但只有两次巧遇周跃明。一次在开弦弓村家里，一次在上海厂里。两次见面的情况，在他写的《江村经济七十年》一书中作了生动的记述：

“去了周家很多次，可要见周跃明还真不容易，他大部分时间在上海。2005 年 4 月 23 日那天，我带着正在上大学的女儿一起来到周跃明家。但见院子里停着一辆江苏牌照的别克轿车，知道周跃明回来了。我们往里走，听见厨房里传出一片笑声，显然他们也看见我们了。一家四口正在吃饭，周跃明站起来，高高大大的，颇有气派，他热情地与我们握手打招呼，他们的母亲周四宝则盛出两大碗饭，请我们一起吃饭。我对周跃明说，‘来了快十次，终于见到你了！’他解释说：‘我那边只是一个作坊，

⊙ 周跃明建造了全村最豪华的别墅。右为周四宝（跃明母亲）与邻居在自己的住宅前。

确实没什么看的。'话虽这么说，他还是将开在上海的'作坊'地址告诉了我。

"5月11日，我从上海中心区出发，开车来到莘庄，按照地址寻找周跃明的工厂。莘松路两旁有很多新建的美丽的别墅群，他的工厂就在离别墅群数百米处，有十来栋简易厂房的大杂院内。周跃明不在工厂，他的'娘家'大哥和厂长接待了我。车间很大，里面堆着一些已经加工好的木门。有十几个工人正在加工一种与铲车配合使用的货架，这一批货架是要出口的。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在这样简易的'作坊'里照样能产生百万富翁，让文化偏低的周跃明施展自己的才能，使他赚到了钱，在家乡盖起了豪华的别墅。

"2005年12月8日上午，我又去了一次周跃明的'作坊'，知道周跃明很忙，对采访他本人不抱奢望，但想不到他那天正好来车间。其实周跃明很健谈，对他的过去无论是出身、落难，还是辉煌赚钱，都不遮遮掩掩。只是说到要把他的事写进书里，他连连摇手。车间里的景象与半年前大不相同，原来空空荡荡的场地堆满了木料，一派生意兴旺的样子。产品加工的档次也提升了，现加工的是高层住宅的防火门，加工工艺复杂很多，木料则是马来西亚进口的。周跃明也不是十几年前的小作坊主了，在他名片上的头衔是：上海阿杰木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公司是2001年注册成立的，'阿杰'是他儿子的小名。他像很多处于原始积累时期的企业家一样，自己管钱、自己跑业务、自己维护客户关系。他只盼着孩子将来能接他的班，尽管他今年才40岁，他的儿子才读初中一年级。"

第四节　后悔未投再生产

我们在访谈时，周四宝（跃明母亲）感慨地说：

"当时跃明到上海去，只想把债还了，哪里想到能赚这么多的钱，哪里想到这一辈子还能住上这样好的楼房！最初提出盖房子主意的是跃明父亲。他说：'你们在上海赚了钱，别人又不知道，要盖座房子给大家看看。'后来盖成这么大、这么好，是跃明自己的主意。现在他也有点后悔了，在盖房上花钱太多，因为生意越来越难做，需要更多的流动资金，如果盖房少花点钱，手上多点流动资金就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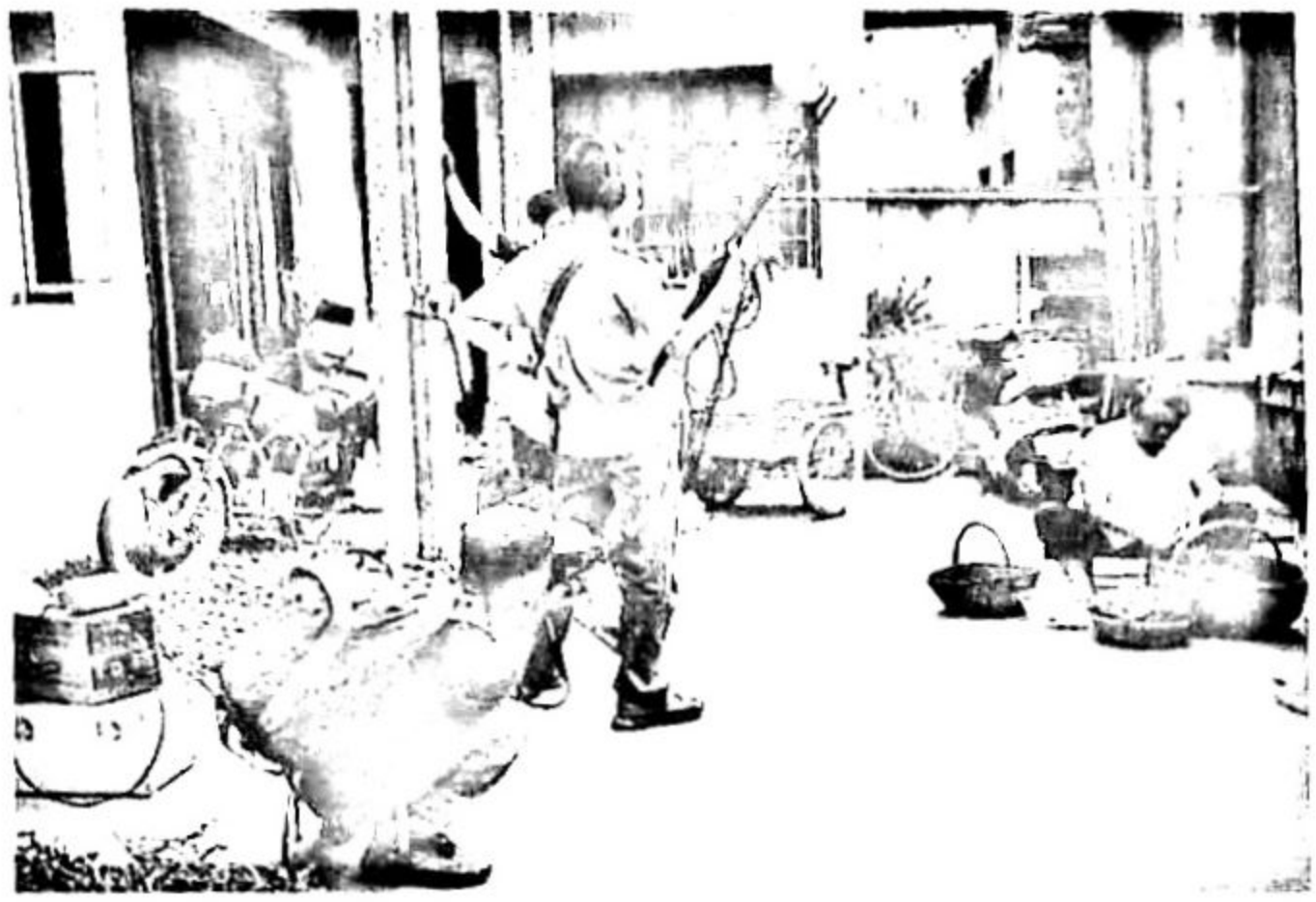
2005年，周全奎访谈周跃明时，有一段很实在的问答：

问：你在上海创业近十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答：最大的收获应该是结识了上海这么多的朋友，倒并不是赚了那么多的钱。

问：那你在上海创业近十年，最大的遗憾又是什么？

答：第一要数是自己没有文化，我连写个便条也困难，更谈不上接受现代信息技术了。什么电脑、“伊眉儿（电子信箱）”，我全然不懂。第二，要数当年刚挣了点钱就急于造了这幢别墅。农村里的人有一个习惯，有了钱后就想改善住房条件。如当年（1999 年）用刚刚积累起来的一百万元，不去造房子，而用于发展生产，或者买二十亩土地就更好了，上海这几年土地增值太惊人了！



⊙ 2009 年 9 月，中央电视台在村里拍摄农民生活。在庆祝建国六十周年的节目里，把开弦弓村定位为：研究中国农村的首选样本。

毕竟周跃明夫妇刚刚走出农村，踏进市场，才开始离开贫困，迈入富裕。当他们手中有了钱的时候，首先想到了盖房子，想到要“盖座房子给人家看看”。因为他们长期生活在负债累累的贫困之中，他们最迫切的需要，就是抬起头来，争一口气，能过上体面的生活。但是，当这座豪华的别墅落成后，他们又后悔了，为什么当初不把这些钱再投入到生产中去呢？这是当今走进富裕的农民最朴实、最普遍的一种心理。

据《开弦弓村志》稿记载：“2002 年，周跃明在上海莘庄创办上海阿杰木制品有限公司。后搬迁至上海奉贤县南桥镇，租地 14 亩（租赁时间 20 年），总投资 1000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 300 万元），建厂房 6000 平方米，雇用工人 40 人，加工制造高层住宅木质防火门和木制品包装，年产值 1500 万元，利润 100 万元。2008 年，在庙港工业开发区投资 1000 万元，征用土地 14 亩，建标准厂房 9000 平方米，用于出租。”

第二十章　江村文化园八十年社会变迁

开弦弓村走过的农村工业化道路是艰难和曲折的，在“五上四下”的过程中，既有宝贵的成功经验，还有重要的历史教训。但是，村民们为了改善生活，兴办工业的热情和信心始终没有改变，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里，基本完成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历史进程，并向信息社会继续迈进。终于摆脱了贫困与饥饿，先后实现了温饱与小康，由传统落后的农业村，建设成为充满时代气息的工业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第一节　光辉精神世代传

费孝通的江村调查，有炽热的思想——爱国爱家乡；有执著的追求——志在富民；有踏实的学风——求真务实。他始终把自己纯朴的感情，扎根在这片生我养我的充满生机和希望的乡土地上，扎根在最基层、最现实的中国农民的生活之中。正如他在《吴江的昨天、今天、明天》一文中所说：

“初访江村是我这一生学术道路上值得纪念的里程界标。从这里开始，我一直在这一方家乡的土地上吸收我生命的滋养，受用了一生。冯唐易老，弹指间已是一个花甲了。

⊙ 2006年11月，在吴江召开“纪念费孝通教授江村调查七十周年”学术交流会。姚富坤向与会学者介绍开弦弓村情况。

我自己固然须眉皆白，但是养育我的家乡，如今却长得更年轻壮健了。我面对锦绣似的家乡山水，心里却领会了为什么苏东坡要在孔子的‘逝者如斯’后面加上‘而未尝往也’这半句话。流年似水原是一般人都易生的感叹，但不知自从世界上有了人，人一代代地劳动生产，把时间变成了积累的基础，日日，年年，代代的创新，在人文世界里留住了岁月流光。我的祖祖辈辈在家乡养育了我，我虽则已由老而衰，但我没有忘记家乡，有生之日总想为家乡这片土地上多加上一点肥料，能长出比我这一代更有出息的子子孙孙。生命和乡土结合在一起，就不会怕时间的冲洗了。”

1981年，费孝通三访江村时，倡议建立江村社会学调查基地，他的学生和国内外学者、媒体相继到开弦弓村访问和调研。人员有大学教授和学生、研究单位学者、国家机关工作者、新闻记者等。其中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南京大学、苏州大学、浙江林业大学和江苏大学等6所大学，把开弦弓村确定为社会学实践基地。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和南京理工大学等6所大学，与开弦弓村建立长期的学术联系。最早访问开弦弓村的国内学者，是80年代初参加江村社会调查基地活动的19位学者。此后到开弦弓村访问的学者、媒体络绎不绝。

1956年，第一位国外学者——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人类学系威廉·葛迪斯（W•R•Geddes）教授访问开弦弓村。1981年，美国科学促进协会常务董事、美国农业发展委员会亚洲组主席、马里兰大学副校长、人类学教授南希·冈萨雷斯访问开弦弓村，她是第二位访问开弦弓村的国外学者，也是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后，第一位访问中国的外国学者。随着国内外学术交流的恢复，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和港澳台学者到开弦弓村访问。据不完全统计，1981—2010年（其中近10年缺记录），有76次。访问者涉及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26次，美国20次，英国10次，中国香港地区5次，澳大利亚、意大利和津巴布韦各2次。德国、法国、朝鲜、西班牙、韩国、印度、菲律滨、冰岛等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各1次（多国或地区合作考察分别计算）。

出版研究开弦弓村的著作主要有：《开弦弓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三年经过情况》，作者：陈杏荪，民国二十二年1月，今存浙江省古籍图书馆。《一场悄悄的革命——苏南乡村的工业与社会》作者：沈关宝，1993年9月。《江村→江镇——庙港发展的脚步》吴江市政协编著，课题负责人：钱一舟，1996年9月。《江村自治——社会变迁中的基层民主》作者：薛和，20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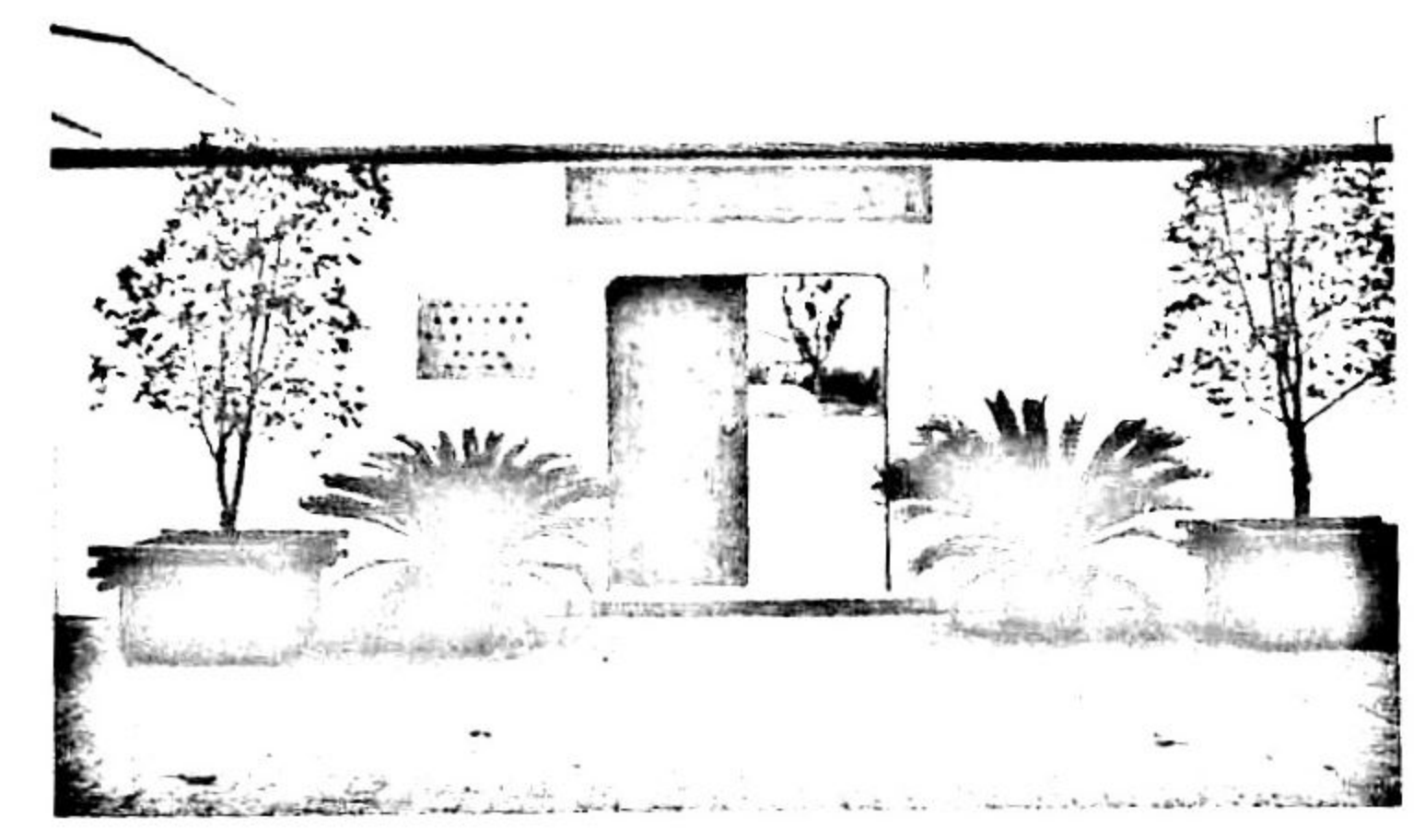
年 9 月。《江村报告——一个了解中国农村的窗口》作者：王淮冰，2004 年 11 月。《江村经济七十年》作者：周拥平，2006 年 11 月。《以工兴镇——苏南七都镇再调查》作者：刘豪兴，冯月根，2008 年 11 月。《江村七十年——中国农民的小康之路》作者：谢舜方，曹雪娟，顾永林，李巽和，何斌华，2010 年 10 月。《江村变迁——江苏开弦弓村调查》作者：朱云云，姚富坤，2010 年 10 月。

第二节　江村建设文化园

2008 年和 2009 年，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苏州市和吴江市人代会、政协会议上，提出创建江村文化园的议案。经审议，列入政府实事工程。其中，苏州市政协委员、苏州大学教授陈红霞《建议将吴江七都镇开弦弓村建设为‘社会学圣地江村园’》的提案，被评为“苏州市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优秀提案”。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讨论认为，建设江村文化园有很多有利条件：

学术地位高，名人效应强。在开弦弓村这片乡村土地上，拥有费孝通和费达生两位名人。1923 年，费达生技术下乡，以开弦弓村为基地，向蚕农宣传科学养蚕知识，开展土丝改良运动，1929 年她与开弦弓村民共同创办全国最早的乡村工业企业缫丝厂，被赞誉为“乡镇工业之母”和“当代黄道婆”。1936 年，费孝通“初访江村”，1938 年在英国留学期间写成《江村经济》一书在英国成功出版，成为最早记录和研究“三农”问题和乡村工业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在长达 70 年跌宕起伏的学术生涯中，先后 26 次访江村，留有《江村经济》、《重访江村》、《三访江村》、《九访江村》、《江村五十年》等影响深远的著作。使开弦弓村成为“世界观察中国农村的窗口”，享有“乡镇工业发源地”和“国内外研究中国农村首选样本”的荣誉。

资料图片丰富，村庄布局完整，对外交通方便。开弦弓村保存有自 1955 年起，50 多年研究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完整的历史资料；有费孝通和国内外学者调研开弦弓村的大量书籍、文章；有费孝通、费达生生前的大量文书，纪念品、生活和工作用品；有各个时期拍摄的大量照片。其中珍贵



⊙ 2011年5月，费孝通江村纪念馆被命名为苏州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照片有：民国二十五年费孝通拍摄16张，1956年澳大利亚葛迪斯教授拍摄6张，1957年和改革开放初张祖道拍摄114张；已收集到大量反映开弦弓村传统文化的农具、服饰、生活、节庆用品等文物。开弦弓村北近太湖，南接长漾湖荡区，东藏荡和西藏荡分处村子两侧，村内河道纵横，是典型的江南水乡村落。至今保留着1936年费孝通先生初访江村时，亲手绘制的开弦弓村水系和民居布局，村庄里还保存着一批传统民居。村南有沪苏浙高速公路出口，村东有苏震桃一级公路，与上海、南京、苏州、杭州等周围城市的联系，十分便利。

建设“江村文化园”，可以更好地纪念和弘扬费孝通先生“爱国爱家乡”、“志在富民”的事迹和崇高品德，宣传和学习郑辟疆、费达生为振兴祖国蚕丝事业无私奉献的精神。具体的规划建设以开弦弓村和周围水系为框架，农耕文化为底蕴，学术研究为特色，名人效应为支撑，寓休闲旅游、学术研究、爱国主义教育为一体，展示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和江南水乡的传统风貌。成为促进青少年“学科学、爱家乡”健康成长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并最终形成吴江西南部“震泽——开弦弓——七都”文化旅游圈。

2009年10月，费孝通江村纪念馆在开弦弓村破土动工，2010年9月竣工，占地11000平方米，建筑面积2200平方米。2010年10月，为纪念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诞辰100周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顾秀莲，财政部原部长项怀诚，共同为园内费孝通铜像揭幕。是月23日，民盟中央、省、市有关部门领导、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以及费孝通生前友好和亲属近300人出席开馆仪式，吴江市委宣传部部长曹雪娟主持。

馆区由费孝通纪念馆、江村历史文化陈列馆、费达生江村陈列馆、费孝通广场、费孝通碑廊组成。综合采用了图文、实物、置景和多媒体等多种展览方式，介绍费孝通、费达生的生平事迹和江村文化。主馆费孝通纪念馆建筑面积800平方米，分馆江村历史文化陈列馆建筑面积600平方米，费达生江村陈列馆建筑面积300平方米。2011年9月，费孝通江村纪念馆在中国建筑学会、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威海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蓝星杯·第六届中国威海国际建筑设计大奖赛中，获金奖。

第三节　往事如昨留纪念

历史上开弦弓村的传统农业经济仅仅是生存经济，即仅以维持家庭人口的生计和“香火”的绵续。由于生产技术落后，社会生产力低下，即使在风调雨顺的太平年景，也没有太多的积余，虽然村民也有丰收的喜悦和家庭的天伦之乐，但只能克勤克俭过日子。

在自上世纪二十年代以来的80年间，开弦弓村社会变迁的大脉络，就是由农业社会不断向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迈进的生动过程，其中有费达生的“技术下乡”、“工业下乡”，有陈杏荪等村民对科学技术的渴望和接受。村民们冲破传统经济制度的束缚，吸收和应用新的科学知识，勇敢地探索农村工业化之路，至今已经历了五个阶段，概括起来有“五起、四落”：

第一“起”：自1923年开始，在江苏省女子蚕校校长郑辟疆、青年教师费达生等爱国知识分子的推动下，把科学养蚕技术送到开弦弓村，并于1929年，采用技术先进的立缫机和配套设备，创建中国历史上第一家乡村股份制缫丝厂——开弦弓村有限责任生丝精制合作社，在农村工业化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

第一“落”：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9年春，日本侵略军在太湖沿线扫荡，驻扎开弦弓村缫丝厂，缫丝厂被毁，所有机械被夺去。日军离开后，农民防止日军再来住，愤而自毁其屋。开弦弓村村民迈向农村工业化的希望被扑灭。

第二“起”：1958年农村成立人民公社，全县掀起轰轰烈烈的工业化运动。

一是全民大炼钢铁。开弦弓村的村民参加本县组织的大炼钢铁，还被上级抽调80名青壮年，参加苏州市的大炼钢铁。二是“大办工业运动”。县里号召家家户户办工厂，生产“三土”，即土化肥、土农药、土水泥。

第二“落”：由于缺乏科学指导，大炼钢铁运动仅生产了一些废铁，工业化运动生产的所谓“三土”产品，更无实效。在短短几个月里，热闹一阵子的工业化运动，销声匿迹。

第三“起”：1968年，在“文革”最乱、“极左”思潮横行的时候，由红卫大队（开弦弓南村）发起，与邻近7个大队合股重建缫丝厂。在相隔创办老丝厂40年后，新丝厂如一枝傲霜斗雪的梅花，在“文革”风雨中，昂首萌放，再次显露出开弦弓村村民迈向农村工业化的信心和创造精神。

第三“落”：1972年，公社派来一名干部担任缫丝厂书记，负责工厂的行政管理，并掌握经济审批权。仅凭公社书记的一句话，由开弦弓等8个村自发组织、历经千辛万苦办起来的新丝厂，一夜之间轻而易举地变为公社办厂。社员认为，这是1958年“一大二公”后的又一次平调。

第四“起”：在改革开放的大潮里，开弦弓村又一次迈出了农村工业化的步伐。1978年，南村创办红卫丝织厂。1979年，北村创办立新丝织厂。1982年4月，南北两村合并，建立全乡规模较大的骨干工业企业——开弦弓丝织厂。

第四“落”：九十年代中期，由于集体经济在管理体制上的弊端和人为决策失误，开弦弓村办集体工业，由盛转衰，资不抵债。1972年被公社平调去的缫丝厂，也因种种原因而倒闭。从此在开弦弓村的大地上，苏南模式的集体村办工业彻底结束。

第五“起”：在乡村集体工业彻底倒闭的挫折中，全体村民重新挺起胸膛，振作精神，发展个体家庭工业。有的拉横机、有的搞丝织、也有的外出做生意，可谓历经沧桑，自强不息。在短短几年里，全村形成了以家庭羊毛衫编织、化纤织造为主体的家庭工业和股份制企业的工业群体，坚定地走在农村工业化的道路上。

第四节　桑田沧海换人间

今天走进开弦弓村，再对照费孝通先生“初访江村”、“重访江村”和“三访江村”时的文字介绍和拍摄的照片，真是改天换地，江村巨变。弯曲泥泞的村道消失了，全村6.1公里村道全部浇上柏油。村民家家用上了取自太湖苏州湾的自来水，从河港挑水，再用明矾沉淀的饮水习惯，已成了历史。村里普遍用上了液化气，轻巧的燃气灶代替了砖砌的有烟囱的柴火灶。居住条件改善了，绝大多数村民住上楼房，部分村民住进别墅式高档楼房。少数村民保留的少量砖木结构的老房子，已成为历史的见证。全村有彩电1500多台，户均2台有余，都接上有线闭路电视线，拥有电话和手机1600多只，互联网上网用户200多户。

交通运输已由水路为主，转变为陆路为主。1984年7月，建成贯通南北的震庙公路，公共车进村。2006年10月，沪苏浙皖高速公路建成通车，缩短了与上海、苏州、南京、杭州等周围城市之间的时间距离。2010年4月，苏震桃一级公路通车，20分钟可到达吴江市区，40分钟可到达苏州市区，3个小时可到达南京市区。全村有小轿车80辆，货用汽车25辆，摩托车800多辆，电瓶车410辆，拖拉机8辆。历史上，依赖航船与周围城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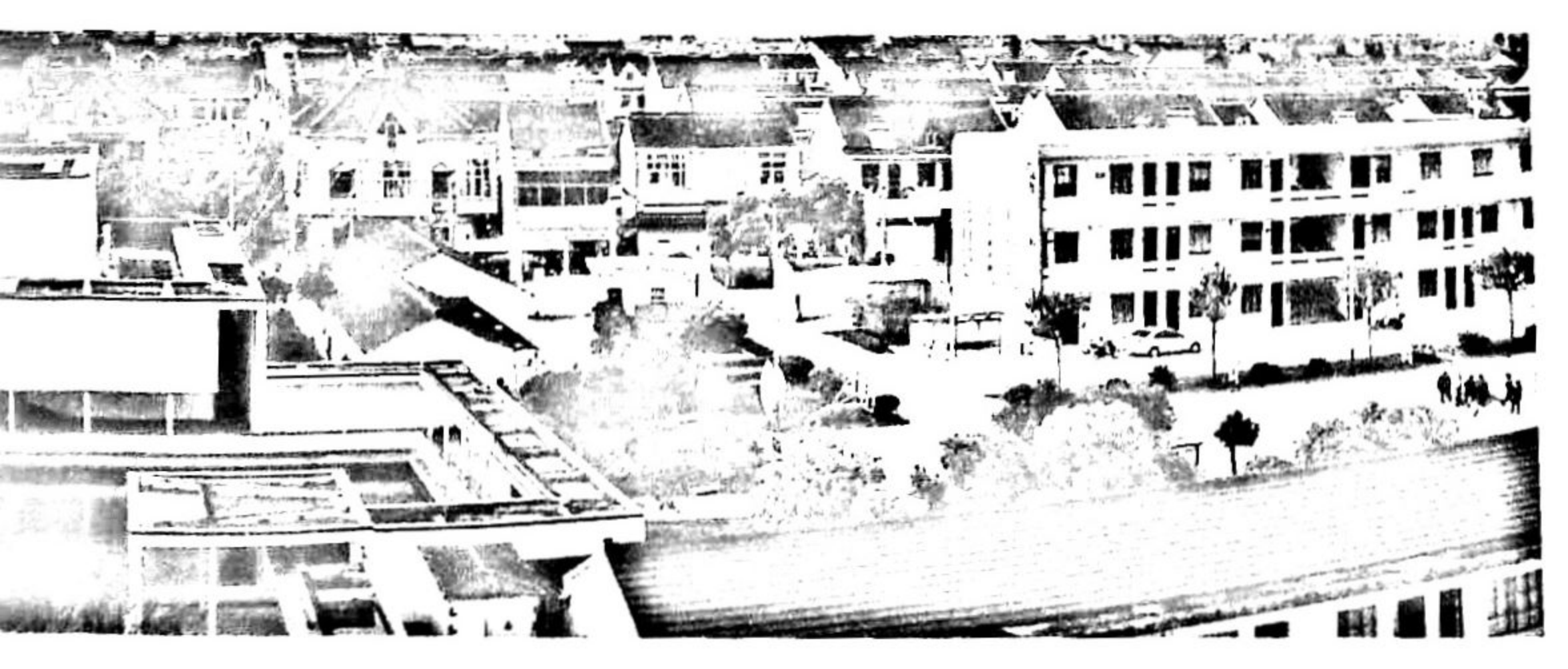
⊙ 江村新貌

联系的方式，只有从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中才能找到。村民文化水平一代比一代提高，有大学本科生（包括在读）135 名，硕士研究生5名，博士生2名，博士后1名。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年年提高，已从1978 年的 114 元，提高到 2013 年 22980 元，年平均增长 17%。

在改革开放、欣欣向荣的时代里，开弦弓村村民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迅速提高，时代进步之速，社会变迁之快，愈使我们感到有责任把这些发生在开弦弓村农村工业化道路上的，这些平凡而生动的真实故事地记录下来，为后人留一点历史的痕迹吧！在人类历史的长河里八十年并不算长，但是开弦弓村已经历了由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的转变，真是沧海桑田，换了人间。

⊙ 2010 年 4 月，在开弦弓村东穿村而过的苏震桃一级公路建成通车，20 分钟可到达吴江市区，40 分钟可到达苏州市区，3 个小时可到达南京市区。

⊙ 开弦弓村耸立在绿色田野里的新楼房。



后记

经过近一年的编撰、编辑，《吴江历史文化丛书》一套九本终于正式出版了。在丛书出版过程中，九本书的编著者付出了辛勤劳动，他们在工作之余加班加点、细致入微地进行了文稿的编写，从源头上保证了文稿的质量。同时，图片的提供者、插图作者、编务人员、出版社编辑等为丛书的出版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他们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使丛书能够以尽可能的完美奉献给广大读者。正是有了大家的精诚合作，使我们这套丛书得于在金秋十月顺利面世。

姚海兴先生为丛书的文稿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梳理，他不厌其烦与各位作者及时沟通，保证了丛书的整体质量，对他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

丛书的出版还得到了吴江区委、区委宣传部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中共吴江区委书记梁一波多次参与了丛书的前期沟通会议，对丛书的出版给予了极大的关心，也提出了要求和意见，并在百忙之中欣然为丛书作序；中共吴江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志芳亲自担任丛书主编，对丛书的内容、版设、装帧等提出了指导性意见，使丛书的出版得于顺利推进。对于他们的关注、指导，表示诚挚的谢意。

当然，因为丛书涉及到的内容广泛，有些资料年代久远，编著者在收集整理撰写过程中也难免存在着偏疏和遗漏，还望各位读者见谅。

编者

2014 年 9 月